宁夏党史故事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编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编 委 会

主　编：宋建钢

副主编：余剑雄

编　辑：胡伟东　纳建萍　马晓东　张　莉

宁夏党史故事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编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宁夏党史故事/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4.5
ISBN 978-7-227-05781-9

Ⅰ.①宁… Ⅱ.①中… Ⅲ.①中国共产党—党史—史料—宁夏 Ⅳ.①D235.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7381号

宁夏党史故事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编

责任编辑　管世献
封面设计　张　兰
责任印制　李宗妮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521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银川金利丰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3364

开　本　720mm×980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120千字
印　数　500册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5781-9/D·403

定　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以来,至今已经走过了90多年的光辉历程。这期间,既有革命战争的严峻考验,又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还有改革开放的创新实践。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都取得了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

宁夏是马列主义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建党较早的地区之一。从1926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宁夏建立的第一个特别支部算起,党在宁夏的革命活动已有80多年的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组织领导宁夏回汉各族人民在极其严酷、险恶的斗争环境中,同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军阀马鸿逵的反动统治进行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付出了重大的牺牲。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宁夏和1936年红军西征转战宁夏期间,我党的许多著名领导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以及著名的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马海德等,都曾在宁夏这块黄土地上留下过光辉的足迹。我党我军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战役也曾发生在宁夏。数万红军战士曾在这里浴血奋战,并认真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帮助当地回汉各族人民建党建政。在今同心县建立的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是我国第一个县级回族自治政权。毛泽东同志在翻越红军长征途中最后一

座高山——六盘山时,构思、创作的气壮山河的著名诗篇《清平乐·六盘山》,早已脍炙人口,饮誉中外。“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千古佳句,一直成为鼓舞宁夏人民团结奋进的巨大精神力量。抗日战争时期,宁夏部分地区也一直是中外闻名的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宁夏工委领导的宁夏人民革命武装——回汉支队,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解放了宁夏全境。

2010年,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用党的历史教育党员、教育干部、教育群众尤其是教育青少年,是党史工作服务党和国家大局的重要内容。要着力抓好青少年这个群体,开展形式多样的党的历史知识、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英雄模范事迹的教育,积极推动党史教育进学校、进课堂、进学生头脑,从小培养青少年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感情。”此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中组部等六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在党员、干部、群众和青少年中开展中共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等文件都反复强调,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是提高党员、干部、群众和青少年思想与政治素质的重要方式,是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重要途径。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青少年阶段是人一生中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具有非常强的可塑性,既是最易接受正确教育而养成良好道德品质的时期,又是容易受到不良影响而被腐蚀和扭曲的时期。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建设,事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事关家庭幸福、社会和谐。

为深入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传统和理想信念教育,切实加强宁夏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了党史通俗读物《宁夏党史故事》。《宁夏党史故事》适时地抓住青少年这一广大群体,根据他们的特点和需求,精选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宁夏在1926~1949年期间的58个党史故事,每个故事都选配了生动的插图,用简练流畅的语言、真实准确的史实,生动形象地呈现了这一时期宁夏党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重要活动。同时,每个党史故事注重从大事着眼,从小事入手,既向读者交代了历史背景、时代意义,又注意细节的描写、语言的生动,力求做到通俗易懂、生动感人。每个故事人物的身上,都闪烁着对理想的执着、对信仰的坚守和对人民的热爱,使青少年在感动中受到教育,在阅读中了解党的基本知识,了解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了解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基本的道理。

在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自治区党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之际,这本通俗党

史读物的出版,必将对激励广大青少年深入学习和了解宁夏地方党史知识、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广大青少年只有正确认识党的历史,牢固树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与优良作风,不断增强对党的热爱、对祖国和人民的感情、对革命先烈的敬仰,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学习,才能为建设开放宁夏、富裕宁夏、和谐宁夏、美丽宁夏做出应有的贡献。

2014年3月

目录

001 / 马列主义在宁夏的传播

004 / 中共宁夏第一个特别支部的诞生

008 / 邓小平第一次宁夏行

012 / 勤政爱民吉鸿昌

015 / 宁夏旅平学生会

018 / 刘志丹、谢子长在宁夏开展兵运工作

022 / 蒿店兵变

025 / 红二十五军在单家集

029 / 毛泽东在单家集

032 / 毛泽东与《清平乐·六盘山》

036 / 中央红军的第一支骑兵连

039 / “禁房”藏红军
042 / “红军井”的由来
045 / 同心城里结同心
048 / 邓小平背粮
051 / 一张珍贵的照片
055 / 西征红军在宁夏的五次战斗
062 / 回民独立师的斗争
066 / 陈赓师长与红军回民连
069 / 回民解放的先声
073 / 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主席马和福
077 / 国际友人斯诺在宁夏
081 / 国际友人马海德在宁夏
084 / 毛泽民在盐池
088 / 彭德怀在吊堡子
092 / 清水河畔的枪声
096 / 红军一、二方面军将台堡会师
099 / 三军会聚同心城
102 / 萌城阻击战
105 / 中共宁夏工委的建立

109 / 国共密使张子华
113 / 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
116 / 坚持地下斗争时间最长的红河党支部
119 / 黄二完小的抗日救亡活动
123 / 金三寿虎口脱险
127 / 海固回民三次武装起义
131 / 毛主席与回民抗日骑兵团
135 / 顶天立地崔景岳
139 / 回族英雄马文良
143 / 视死如归孟长有
147 / 盐池县的大生产运动
151 / 元华工厂办得好
154 / 三五九旅在盐池打盐
157 / 红区盐池掀起“识字热”
160 / 王克和的故事
164 / 回汉支队
167 / 著名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
172 / 彭老总赠枪
176 / 智取惠安堡

181 / 激战任山河
184 / 激战三关口
187 / 战斗英雄燕飞
190 / “和平老人”郭南浦
195 / 国民党八十一军起义
198 / 激战涝河桥
202 / 金灵之战
206 / 和平解放宁夏协议的签订
209 / 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进驻银川
213 / 后记

马列主义在宁夏的传播

五四运动前后，各种进步思想开始在宁夏地区传播。

1925年8月，正值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冯玉祥派其国民军第二师师长刘郁芬率部从张家口开往兰州。在该部做政治工作的中共党员宣侠父、钱崎泉等，沿途在平罗、宁夏城、宁朔、中卫等地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他们多次到省立第五中学和第八师范开展宣传活动，同进步师生建立秘密联系，帮助他们开阔视野，提高革命认识，吸引他们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他们还捐款给学校，购买进步书刊，成立了兰江图书馆，使兰江图书馆成为传播马列主义的重要阵地。宣侠父、钱崎泉也因此成为最早在宁夏地区传播马列主义的共产党人。

10月，在包头创办的《中山日报》迁到宁夏城，该报积极宣传国民革命及北伐战争的意义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及经验。《中山日报》实际上成了共产党在宁夏城的重要宣传渠道，对民主革命思想和马列主义在宁夏地区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11月，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宣传队进入宁夏城后，在宣传队工作的中共党员伏龙、肖明、马云堃和中山日报社负责人、记者兼编辑贾一中等经常到五中、八师开展宣传活动，同一批进步教师和青年学生

谈学习，谈国家命运和个人志向，向他们介绍外地革命情况。

这年冬天，联军总政治部在宁夏城举办了一期马列主义学习班，吸收五中、八师的青年学生参加，时任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副部长、共产党人刘伯坚讲授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从此，马列主义在宁夏得到了进一步传播。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利用兰江图书馆和《中山日报》宣传马列主义，改变了宁夏一代学子的命运，使他们从旧的枷锁中走向新生，为促进宁夏和西北地区工农运动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马列主义在宁夏的早期传播，为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执笔：吴树强）

中共宁夏第一个特别支部的诞生

1926年9月，为了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军联军中的力量，时任国民军联军第二师刘郁芬部政治处负责人、共产党员钱崎泉赴陕北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带领牛化东等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30余人途经宁夏城赴兰州，到刘部的军事政治学校学习。这时，国民军联军大部队即将分批经过宁夏开赴陕西，急需加强宁夏工作，支援部队过境。因此，钱崎泉应驻宁国民军联军中党组织的要求，将李临铭、贺维新、马思然、陶振亚、郭维华等中共党员和一些进步青年留在宁夏做地方工作。这些留下来工作的中共党员与驻宁国民军联军宣传队及中山日报社的共产党员马云堑、贾一中等，在宁夏城建立了中共宁夏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宁夏特别支部，李临铭任书记。

为了便于公开活动，他们协助建立了国民党宁夏党部，李临铭兼任常务主任。这年冬天，又发展从陕北到宁夏的进步青年马云泽、李秉荣及宁夏人白虹剑、叶松龄等为中共党员，发展张子华、李天才等为共青团员，宁夏的党员达到18人，团员有30多人，他们多是五中和八师的学生。

中共宁夏特别支部成立后，同国民军联军宣传队紧

密配合，主要以国民党宁夏党部的名义，开展了许多革命活动。各军政机关、学校、团体普遍建立了“列宁室”或“中山俱乐部”，教唱《国际歌》，陈列鲁迅、瞿秋白等人的书籍和《新青年》刊物，供进步青年等阅读。他们在集市教唱《国际歌》，讲解歌词内容，令听众兴趣盎然，前来唱《国际歌》的人越来越多，李临铭就组织大家按大小个儿排好队，像合唱队一样，他亲自指挥大家唱。他们还组织五中、八师的学生上街演讲、演话剧等，吸引了大量过往行人，群众对这些充满革命内容的演讲和文艺节目非常喜爱，看到精彩处常常热烈鼓掌。

192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天气格外晴朗，特别支部在宁夏城举行了盛大的群众游行活动，联军总政治部的中共党员伏龙、肖明向游行群众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讲，号召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为人类解放事业而斗争。游行集会的群众高呼：“我们一定要联合起来！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共同斗争！”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宁夏城上空。青年学生们高唱《国际歌》，表现了极大的革命热情。5月30日，特别支部又组织举行了“五卅”国耻纪念日集会，愤怒声讨日寇侵华和在上海屠杀中国工人的暴行。中共党员肖明、伏龙等人自编自演了话剧《顾正红》，当演到日本资本家杀害中国工人顾正红这个场景时，激起了全场群众的无比义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声响彻云霄。

中共宁夏特别支部的成立，是当时宁夏城乃至宁夏革命斗争史上的一件大事，使灾难深重的宁夏人民在黑

暗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中共宁夏特别支部虽然只存在了一年多时间，但在宁夏传播了马列主义，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标志着我党在宁夏地区有组织地开展革命活动的开始，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宁夏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序幕。

（执笔：吴树强）

邓小平第一次宁夏行

大家都知道，邓小平是著名革命家、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是四川人，16岁就远渡重洋，到法国勤工俭学。在那里，他结识了周恩来等革命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1月中旬，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邓小平到达莫斯科。先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不久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年秋，邓小平受党组织委派回国，到国民联军冯玉祥部做政治工作。那一年，他才23岁。可是你知道吗，邓小平从苏联回国的第一站是我们宁夏。

邓小平一行三人从苏联出发，乘坐装载武器的大卡车穿过辽阔的西伯利亚，先到外蒙古的乌兰巴托，然后骑着骆驼，穿越戈壁，风尘仆仆，风餐露宿，于1927年2月到达阿拉善旗。这时，宁夏方面派去的中山日报社记者刘贯一在那里迎候他们。之后，在刘贯一的安排下，他们翻越贺兰山，经平罗县，于第二天中午进入宁夏府城（今银川市），住进钟鼓楼旁边山河湾巷的银川客栈。

晚上，国民联军留守处负责人、中共党员王一飞带着中共宁夏特别支部负责人李临铭来到客栈，欢迎邓小平等人回国，并向邓小平等人介绍了宁夏及宁夏党组织的情况。邓小平听完后说：“今天回到了祖国，想说的话很

多很多。感谢一飞和宁夏特支的同志们远道迎接我们！中国革命前途很好，令人鼓舞。只要我们坚定理想信念，中国革命一定会成功！”

一天，邓小平来到宁夏省立第五中学图书室，看到书架和桌子上有《共产党宣言》《三民主义》《新青年》等新书和杂志。特别支部党员叶松龄告诉邓小平，“这些书都是国民联军刘伯坚、宣侠父赠送的，建好这个图书室就是要让青少年接触新思想”。这时，有几名学生正在认真看书，邓小平走过去亲切地问：“同学们，你们喜欢这个图书室吗？”其中一个学生回答说：“我叫梁大均，是老师带我们到五中学习的，这里的书很好！”另一个说：“我叫孙殿才，家在河东中宁县，也是老师领来读书的！”邓小平兴致勃勃地和他们交谈着，说：“我和你们一样都是来学习的！”

在宁夏期间，邓小平还到国民联军政治部为训练班学员讲话。他走上讲台说：“同学们，我刚从十月革命的故乡苏俄回到祖国，第一站就到了咱们宁夏。从莫斯科回祖国的时候，我就打定主意，要把一生交给我们的党和人民，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邓小平的讲话赢得了学员们热烈的掌声。

邓小平还到中山街、柳树巷、南门、新城等地，深入了解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随后，邓小平一行由银川启程去往西安。他们骑马途经灵武、吴忠、同心、固原等地，历时一个多月。每到一地，就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和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向当地老百姓宣传革命，传播革命火种。这次宁夏之行，给邓小平同志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

忆，事过半个世纪，他还饶有兴致地回忆起这些事。

（执笔：韩林森）

勤政爱民吉鸿昌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你知道这首气贯长虹的诗是谁写的吗？他是抗日名将吉鸿昌临刑前写的。他曾经当过我们宁夏的省主席，深受人们的爱戴。

吉鸿昌是河南省扶沟县人，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3年秋天，18岁的吉鸿昌抱着“当兵救国，为民造福”的理想，到冯玉祥的部队当兵。他吃苦耐劳，智勇双全，随冯玉祥南征北战，战功赫赫。后来，吉鸿昌结识了宣侠父等共产党人，接受了革命思想。

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战争。吉鸿昌率部参加，屡建奇功，他的部队被誉为“铁军”。1929年，甘肃的马仲英率军攻陷宁夏省城，省政府主席门致中逃往中卫。吉鸿昌奉命率主力反攻，两军激战数日，击败了马仲英部。

战事结束不久，吉鸿昌继任宁夏省主席。那时宁夏还很落后，他提出了“开发大西北”口号，并亲任开发西北总指挥，精心规划宁夏建设。宁夏是个回族聚集地区，吉鸿昌十分注重回汉民族团结。他主持召开全省阿訇大会，邀请回族宗教上层人士到省城，共商民族团结大计，还亲笔写了“回汉一家”四个大字，悬挂在鼓楼上。

吉鸿昌亲民爱民，省政府门庭若市，来见吉主席的百姓络绎不绝。不管回汉、贫富，吉鸿昌都热情接待，能解决的事当时就解决，一时不能解决的，指示有关部门限期解决。回汉各族人民都称赞他是“替老百姓办事的好主席”。那时，许多老百姓家里缺少耕牛，吉鸿昌命令部队用军马帮百姓耕地。夏收时节，他亲自带警卫队到城郊帮助农民抢收小麦，农民十分感激，要请吉主席到家吃个饭。吉鸿昌说：“你们的日子过得苦，我们军人吃老百姓的粮食，帮老百姓收麦子是应该的！”干完活就带队回城，坚持不给百姓添麻烦。

吉鸿昌爱国爱民的进步思想，廉洁奉公的高尚品德，平易近人的赤诚之心和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给宁夏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为宁夏的社会安定，为地方经济和文教体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0年冬，冯玉祥、阎锡山联合起来，与蒋介石展开了中原大战，冯玉祥急电调吉鸿昌参战，吉鸿昌率军离开了宁夏。1932年4月，吉鸿昌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执笔：韩林森）

宁夏旅平学生会

1930年春，在北平大学等学校上学的宁夏籍学生殷占雄、袁金章、雷启霖等人的倡议下，成立了“宁夏旅居北平学生会”（简称“宁夏旅平学生会”）。宁夏旅平学生会的宗旨是：联络同学，增进感情，宣传科学，反对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推动宁夏的社会进步。到1931年夏，先后又有几批到北平的宁夏籍学生参加了学生会，成员达40多人。

在中共党员张子华、李天才等影响和组织下，学生会开展了许多爱国活动。1930年秋，学生会创办了进步刊物《银光》，对宁夏政治、教育发表评论，揭露军阀、官僚压榨人民的罪状，引起了宁夏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的思想共鸣，《银光》刊发的文章表明了宁夏旅平学生会中进步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而发出的革命呼声，对唤起宁夏民众觉醒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银光》进步、革命的呐喊，引起了当时宁夏统治者的极大恐慌和仇恨，1933年马鸿逵统治宁夏后，明令禁止《银光》发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东北三省。宁夏旅平学生会部分成员与北平学生组织南下请愿示威团，开展了为反对日寇侵略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卧轨斗争。

1932年，宁夏旅平学生会的活动停止了，但宁夏旅平学生一直坚持革命斗争。这年秋，张子华等组织宁夏旅

平学生参加支援保定师范学生的抗日罢课、北平天桥和前门集会等活动，宣传抗日救国，揭露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

1935年，日寇发动华北事变，宁夏旅平学生会再次组织起来继续活动，联合甘肃、青海学生，组织“西北公学游行队”，发表演讲，散发传单，参加了北平的“一二·九”爱国运动和“一二·一六”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5月，有不少宁夏旅平学生参加了南下抗日宣传队、抗日民族先锋队，为抗日救亡而奔走呼号。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占领北平、天津，宁夏旅平学生有的转赴延安参加革命，有的回到宁夏，通过宁夏省教育厅组织了3支抗日宣传队，深入到各地进行抗日宣传。

宁夏旅平学生会是一个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斗争目标的爱国青年学生组织。在这个组织中，宁夏籍进步青年经受了革命浪潮的洗礼，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成为宁夏革命的有生力量。在日后长期的革命岁月里，他们有的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骨干；有的冒着生命危险支持和掩护党在宁夏地区开展的革命活动，是党的亲密战友，作为党在宁夏开展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为革命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

（执笔：吴树强）

學生和平旅
銀券

刘志丹、谢子长在宁夏开展兵运工作

刘志丹和谢子长是西北人民心目中的传奇人物和革命英雄，是陕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人及中国工农红军的高级将领。

1930年春，冯玉祥为准备中原大战，把甘肃、宁夏的主力部队调到了河南一线。为了控制后方，冯玉祥委任包头的苏雨生为骑兵第四师师长，留守宁夏平罗。而招兵买马、扩展地盘，是土匪、军阀共有的本性。土匪出身的苏雨生见有机可乘，认为这正是扩充自己势力的好机会，便树起大旗，广招兵马，来者不拒。此时，为了建立一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武装力量，中共陕北特委派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员，到宁夏打入苏雨生的骑兵第四师开展兵运工作。由于他俩的机智勇敢和默契配合，被苏雨生委以重任。谢子长任苏雨生部第十一旅旅长，刘志丹任第九旅第十六团中校副团长，后提升为第十九团团长。不久，他俩就在苏雨生部秘密建立党的组织，大力争取士兵，训练军事干部。苏雨生部许多团以上军官与刘志丹、谢子长相识，他们也愿意借助年轻有为的刘志丹、谢子长来扩充自己的势力，所以苏部兵力大增，威震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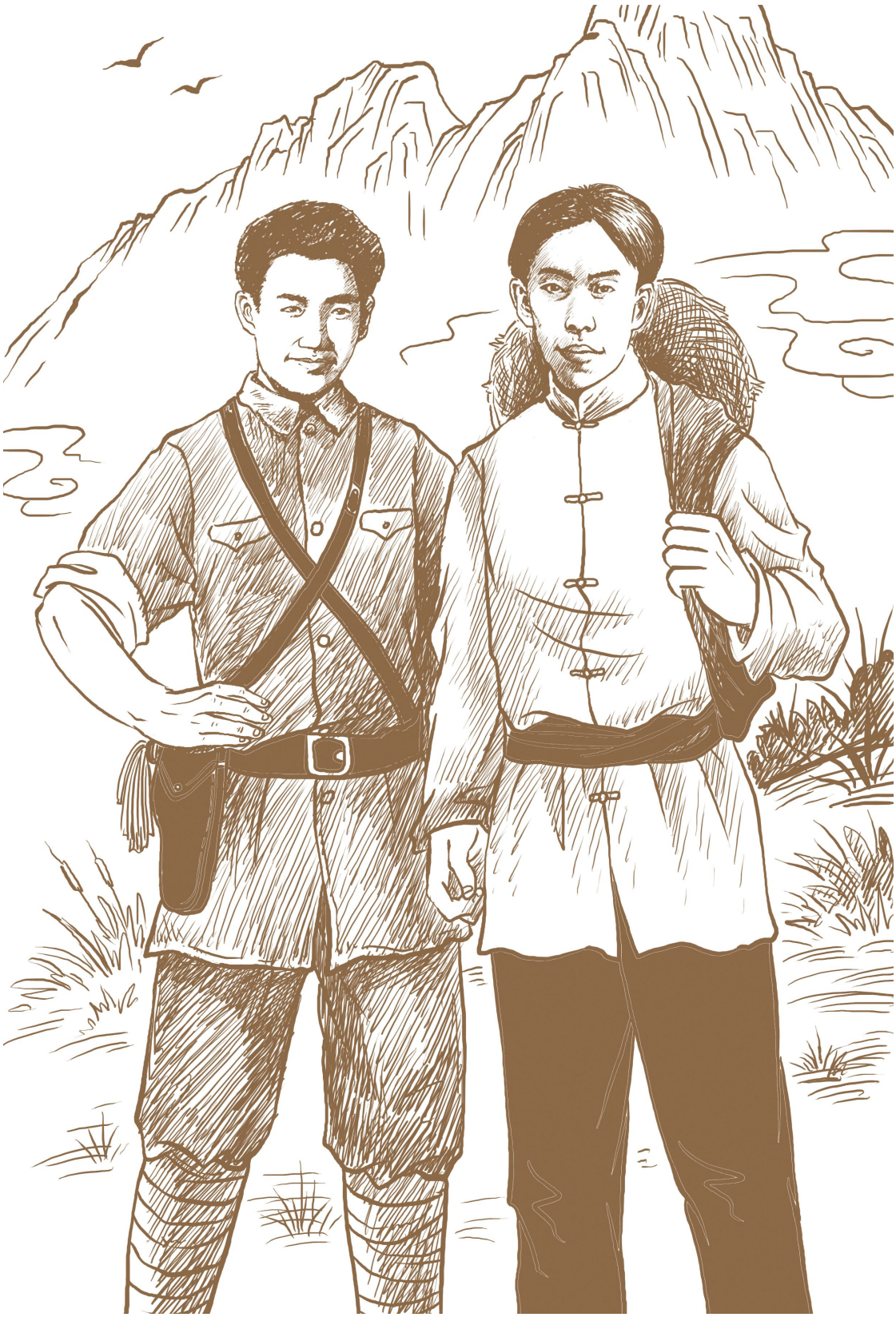
当时，刘志丹、谢子长与苏雨生部第八旅第十五团团长王子元相识，王子元比较开明。于是，中共陕北特委和刘志丹、谢子长决定把该团作为兵运的重点，先后派遣共产党员张东蛟、高岗等到该团，秘密开展兵运工作。1930年5月，刘志丹、谢子长经与王子元协商，在贺兰县立岗堡成立了一个学兵队，由张东蛟、高岗任学兵队正、副队长。学兵队积极进行军事训练，培养军事干部，为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积蓄力量。在组建学兵队的同时，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张东蛟任书记、高岗任副书记，直属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中共特别支部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党组织，开展兵运工作，等待时机暴动，争取建立党的武装。

苏雨生在宁夏大肆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引起了把持此地的西北军阀的严重不满，于是直接引发了西北军阀与苏雨生部之间的混战，强龙压不住地头蛇，苏雨生部哪里是西北军阀的对手，一触即溃，四分五裂。刘志丹、谢子长正好借此机会，带领着我党争取来的一部分队伍，包括王子元团的学兵连，转移到甘肃庆阳地区，组建了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先后任副总指挥、总指挥，率部转战陕甘边，开辟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搞兵运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但是，刘志丹、谢子长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非凡胆略，一次又一次地打入军阀部队，执着地开展兵运工作，出生入死，毫不

退缩，表现了共产党人不畏艰险、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英雄本色。

（执笔：吴树强）



蒿店兵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陕西省委在宁夏固原县蒿店领导和发动了一次武装暴动，史称“蒿店兵变”。这是我党在固原地区继陕甘游击队在海原等地进行游击活动之后，开展较早的又一次革命活动。

1932年9月，在国民党陇东警备司令杨子恒部做兵运工作的共产党员南汉宸向中共陕西省委报告，蒋介石装备甘肃行署主任邓宝珊部的一批武器弹药将运抵平凉，然后由其干部补习队押运兰州。当时，邓部的干部补习队中建有中共地下组织，有党员12名。

中共陕西省委分析了各方面情况，决定利用干部补习队中党组织的力量，组织兵变，夺取这批武器弹药，用以扩充和壮大陕北红军的实力。省委派李艮（化名愚痴）总负责，与干部补习队中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周志学等取得联系，共同实施这一计划。同时，省委还指示陇东特委协同配合行动。

10月25日，补习队到达平凉，李艮、刘杰三与国民党干部补习队分队长、中共地下党员李华锋等接头后，建立临时党支部，商定在平凉去兰州的第一驿站——固原蒿店发动兵变，夺取枪支后撤向陕北，与陕甘红军游击队会合。

10月28日，国民党干部补习队从平凉出发，当晚宿营

蒿店。党支部秘密召开会议，决定午夜12时发动兵变。不料，行动被敌人察觉。李艮、李华锋等不得不提前行动，带领军士队中的党员和部分积极分子共34人撤到太白山。为防敌人追击，又派军士队班长、共产党员李特生与党员苏冠英带领6名队员在山口设卡担任掩护，李艮、李华锋带队向东北方向撤走。中途休息时，宣布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李华锋任队长，李艮任政治委员。李特生、苏冠英等人在完成掩护任务后，天色已亮，未赶上队伍，与李艮、李华锋等失去联络，于第二天傍晚潜回平凉。兵变部队秘密向北行进，沿路书写“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进入固原东山（今彭阳县境内）。

10月31日，正逢彭阳境内的石家沟口集市，兵变部队在沟口集市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主张、红军的性质，散发“买卖公平、不扰穷人”等传单，还批斗了当地的一个地主。这些行动，赢得了群众的好感，在沟口乃至彭阳境内震动很大，使长期生活在苦难中的贫苦农民看到了新的希望。

这支红军游击队战士多为学生出身，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知识。在中共陇东特委的领导下，经过总结休整后，陆续离开平凉。李艮仍回中共陕西省委，其余人员有的被派往陕南开展游击活动，有的继续做兵运工作，积极投入到了新的斗争中。

（执笔：叶长青）

红二十五军在单家集

1935年8月5日，六盘山下的单家集在夜色中显得格外祥和与宁静，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3000多人悄悄开进了这座睡梦中的村庄。为了不惊扰村里的老百姓，红军首长和战士们悄无声息地露宿在街道两旁的屋檐下。行军的疲惫让战士们倒头酣睡，偶尔的狗叫也无法惊搅他们甜美的梦乡。清晨第一声清脆的鸡叫，让这座纯朴的山庄渐渐苏醒。早起到清真寺做礼拜的穆斯林长者推开大门，惊奇地发现，村里来了神秘的客人。当得知他们就是传说中走到哪里都会帮助老百姓挑水、劈柴、扫院，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不动老百姓一草一木的穷人的部队——红军时，村里男女老少纷纷奔走相告。

为了充分尊重回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风俗习惯，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党中央给部队制定了“三大禁令、四大注意”：禁止部队进驻清真寺，禁止在回民中吃猪肉，禁止打回族中的土豪；注意遵守回族风俗习惯，注意用回民的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回族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政委吴焕先还邀请当地的知名人士和阿訇开座谈会，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及红军的政策和纪律。并申明红军不在单家集拉夫抓丁，不征粮要款。随后，红

军首长带着绣有“回汉兄弟亲如一家”的锦缎匾额和6个大元宝、6只大绵羊等礼品隆重地拜访了清真寺阿訇。看到红军如此尊重回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穆斯林群众完全打消了顾虑，清真寺阿訇按照回族的礼节在清真寺设宴盛情款待了红二十五军领导，并给部队送去了几十只染着红色标记的大绵羊表示慰问和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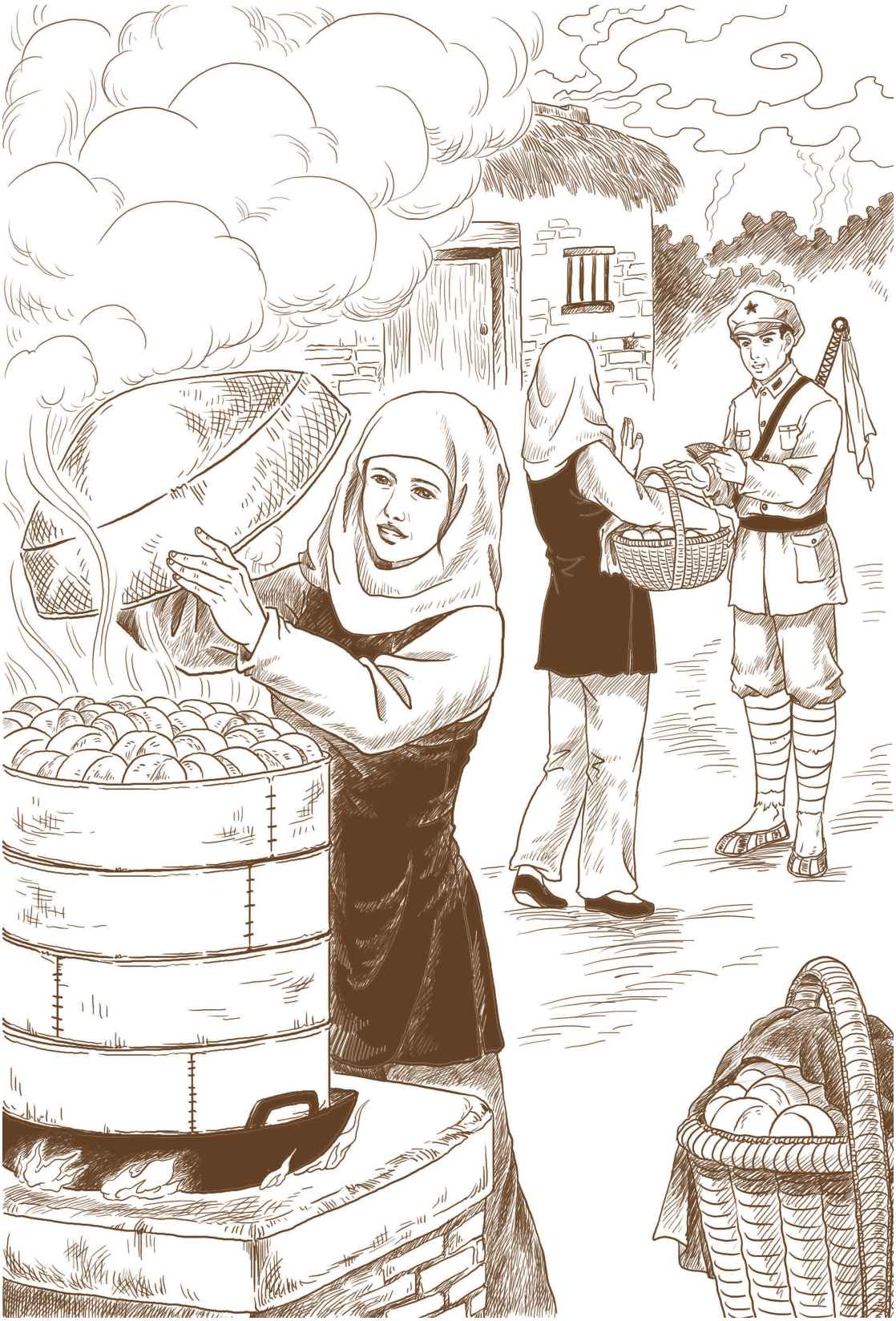
有一天晚上，一位村民得了急病，生命垂危，家中哭声一片。红二十五军军医院院长钱信忠闻讯后，二话没说拿出比金子还珍贵的药品，径直跑到村民家中，亲自给病人做手术，使这个村民转危为安。红军亲民爱民的举动，无声无息地感染着村里的每一个人。看到山顶上每天警卫的红军哨兵吃不饱饭，村里的回族妇女自发组织起来，为他们蒸馒头、熬粥汤。

红军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不仅赢得了当地回族群众的信任和尊重，而且让他们第一次真正亲身体验到世界上还有这样一支为穷人打天下的好军队。红二十五军临走时，单家集的回族群众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欢送红军。当地阿訇利用主麻日（穆斯林群众聚礼的日子）动员单家集的年轻人参加这支仁义之师，并通过做礼拜为红军祈福，当地回族群众齐聚街头，为红军送上馓子、油香馍等回族传统食品，村里部分回族青年踊跃加入了红二十五军。

红二十五军在中国革命最为困难的时期深知中国革命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所以他们心中始终装着人民，他们是不折不扣的人民军队，人民群众

理所当然会拥护和支持他们的。在红二十五军走后短短数月内，单家集群众迅速成立了苏维埃自治政府，积极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

（执笔：何成江）



毛泽东在单家集

1935年10月，六盘山层林尽染，美丽而宁静的单家集瓜果飘香，红军又要来了的消息在村里不胫而走。兴高采烈的单家集男女老少像迎接亲人一样，收拾屋子，打扫院落。每家每户准备了油香、馓子、盖碗茶，期盼红军的到来。

一天，红军队伍再次开进单家集，乡情们夹道欢迎这支亲人的军队。这时，队伍中走来一位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的红军首长，身后跟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小战士。首长微笑着，非常和蔼可亲。有位长者大声招呼道："同志们，今天从哪里来？辛苦了，喝口水吧！"听到长者的话，首长开心地笑了起来，大声说："穆斯林同胞们，这里是不是单家集？"乡亲们高兴地回答："就是。"首长不断地向两旁的回族同胞招手致意，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就是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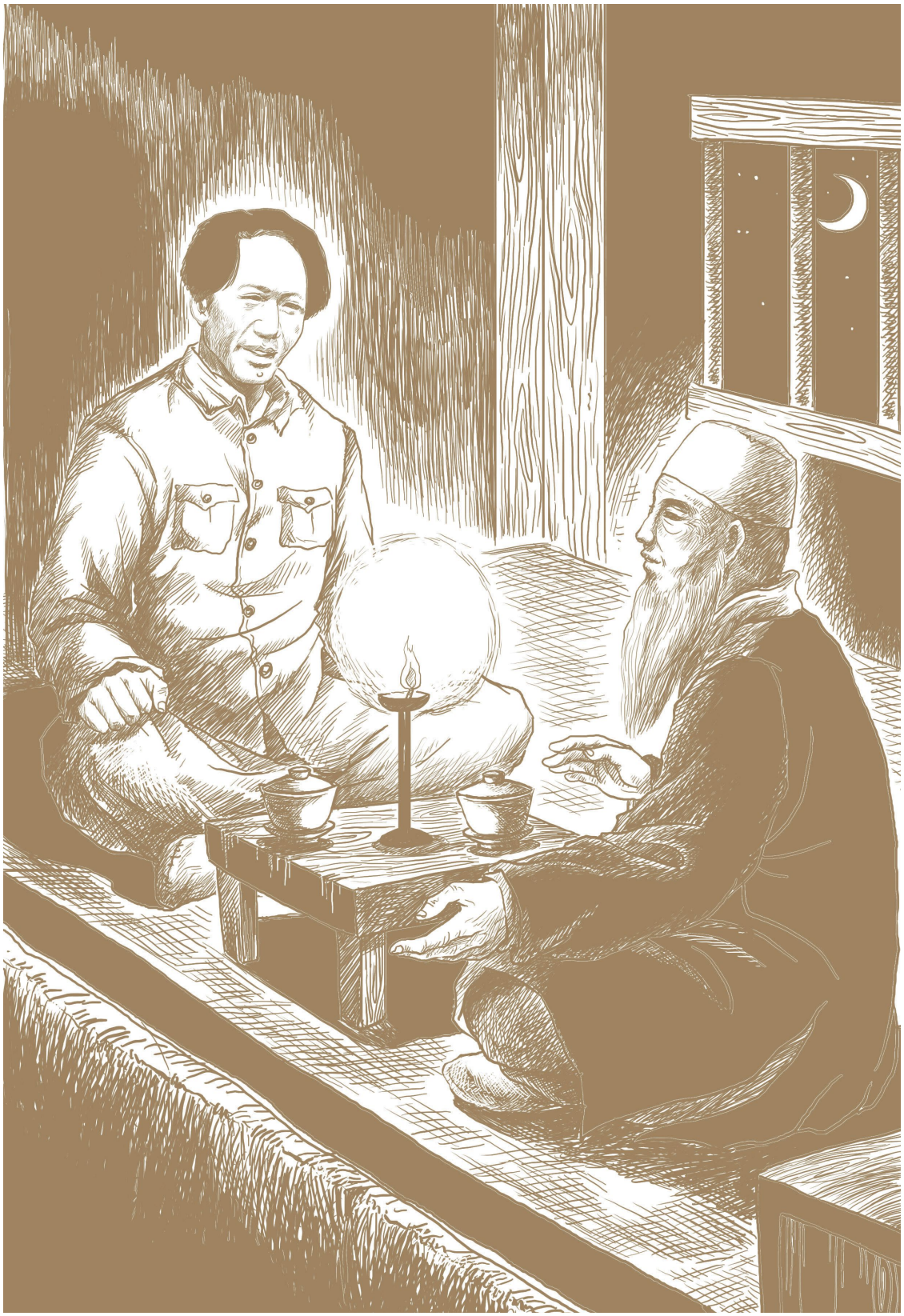
老阿訇马德海听说毛泽东到了单家集，特意请他到自己在清真寺的居所做客。毛泽东盘腿坐在土炕上，一边喝着盖碗茶，一边向马阿訇和在场的群众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马阿訇翻开《古兰经》向毛泽东介绍回族信仰，两人谈得十分投机，清真寺内时不时传出爽朗开怀的笑声。不知不觉到了黄昏时分，马阿訇邀请毛泽东在清

真寺吃饭，毛泽东愉快地答应了。按照回民待客的最高规格，给毛泽东准备了“九碗席”做晚餐。毛泽东把饭碗里的肉分给了身旁的乡亲，然后动情地说：“红军打仗就是为了将来让大家过上好日子。”

当晚，毛泽东住在清真寺北侧的回族村民拜文海家。拜文海担心毛泽东睡不惯北方人家的土炕，于是就卸下一块门板，放在土炕上让毛泽东休息。第二天拂晓，因敌情紧急，毛泽东率部离开了单家集。临别时，马阿訇把自己的一件黑大衣、一顶黑呢子帽子、一副祖传石头镜送给了他。毛泽东也回赠给马阿訇40块银元、6个大元宝。

1993年，在纪念毛泽东一百周年诞辰的日子里，单家集群众自发捐款修建了民族团结碑，上面用中阿两种文字镌刻着“伟大领袖 人民救星”八个大字，以深切缅怀一代伟人的丰功伟绩。

（执笔：何成江）



毛泽东与《清平乐·六盘山》

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宁夏厅，有一幅长3米、宽1米，用楠木作框，精心镌刻于褐色贺兰石屏上的气势磅礴《清平乐·六盘山》，这是毛主席1961年应宁夏人民的请求亲笔书写的。整幅作品刚柔并济、挥洒自如。驻足屏前，一幅感天地泣鬼神的革命画卷顺着历史的长河被缓缓打开……

1935年10月，巍峨的六盘山层林尽染，万里长空雁声阵阵。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固原青石嘴战役中痛歼前来堵截的国民党骑兵团，打通了通往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道路，在经历了无数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后，毛泽东率部翻越长征途中最后一座大山——六盘山。

时值仲秋，天高云淡，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同健步登上六盘山主峰。秋风带着黄土高原固有的泥土芳香迎面吹来，主席停下脚步，招呼身边的随从人员休息一下。他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摘下帽子，点燃一根烟深吸一口，回头高兴地对身边的同志说："这里可观三省，雄踞要塞，历来是兵家要地，翻过去我们就快到陕北了！ 同志

们,胜利就在眼前!”

塞北的秋天,天空蓝得明净透亮,望着一排排南飞的大雁,回想长征的磨难,展望革命的前途,毛泽东思绪万千,一首气势豪迈的《长征谣》诞生了:“天高云淡,望断南归雁,不到长城非好汉! 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 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 六盘山呀山高峰,赤旗漫卷西风。今日得着长缨,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长征谣》展示了中央红军长征金戈铁马、风雷激荡的雄姿,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反蒋抗日的决心,成为红军战士奔赴陕北的巨大精神动力。后来,《长征谣》在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中广为传唱。

在以后的革命岁月中,《长征谣》几经易稿完善,到了1957年,以《清平乐·六盘山》为题在《诗刊》创刊时首次公开发表,宁夏的六盘山也因此享誉世界。1959年,为了布置人民大会堂宁夏厅,宁夏回族自治区领导通过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向毛泽东转达了索要亲笔手书的大胆想法。1961年,毛主席在江西庐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利用开会之余亲笔书写了《清平乐·六盘山》这首诗词,并在给董必武的回信中说:“必武同志:遵嘱写了六盘山一词,如以为可用,请转付宁夏同志。如不可用,可以再写。顺祝健康!”

毛主席手书的《清平乐·六盘山》,充分体现了“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在六盘山精神的

鼓舞下，宁夏百万回汉儿女奋力建设美好家园，红绿六盘已经成为宁夏对外交流、打造文化旅游产业的一张名片，成为推动南部山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强力支撑。

（执笔：何成江）

中央红军的第一支骑兵连

1935年10月7日，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翻越了长征途中的最后一座大山——六盘山。六盘山下有条自北向南流淌的小河，名叫青石河。在青石河的岸边，有一个小村子，只有20来户人家。村子里面，那高高低低起伏不平的地方，排列着一些破败的窑洞和一些黄土垒砌的土坯房，零零星星地点缀在浓密的杨柳树中，成群结队的老鸦肆无忌惮地在上面起落聒噪着，一切都显得那么的单调和落寞，这个地方叫青石嘴。就是在这里，中央红军歼灭了国民党东北军的两个骑兵连，组建起了中央红军第一支骑兵连。

当中央红军前卫侦察部队翻越六盘山时，在青石嘴西面的山洼里抓到一个东北军的便衣探子。经审问得知，门炳岳骑兵第十三团负责向固原运送军装和弹药的两个连，刚进入青石嘴，正准备休息吃饭。得知这一情报后，毛泽东当即命令一纵队突袭青石嘴，打开东进的道路，并亲自在六盘山北麓的一个山坡上坐镇指挥。他仔细分析敌情和地形，指着远方对杨得志、杨成武等纵队首长说：“都看到了吗?山下那个村子就是青石嘴。据可靠情报，东北军两个连的骑兵刚到那里，别小看他，我们要消灭这股敌人，不让他们拦着我们的去路。”

毛泽东转过身来，从警卫员手里接过两块饼子，一边把它分成几块，一边问杨得志他们："都还没吃午饭吧？"杨得志他们点点头。毛泽东爽朗地笑笑，说："那好，分而食之，打下青石嘴，再吃好饭！"说完将饼子分给大家。杨得志他们从毛泽东手里接过饼子，也高高兴兴地吃了起来。

纵队首长迅速下达战斗命令，由四大队正面接近；一大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北面迂回插到青石嘴小山丘的后面；五大队迂回到南边，把平固公路切断，形成了一个钳形包围圈。部队接到命令，像猛虎下山一般扑向敌人。敌人这时正在吃午饭，万万没有料到红军突然出现，还没来得及解开缰绳上马，就当了俘虏。不到半个小时，战斗就结束了，敌人两个连的士兵大部分被歼灭和俘虏，而红军无一人伤亡。战斗结束后，中央红军首长审时度势，以缴获的100多匹战马为基础，将红一纵队侦察连改编为骑兵连，第一任连长梁兴初、副连长刘云彪，这就是中央红军第一支骑兵部队。

此后，这支威武的骑兵部队在党的领导下，南征北战，屡立战功，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执笔：叶长青）

“禁房”藏红军

1936年，红军西征到达同心城后了解到，敌占区洪家岗子的洪寿林是一位为人正直、乐善好施、声誉很高的伊斯兰教虎夫耶教派的教主。为了做好伊斯兰教上层人士的工作，红军便派人秘密和洪寿林接触。红军第一次来到洪家，受到已80岁高龄的洪寿林的热情接待。后来，随着关系的不断密切，红军代表常常穿便服到洪家交流信息。

有一次，红军代表又来找洪教主，被当地国民党民团发现。但因他们没有掌握真凭实据，不能贸然闯进洪教主家抓人，就派人在洪家周围秘密监视。洪教主怕红军被敌人抓去，就将两位红军代表藏在自己的“禁房”（教主修心盘道之地，任何人不得进去）。有空闲时间，洪教主就与红军代表交谈，经常谈到深夜。红军代表给洪教主讲解共产党的宗旨以及抗日救国的道理，深深地打动了洪寿林。7天后，为了确保两位红军代表的安全，洪寿林机智地举行了一次阿訇穿衣典礼，各地前来祝贺的教民让特务们头昏眼花。混乱中，洪教主将两位红军代表打扮成阿訇的模样，并派专人护送他们回到红军驻地。

此后，洪教主经常在各种场合向教民宣传红军。他说：“红军是仁义之师，必定胜利。”还动员教民给红军送

粮送草，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不久，红十五军团赶跑了洪岗子的民团。为了感谢洪教主对红军的支持，派军团政治部敌工部长唐天际和回民独立师师长马青年带领60多名战士，给洪教主送来150只羊和一面题有“爱民如天”字样的大红锦幛。

洪教主接受红军送来的礼物后，心情难以平静，立即派人宰了5只大肥羊招待红军，并给每个战士回赠了3块大洋。后来，他赶制了一面阿文锦幛，并特备两箱蜡烛，派人送到了同心红军指挥部，寓意“太阳之光，普照大地”。

洪寿林归真前，拿出红军送的锦幛对他的儿子洪清国说：“我留给你红军的这面锦幛，你要不惜一切将它保存下来，等待红军回来。”洪清国遵照父亲的嘱咐，将锦幛放在瓦罐里，又用蜡封口放在炕内妥善保存，新中国成立后又将它献给了人民政府。

（执笔：张志勇）

愛民如天
壽林回族大教主澧正

“红军井”的由来

1936年，西征红军来到宁夏南部山区，由于这里非常干旱，经常受到无水的困扰，部队中有好多南方人很不习惯。

一天中午，红军行军路过一条沟旁，看到沟底正好有一汪清水，长途跋涉口渴难忍的战士们一见到水，高兴得连蹦带跳跑到沟底，用手捧着水喝了起来，一口气喝了个肚儿圆。可是没过几分钟，大伙嘴里就像吃了生柿子一样，涩得嘴张不开，舌头动不了，嗓子也哑了。有的人急得抓耳挠腮，就是说不出话来。原来这种水不能喝，就是牛喝了也得拉肚子。

宁夏南部山区常年干旱，水贵如油。当地群众用水非常困难，不得不靠有限的雨水和雪水生活，每逢雨天、雪天就把雨水或雪水蓄在水窖里，加上锁由专人管理，以便节约使用。遇到干旱年景，水窖里蓄不上水，就发生水荒，人们只好到几里甚至几十里路以外去找水，大人挑，孩子抬，有毛驴的就用毛驴驮，艰难至极。

为了不和群众抢水，让水于民，红军制定了严格的用水纪律。每到一地，先调查地主家里有没有水井，如果有，就严加管理，派战士站岗，按规定的数量分配用水。先通知群众打水，乡亲们家里水缸都满了，才给各部队分水，红军战士还挑水上门送到群众家里。每到这时，红军

指战员和回民群众喜气洋洋，比开仓放粮还热闹。有的战士一边装水，一边哼着自己编的顺口溜“井水贵如油，一滴也别流；今天带足水，明天乐悠悠”。

当时红军规定，不经领导批准，任何人不得擅自到水井或水窖取水，除做饭饮用外，不准用水随便洗脸、洗脚、擦身子。红军维护群众利益，处处为群众着想，使当地的回汉人民深受感动。许多人家在自己用水都很困难的情况下，主动把水窖让给红军，有的还挑着水送到红军驻地，回汉群众和红军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西征红军进驻同心城后，生活用水仍然是最大的困难。当时同心城有几口井，但水量不大。为了解决用水困难，红军在清真大寺西南处找到一口遗弃多年的老井，因年久失修，无人掏挖，井底杂物沉积，水量很小。红军在征得群众同意后，按照回族风俗，派了几个回民战士重新掏挖，使这口老井又冒出了清澈的甘泉。红军还加固了井口，新修了井台，并设岗哨日夜看护。废井得以重新利用，缓解了同心城里军民的用水困难，回民群众对此赞不绝口。为了纪念红军的深情厚谊，当地回民群众就给这口井起名叫“红军井”。

（执笔：张志勇）

同心城里结同心

每个人在自己新婚的大喜日子里，总会收到来自亲朋好友的真诚祝福，诸如“白头偕老”“永结同心”等。说起来，历史上咱们家乡宁夏还有一个“永结同心”的革命故事呢！

1936年11月，红军来到了宁夏的同心城。这时，朱德总司令收到了一份中央卫生院医生傅连暲（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务院卫生部副部长）呈送的请求批准他与红军女战士陈真仁结婚的报告。

傅连暲原籍福建长汀，曾在那里开办一家私人医院。1933年，中央红军到达长汀，傅连暲积极参加红军，跟随红军进行长征。1936年，红军长征到达同心城后，傅连暲经常挤时间给当地群众治病，在当地群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傅连暲和红军女战士陈真仁患难与共，产生了纯洁的爱情。到达同心后，他就给朱总司令写了结婚报告，这年他已经42岁，朱总司令看了报告后很高兴地说：“同心城这个名字好，你们就在同心城举行婚礼吧！”

举行婚礼那天，朱总司令指示红军战士特地送来两

只羊，总部的大师傅精心准备了十多道菜，为傅连暲和陈真仁举办了一场简单而热闹的婚礼。虽然没有什么名贵菜，但在那个时候，在那样一种艰苦的条件下，有十多道菜已经是十分丰盛的了。朱总司令等红军首长都来参加婚礼，并亲自当他们的证婚人。婚礼上，朱总司令和几位领导同志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著名的马海德医生因事路过同心城，听说这件喜事后，也前来登门祝贺。

在同心举办的这次婚礼充满了欢乐喜庆的气氛。只可惜婚礼刚刚结束就突然接到上级指示，部队要连夜紧急出发，因为国民党胡宗南的部队已经从南面追上来了。多年后，傅连暲和陈真仁这对革命伴侣回忆起朱总司令亲自为他们举办的这次婚礼，仍然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执笔：胡伟东）

邓小平背粮

七月的宁夏南部，正是盛夏三伏，真可谓骄阳似火。太阳高高地悬挂在半空中，朝大地上泼洒着火辣辣的阳光。走在光秃秃的山冈上，阵阵热浪扑面而来，好比踩在反扣的热锅底上，真有些烙烧饼的感觉。

一队红军战士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他们虽然身上背负着沉重的背篓，头顶着炎炎烈日，但个个精神抖擞。“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嘹亮的歌声在山谷中回荡。走在最前面的汉子虽然个头不高，但身体强健、动作敏捷，豆大的汗珠从他的额头上落下。他一边擦拭着汗水，一边用浓浓的四川口音招呼走在身后的战士们：“后面的跟紧噻，再加把力，马上就到目的地喽！”战士们争先恐后，队伍在羊肠小道上快速行进。

这是驻扎在七营镇的红一军团政治部的干部、战士们在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的带领下背粮。

当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红军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政治部的干部、战士们有时要挤出时间打点野味来改善生活，有时还要到三十里以外的后山去背粮。

一天早晨，政治部接到命令，全体出发，到后方山里去背粮。当背粮队伍整装待发时，邓副主任急匆匆地赶

来了，一声不响地加入了队列，但还是被战士们发现了。

战士们见邓副主任也要去背粮，纷纷嚷了起来。这个说“邓副主任，你工作太忙，就别去了吧！”那个说“背粮是我们的事，你忙你的吧。”一个高个子战士晃动着自己的臂膀大声说：“看看我这身体，背个二百斤不在话下，你的那一份，我背了。”“是啊，我们每人多背一点，问题就解决了，你还是忙去吧。”另一位战士也说。战士们连说带劝地把邓副主任从队伍中拉了出来。

“搞啥子嘛，命令是我下的，我能不带头执行?要吃饭，就得干，谁也不能特殊！”邓副主任努力挣脱战士们的拉扯，又回到了背粮队伍。战士们见邓副主任一定要去，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背粮地点距七营镇有三十多里，虽然不是山大沟深，但道路崎岖，队伍行进很困难，但战士们有说有笑，不知不觉到达了目的地。战士们将一满袋一满袋的高粱放进了自己的背篓，有的还嫌太轻，再往自己的袋子里添点。邓副主任也将满满一袋高粱装进了自己的背篓，战士们见到这一情景又嚷了起来。邓副主任不顾战士们的劝说，背起来就走，和战士们一道踏上了归途。

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与广大战士们同甘苦、共患难的风格和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执笔：王俊昌）

一张珍贵的照片

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有一张“红军小号手”的照片。照片里的小号手英姿飒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可是照片中的人是谁？又是谁留下了这个宝贵的历史瞬间呢？

我告诉你，这张照片是1936年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宁夏同心县的豫旺堡拍摄的。这张照片最早出现在他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一书中，它向世人形象地展现了中国工农红军抗日救国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

1936年的夏天，西征的红军第一军团在彭德怀司令员的带领下，来到了宁夏同心县豫旺堡。不久，埃德加·斯诺来这里采访，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其中，“红军小号手”的照片被斯诺先生放在了《西行漫记》一书的封面上，并在书中作了这样一段描述：“在豫旺堡高高结实的城墙上，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号，这个堡垒一样的城中有一角落飘着一面鲜红的大旗，上面的黄色锤子和镰刀在微风中时隐时现，好像后面有一只手在抚弄一样。”在书中“红小鬼”一节又写道：“一天早上，我登上豫旺堡又宽又厚的黄色城墙……在开了枪眼的雉堞上兜了一半，我就遇见一队号手——这时总算要休息，这叫我感

到高兴。因为他们响亮的号声已连接不断地响了好多天了，他们都是少年先锋队队员，不过是小孩子，因此我停下来与其中一个号手谈话时就采取了一种多少是父辈的态度。他穿着网鞋，灰色短裤，戴着一顶褪了色的灰色帽子，上面有一颗模模糊糊的红星。但是帽子下面那个号手可一点也不是褪色的，红彤彤的脸，闪闪发光的明亮眼睛，这样的一个孩子，你一看到心就软了下来，就像遇到一个需要友情和安慰的流浪儿一样。我想，他一定是非常想家的吧！可是很快我就发现自己的估计错了。他可不是妈妈的小宝贝，而已经是一位老红军了。他告诉我，他今年 15 岁了，四年前在南方参加了红军。”

那么，这个红军小号手究竟是谁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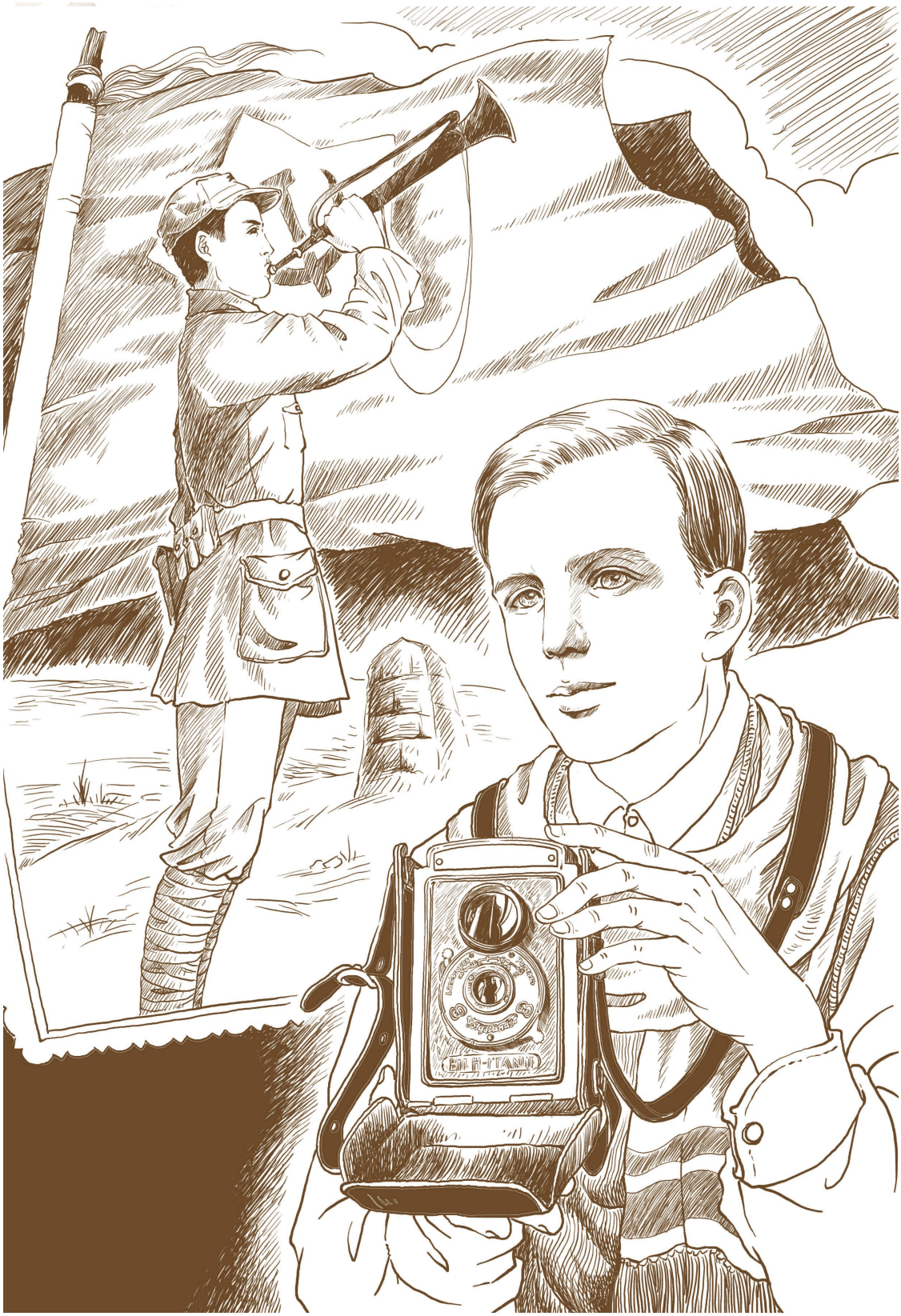
新中国成立后，有关同志经过长时间调查，查阅了大量资料，都没有见到关于这个红军号手的记载。又采访了当时参加过西征战役的红军指挥员萧华、杨得志等人，还是没弄清楚。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研究人员终于在军事博物馆查到了有关资料。

原来，红军在宁夏同心与国民党军对峙时的一天，国民党军队突袭了红军后勤部门，把红军筹集的200只羊、100多头牛及40多头驴子驮的布匹、棉花全部掠走，还抓去几名红军战士。红军战士们得知后非常愤慨，纷纷请战，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派教导营总支书记谢立全率领两个连，军团侦察科长唐子安和营长何德全率两个连，分两路包抄袭击了敌师部，营救出被俘的同志，夺回了牲畜和物资，还缴获400多匹马和部分武器弹药。

为表彰这次战斗胜利，上级奖励谢立全同志一套新军装，当谢立全穿着新军装和战友们一起畅谈战斗情景时，斯诺正好经过，这位衣帽整齐、英俊潇洒的谢立全引起斯诺的注意，他把谢立全叫来，拉到豫旺堡城墙上照了相，留下了这一珍贵的历史镜头。

在多年的戎马生涯中，谢立全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少将军衔。直到1972年，当将军得知自己身患癌症时，才派秘书到军事博物馆，把这张照片翻拍回来留给子女们。他在给子女的信中说："这张相片是历史的产物，你我知道就行了。人怕出名猪怕肥，如果不虚心谨慎、戒骄戒躁，是要跌跤的。"谢立全将军革命一生，仍保持着红军的本色，这是多么崇高的思想境界。

（执笔：韩林森）



西征红军在宁夏的五次战斗

1936年5月，为创建新的根据地，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促进全国抗战新局面的形成，中央革命根据地1.7万余人的红军部队奉命西征。西征红军在宁夏机智勇敢地与敌人战斗，夺取了盐池、预旺、同心、海原等地，宁夏南部山区一度成为红军部队的大本营。

乘胜挥戈克盐池

红十五兵团下辖的红七十八师在师长韩先楚、政委崔田民率领下，攻克靖边、定边后乘胜挥戈，于6月19日晚到达盐池城外。

盐池县城又名花马池，地处宁夏、陕西、内蒙古三地交界地带，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县城虽不算大，但城墙又高又厚，十分坚固，易守难攻，由敌马鸿逵部骑兵二团一营和敌保安团等地方武装驻防。

红军七十八师骑兵侦察连先对盐池进行了外围侦察。敌兵在城墙上看到红军战士一个个都那么年轻，就大声议论说："都是些娃娃兵，还能打仗？""红军没有大炮，我们的城墙这么坚固，他们怕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了！"敌人气焰十分嚣张。

红军到达盐池后，部队一面抓紧时间休整，一面做群众工作。师、团指挥员们勘察地形，分析敌情，研究攻城办法，决定：以二三二团部署在城北为主攻，其他两个团分别在城东、城南助攻，天黑发起攻击，天亮前结束战斗。

各团接受战斗任务后，积极进行攻城的准备工作。红军虽然缺少火炮等重型武器，也没有必要的爆破器材，但战士们精神抖擞，信心百倍。20日夜，趁着天黑红军很快进入指定位置。

当嘹亮的军号骤然响起，鲜红的信号弹划破夜空时，红军分别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发起猛攻。红军战士前赴后继，冲向城边，架起云梯，争先登城。敌人不甘灭亡，疯狂反扑，虽然几次将登城红军压下去，但红军勇士们再次组织火力掩护，继续强攀云梯，终于冒着枪林弹雨从北城墙登上城头，同敌人展开激烈的肉搏战，终于取得攻敌的突破口。接着，后续力量源源涌上城头，迅速扩大战果。激战中，敌营长被击毙。残敌群龙无首，溃不成军。21日凌晨3时，鲜艳的红旗插上了盐池县的城头。

神兵天降下马关

下马关是国民党预旺县政府所在地，城内居住的全是回民。城墙外砖内土，高3丈多，宽1丈余。

6月11日夜，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突然兵临下马关城下，将县城团团围住。驻城守军除预旺县民团外，还有马鸿逵骑兵团第二营，马部守军戒备森严，企图据险抵抗。

红军一边派小部队轮番发动小型攻击，骚扰疲惫守军，使敌军不得安宁；一边派宣传队发动政治攻势，对城内喊话劝降、投传单，分化瓦解守军。红军还采取从城外挖地道的办法接近城墙，准备炸开城墙突袭。

红军的这些办法，使城内守军十分恐慌，每天都有零散官兵出城投降或逃跑。红军分析敌情后，找来木匠赶制几十架带轮子的木梯，紧锣密鼓地做好强攻准备。27日晚9时，红军先以火力突击南门和西门，东门、北门也响起了零星的枪声。敌守军遂将东门、北门兵力调至西门和南门，各增加机枪3挺。深夜11时，红军向东门、北门同时发起强攻，所有机枪齐射，守军火力很快被压制。突击分队推着轮梯，迅速冲到城下。激战半小时后，红军分别从北门和东门攻进城内，乘势攻占守军指挥所，守军见大势已去，便纷纷缴械投降。

红军攻克下马关，解除了红军西征部队的后顾之忧，打开了根据地与宁夏的通道。

“先礼后兵”解放王家团庄

王家团庄为同心县城东南最大的一个村庄，分南北两个堡子，对称坐落，堡子围墙高厚。全村有2000多人，属回民聚居区。

6月12日，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一部和回民独立师到达王家团庄附近。王家团庄恶霸王彦秀在红军到来之前，实行坚壁清野，把庄上有存粮的群众和商贩数百人关

入北堡子里，企图用断粮之计逼走红军。

21日，红军在堡寨的东、南、西三面架起机枪，威慑敌人。回民独立师师长马青年带人去找王彦秀谈判，王彦秀紧闭大门不露面，只派其弟王彦海在墙头上叫喊："你们早点收兵吧，你们有枪没有子弹，别吓唬人！"王彦海说着便举枪准备向墙下红军射击。在此瞬间，只听"叭"的一声，原来是红军一位排长气愤不过开枪射击，王彦海应声倒下。接着红军一面在墙下挖洞，一面强攻，顿时枪声大作。堡子内早已混乱不堪，还没等王彦秀明白过来，壮丁队就打着白旗高喊投降，并打开堡子大门。红军官兵蜂拥而入，当即活捉了敌方长官，解救了被关押的600多名回民群众。

攻占北堡子后，红军决定"先礼后兵"，师长马青年带5名战士到南堡子找王彦清谈判。王彦清到堡子墙上一看，马师长亲自来了，还带着礼物。他叫人打开寨门，带全家人前来迎接。见面后，马师长讲了红军保回保教、信仰自由和共产党积极抗日的主张后，王彦清表示欢迎红军到来，并愿意献出全部家产。马青年说："红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不是来没收你们家产的，我们实行买卖公平，只要你不和红军作对，为群众多做好事就行了。"王彦清听了很感激，把一部分粮食、布匹和十几匹马献给红军，又交出了十几条枪。红军除枪支外，其余都按价付了现款。临走时，王彦清又送给马师长两匹乘马。王家团庄解放，扩大了红军在当地回族群众中的影响。

红城水反击战

红七十五师攻克下马关后，次日与红七十三师合兵包围了下马关以北40里的韦州城。

宁夏军阀马鸿逵对韦州的防务非常重视，恐韦州有失，危及金积、灵武和银川，遂派骑兵第二团团长马光宗率1300多人前往增援。

7月4日晨，红军正忙于攻城，对增援之敌的到来尚未发现。当发觉背后有敌援兵时，便立即回头迎击。战至下午2时许，红军因腹背受敌，一时难以取胜，遂退出韦州，到达红城水一带，与驻在这里的红军会合。

马光宗率队向红城水搜索前进，到达红城水后立即嚣张地发起攻击。下午，红军主力由煤山出动，以猛烈的火力反击来犯之敌。6日晨，敌机飞临红城水上空进行侦察，发现形势不利，急忙飞回报告马鸿逵。马鸿逵命令马光宗即刻率队撤退到金积县，以免被红军消灭。红军从韦州撤走，马鸿逵以为红军软弱可欺，便驱兵进攻，不料遭到迎头痛击，伤亡300余人。

七营阻击战

红一军团6月初经环县进入宁夏，占领宁夏东部要镇预旺堡，接着继续西进，于6月中旬，相继占领清水河沿岸的七营、黑城诸要点，并向固原、杨郎庄逼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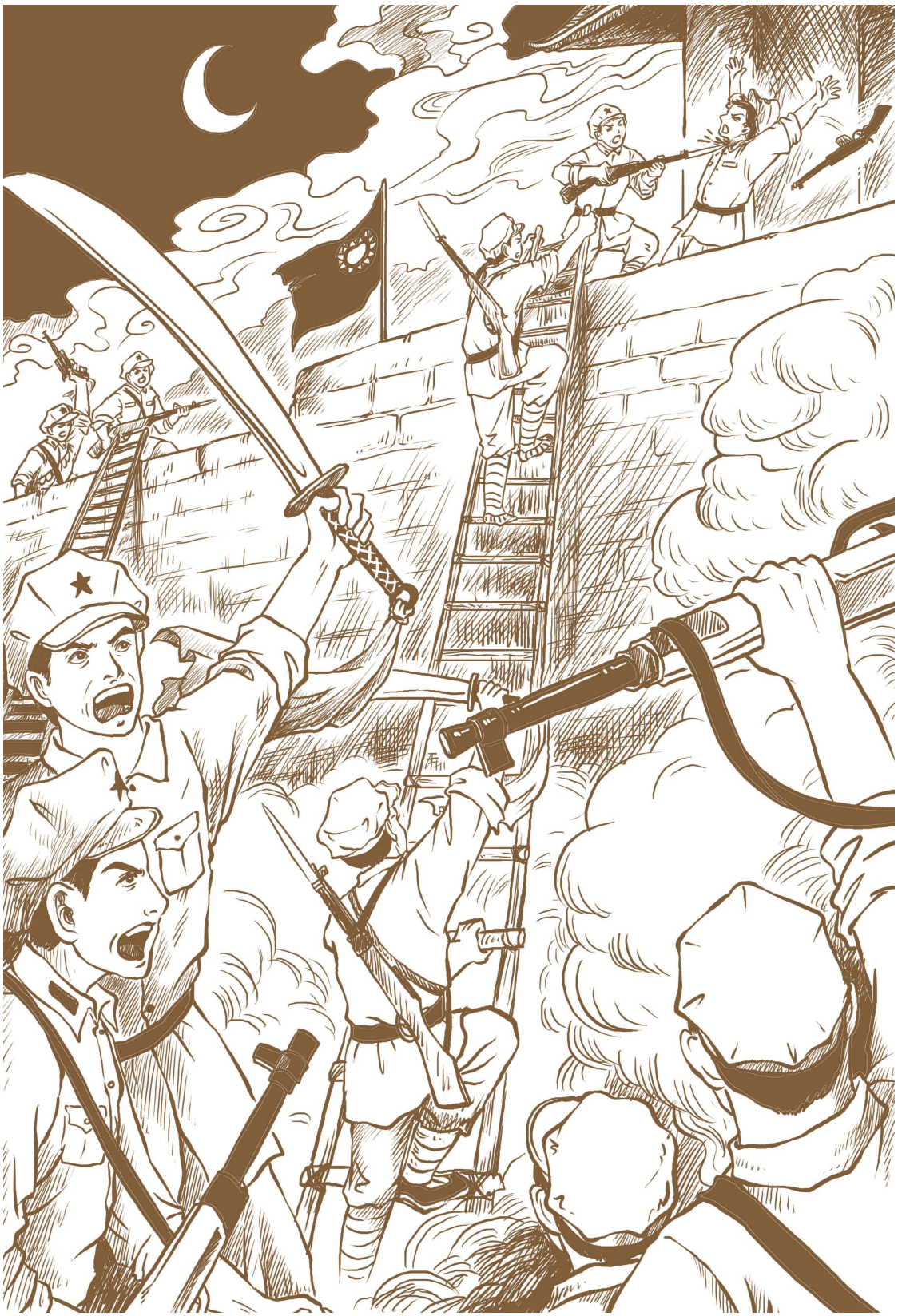
红军占据清水河东岸的七营后，几经败退的马鸿宾

心里像搁了块大石头沉甸甸的。

7月初，马鸿逵为打开固原至中宁、银川的通道，便与东北军商定联合进攻红军。8日拂晓，马鸿宾部与东北军向红军发起进攻。遭到红军主力的猛烈反击，战斗非常激烈。七营附近有一条大沟叫阎家沟，沟深坡陡，地形复杂，是进入七营的必经之路。红军已在沟内预先设伏，正好白凤翔部的先头团一头钻了进来，陷入三面包围之中。待敌人进入沟底之后，红军猛烈开火，群敌突遭打击立刻乱作一团。经过一小时激战，敌先头团死伤300多人，其余全部被俘，红军缴获大批枪械及骡马。战后，红一军团又主动退出七营，进驻清水河东岸。为了争取东北军抗日，红军将所俘人员、马匹、枪支全部送还白凤翔，连他们丢失的5000发子弹和马鞍子也都找到一并送回。

七营一战，红军狠狠地教训了白凤翔部，使他以后再不敢轻举妄动了。

（执笔：张志勇）



回民独立师的斗争

1936年5月，红军西征作战的主要区域是甘宁回族聚居区。为了顺利开展工作和帮助回族群众谋求解放，西征红军以团为单位成立了回民工作团。红十五军团挺进到豫旺一带后，经西征红军总部批准，成立了回民独立师，由回族干部马青年任师长，欧阳武任政治委员，李铁民任参谋长。这就是共产党在我军历史上建立的第一支回族武装力量。

回民独立师刚成立时，仅有一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排，共100多人，枪100多支、战马50多匹。回民独立师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政策，团结和发动群众，在剿灭土匪和巩固革命政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得回汉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回民独立师成立后，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战斗，在同心、韦州、高崖、关桥堡、大小罗山一带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先后参加了王家团庄、下马关和红城水等战斗，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王家团庄战斗中，回民独立师通过开展群众工作，摸清了王家团庄的基本情况，师长马青年先后几次带人与敌人谈判，对瓦解敌军斗志起了重要作用。在下马关战斗中，回民独立师对敌军展开政治攻势，向守

城的伪兵和壮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与民族政策，使敌军军心涣散，为攻克下马关发挥了重要作用。红城水战斗中，回民独立师和红七十三师在北塬与敌军展开激战，战士们不顾敌骑兵的猛烈冲击，英勇杀敌，击毙和俘虏敌军、土匪200余人，打死打伤战马200多匹，挫败了敌人的进攻。

彭德怀司令员十分关怀回民独立师的成长，在武器弹药、人员构成、部队给养等方面，给予回民独立师极大支持和帮助。在豫旺堡，彭德怀司令员把师长马青年、政委欧阳武、参谋长李铁民找去，亲自传授革命斗争经验。他要求回民独立师扩大地方武装，巩固政权，剿匪反霸，为民除奸；动员组织群众参加红军，壮大红军队伍；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启发群众觉悟；培养民族干部，以适应回民地区工作；打土豪、筹粮筹款，解决红军供给，救济贫民。

回民独立师在作战间隙，发动群众剿匪反霸，保卫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当时，同心一带土匪活动十分猖獗。这些土匪出没无常，抢劫百姓，暗杀干部，破坏基层政权，对新生的革命政权和群众的生命财产危害极大。

在剿匪斗争中，回民独立师坚持以军事打击为主，辅以政治分化瓦解的方针，根据具体情况，与匪首进行面对面的谈判，争取他们放下武器，改邪归正。豫旺堡杨廷栋、杨廷杰原系马鸿逵部团长和营长，有100来人的私人武装，称霸一方。因触怒马鸿逵，被分别关押在下马关和宁夏城。红军解放下马关后，回民独立师释放了杨廷

栋。为了团结教育杨廷杰，回民独立师将没收他的马匹和300块银元等全部还给他，在了解了他的身世后，还给他治好枪伤，动员他参加抗日游击队。但杨廷杰死心塌地与人民作对，不肯悔改，还在锁家岔组织游击队哗变。回民独立师在向群众揭露了他的罪行后，予以坚决镇压。经过回民独立师的不断打击，许多土匪被消灭，一些没有被消灭的土匪，也有所收敛，不敢胡作非为。在剿匪斗争中，回民独立师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政委欧阳武、参谋长李铁民等同志英勇牺牲。

回民独立师的建立，是西方野战军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结果。它影响和动员了豫海地区众多回民群众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培养了一批回族干部，在党和回族人民的联系中起了纽带和桥梁的作用。“西安事变”后，西征红军撤离豫海地区，回民独立师也随之东移。因回民独立师的革命活动在当地人民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回族人民反抗国民党暴政的斗争此起彼伏，不断发展，许多回族志士投奔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执笔：王辉仁）

陈赓师长与红军回民连

1936年，红军西征到宁夏后，广泛深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严格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得到了广大回族同胞的拥护和支持。

6月初，红一军团攻克甘肃陇东曲子镇后，俘获马鸿宾部大批人马，被俘的士兵中有许多出身贫苦、决心弃暗投明的回族青年。于是，军团组建了红军回民连。陈赓师长十分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特意为回民连建了回民灶，从各方面照顾回民战士的生活。

9月底，军团组成特别支队开往静宁、会宁一带去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回民连随师部驻兴隆镇。兴隆镇是回民聚居地区，两年前红二十五军曾在此住过，在回民群众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回民连经常帮助群众干活，与回民群众建立了鱼水亲情。回民青年踊跃参加红军，使回民连由原组建时的50多人迅速发展到180多人。

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回民连也随大军向海原地区进发，到达关桥堡。两三天之后，又转移到预旺堡。由于参加红军部队的人数越来越多，粮食供应更加困难，战士们常常忍饥挨饿。这时，陈赓师长来到回民连，他听说战士们一天没有吃饭，就对连长说："这么多人，不吃饭怎么能打仗，要想办法嘛。"说完就匆

忙走了。过不大一会儿，陈师长派人给连里送来了一头牛，宰了解决饥饿问题。不料，肉刚下锅，敌人就来了，大家只好饿着肚子转移。这次是长途行军，异常艰苦，走的尽是崎岖不平的小道，加上大雪覆盖，稍不留意，就会滑倒跌伤。战士们衣着单薄，许多同志没鞋穿。寒冷、饥饿、疲劳一齐向战士们袭来，但大家都顽强地坚持着，没有一个人掉队。

红一师进军到环县河连湾后，隐蔽集结在山城堡以南地区，回民连参加了山城堡战役。战斗打响后，师部从特务队和回民连抽了20多名战士组成敢死队，由陈赓师长亲自率领，一举攻下了敌人的一个最坚固的火力点。接着，红军将其他火力点先后全部攻下，敌军大败。这一仗，红军共歼敌一个旅又两个团，取得了巩固陕甘苏区的决定性胜利。战斗中，回民连战士英勇杀敌，有十多名同志光荣牺牲，在回民连的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西安事变”后，红军奉命南下，回民连经过整编，开赴抗日前线，投入了新的战斗。

（执笔：王辉仁）

回民解放的先声

1936年10月20日的宁夏同心，晴空万里，阳光照耀着连绵起伏的山岭，古朴而雄伟的同心清真大寺沐浴着金色的朝辉。回汉人民身着节日盛装，敲着锣，打着鼓，从四面八方涌向清真大寺。许多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拄着拐杖前来“跟会”，就连按宗教习俗不能随便外出的回族妇女，也戴上了盖头走出家门。同心城里，锣鼓喧天，红旗招展，人们兴高采烈，载歌载舞。“胡琴拉起来，唱一个苏维埃，苏区的地方人人爱，看见吗？苏区的人民好自在，一切剥削都打倒，生活多痛快！”这发自广大回汉人民肺腑的歌声，表达了回汉人民对苏区的无限热爱和获得解放的兴奋之情。

七八位回族老人饶有兴致地攀谈着：“听说这次政府的领导都是我们自己选的。”“可不是吗?政府的领导由老百姓选出来，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是头一回听到，也是头一回见到。”“哈哈，这回我们可是真正当家做主了！”……

上午9时，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大会正式开始。回族群众代表、红军代表以及来自其他方面的代表和各界知名人士在主席台就座。

当筹备委员会负责人李富春庄严宣布“豫海县回民

自治政府成立大会现在开始”时，会场里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接着，来自各界的代表向大会赠送了贺词、锦幛和匾额。

大会进行了三天时间，代表们怀着满腔的政治热情，讨论了回民自治和土地问题以及抗日救国等重大事项，通过了回民自治政府的各项议案，民主选举产生了回民自治政府领导人，贫农出身的回民马和福当选为政府主席，李德才当选为副主席。10月22日，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宣告正式成立。

早在红军西征之初，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就提出，要帮助回族人民建立自治政府。西征红军进入宁夏后，把帮助回族人民建立自治政府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积极开展回民工作，帮助回族人民实现民族事务自治。红军指战员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向回族民众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民族政策，启发回民觉悟。

1936年6月，西征红军相继解放了豫旺、海原大部分地方后，党中央决定成立“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作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央派李富春协助筹备建立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

李富春来到同心后，组织成立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筹备委员会，研究讨论了回民自治等重大问题，起草了回民自治政府的各种决议和文件，拟定了回民自治政府领导人人选名单，决定于10月20日在同心城举行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大会。

消息传开，同心的城镇和乡村都沸腾起来了，广大回汉群众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不少回族青年为迎接和庆祝回民自治政府的成立，打破回族不搭台做戏的传统习俗，自编自演文艺节目。有的回族妇女精心缝制了各式服装，准备参加大会。整个同心沉浸在激动和欢乐的幸福之中。

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成立，是红军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结果，完全体现了回族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是回族人民解放的先声。这是我国历史上创建的第一个县级回族自治政府，是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回族聚居区新的尝试。

（执笔：王俊昌）

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主席马和福

在宁夏，有许多为解放事业而献身的英雄。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主席马和福，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名副其实的宁夏回族英雄。

马和福于1893年出生在甘肃省河州（今甘肃临夏）一个贫苦农民家里，4岁时随祖父和父母逃难来到宁夏西吉县落户。1920年海原大地震后，又投奔在同心张家塬乡险崖子村扛长工的大哥马金山，开始了他在豫旺堡一带当长工、打短工的生活。1927年，他离开了豫旺堡，流浪到金积鸿乐府给人当长工。1935年，马和福又拖家带口回到豫旺堡南塬刘家岗子村居住。他出身贫苦，深知穷人的苦难，乐于帮助穷人，在穷人中的威信很高。

1936年6月，彭德怀率领西征红军攻占了军阀马鸿逵占据的豫旺堡。马和福见到红军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把地主的牛羊、布匹分给穷人，废除了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在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政策的影响下，马和福对革命有了一定的认识。他把红军当作亲人看待，主动帮助红军做事，每天走东跑西、上山下洼做宣传，揭露敌人的造谣欺骗。在他的宣传带动下，许多回汉群众

陆续返回家园，还纷纷给红军送“欢迎粮”，捐“抗日款”，帮助红军解决吃粮吃水问题。

豫海县解放后，建立了临时苏维埃政府。在一次由红军回民独立师师长马青年主持召开的军民座谈会上，马和福讲述了自己苦难的经历，表达了跟共产党闹革命的决心。7月，马和福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中共豫旺堡区委成立后，为适应广大回族群众寻求自身解放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的新形势，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回族的事情由回族自己解决”的指示精神，党中央决定筹建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根据中华苏维埃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在西征红军和陕甘宁省委的帮助下，在豫旺县西部和海原县东部地区筹建第一个县级回族自治政权——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10月20日，在历史悠久的同心清真大寺，举行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成立大会。22日，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正式宣告成立，马和福当选为主席。

在党的领导下，马和福深入山乡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联系、团结和争取回民中有威望的教主、阿訇，利用回民上清真寺的机会，动员穆斯林为红军筹粮筹款。他到同心城、豫旺堡、王家团庄等地向群众宣传时说：“我们豫海地区的各族人民得到了解放，但宁夏川的劳苦大众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要打到宁夏城去，解放全宁夏！宁夏，宁夏（谐音‘硬下’），要硬硬地下，才能拿下！”马和福说话稍带河州口音，铿锵有力，感人肺腑。

马和福发动和组织群众成立了回民解放会与农会，

还建立了一支有40多人的县回民游击队，并亲自担任队长。他带领游击队员协助红军侦察敌情，打击不法豪绅，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宗教政策，动员妇女为红军战士捻毛线、织毛袜，发动回族乡亲筹集粮饷。先后为红军筹粮6万多斤、银元8万多块、滩羊二毛皮和老羊皮大衣4000多件以及许多布匹等支前物资。

11月中旬，红军向东撤退以后，军阀马鸿逵的军队就侵占了豫海县，大搞“清党”“清红”，整个豫海县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自治政府工作被迫转入地下。马和福谢绝了组织上要他跟大部队一起撤走的要求，只要了四五条枪，在同心一带坚持同敌人打游击。此时，在陇东边区工作的马青年受党组织委托，秘密到豫海县寻找未撤出的马和福。由于敌人严密封锁消息，马青年没能与马和福及时取得联系。后因坏人告密，马和福不幸被捕。国民党宁夏省主席、军阀马鸿逵多次派人对他严刑逼供，并亲自审讯，但马和福始终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敌人软硬兼施，严刑拷打，终因马和福坚贞不屈而一无所获，于是把他押回同心秘密枪杀。临刑前，敌县长问他：“你还有什么话要讲的吗？”马和福拖着沉重的镣铐，坦然地说：“为民族的解放，虽死无悔！”

1937年4月3日，马和福在同心城西门外河滩上英勇就义。

（执笔：王辉仁）

国际友人斯诺在宁夏

埃德加·斯诺是美国著名的新闻记者和作家，中国人民熟知的国际友人和老朋友。

斯诺1905年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城，青年时代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和印刷学徒。大学毕业后，他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在堪萨斯城《星报》和美国《纽约太阳报》初露头角。

1928年，在中国大革命陷入低潮的时候，斯诺来到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1934年，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同时担任美国《纽约太阳报》和英国《每日先驱报》特邀记者。在这一时期，他认识了美国著名的进步新闻记者史沫特莱，还和鲁迅、宋庆龄以及一些中共地下党员有所接触。

1936年是中国局势发生重大转变的一年，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引起了国际友人的深切关注。斯诺带着当时无法理解的关于中国革命与战争的无数问题，6月间由北平出发，经过西安，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国民党以及西方世界对中国革命严密的新闻封锁，进入陕甘宁边区。首先，他和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搜集了关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然后，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宁夏境内的

红军西征前线——豫旺堡进行战地采访，他是在红色区域采访的第一位西方新闻记者。

豫旺堡是西方野战军总部和红一军团司令部所在地。斯诺和另一位国际友人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的到来，受到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和红一军团首长的热烈欢迎。8月22日，西方野战军总部为斯诺一行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斯诺在欢迎会上即兴演讲，他动情地说："你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拥护你们。我这次要把你们几年来艰苦奋斗的经过，去告诉全世界无产阶级知道，最后你们应努力用中国的革命模范来推动和领导全世界革命。"演讲结束时，他激动地高呼："中国革命万岁！红军胜利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斯诺观看了部队的演习后，和海德姆骑上红四师赠送的黑色骏马绕场奔跑了几圈。他们矫健的骑姿，赢得了战士们热烈的掌声。

斯诺在豫旺堡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部队之中，进行紧张的采访活动。他多次采访彭德怀司令员，深入了解红军的精神境界和作战原则。他参加红军政治集会，了解红军战士的革命战争热情，参观连队布置的"列宁室"。他还通过对回族红军战士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的了解，赞扬红军的民族宗教政策，揭露国民党地方军阀对人民的压迫和他们的奢侈生活。

8月26日，斯诺应徐海东军团长的邀请，从豫旺堡前往第十五军团采访，受到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

斯诺通过实地采访，获得了大量有关红军的珍贵资

料，撰写成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向全世界披露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真实情况。他在书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描述了红军在宁夏境内的活动，记录了回汉群众与红军战士的鱼水之情；用大量事实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经济、军事尤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是他，把宁夏第一次介绍给了世界人民，也为世界人民了解宁夏打开了一扇窗户。

（执笔：叶长青）

国际友人马海德在宁夏

国际主义战士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1910年出生于美国纽约的布法罗城。

海德姆1933年从瑞士日内瓦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来到上海，旧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深深地触动了他，于是他决定留在中国。

1936年7月，经宋庆龄介绍，他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一起辗转千里，穿过重重封锁来到陕北，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

8月，海德姆和斯诺来到西征红军的大本营豫旺堡，受到了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等人的热烈欢迎。斯诺随即展开了采访活动，而海德姆则在当地施展他高超的医术，和红军军医一起给当地回族群众看病、传授卫生知识。

祖籍黎巴嫩的海德姆，虽然出生在美国，但受父辈的影响，会讲阿拉伯语，能写阿拉伯文，因而备受回族群众的欢迎。当地群众听说红军中来了一位“土耳其”人，精通教律，又写得一手好经文，大家奔走相告，争相请他到家里做客。与回族群众多次亲密接触后，他发现这里由于偏僻落后，认识汉字的没有几个，但是因为学习《古兰经》的需要，认识阿拉伯文的人反而较多。他将这一发现报告红军总部，总部首长就让他把一些标语口号译成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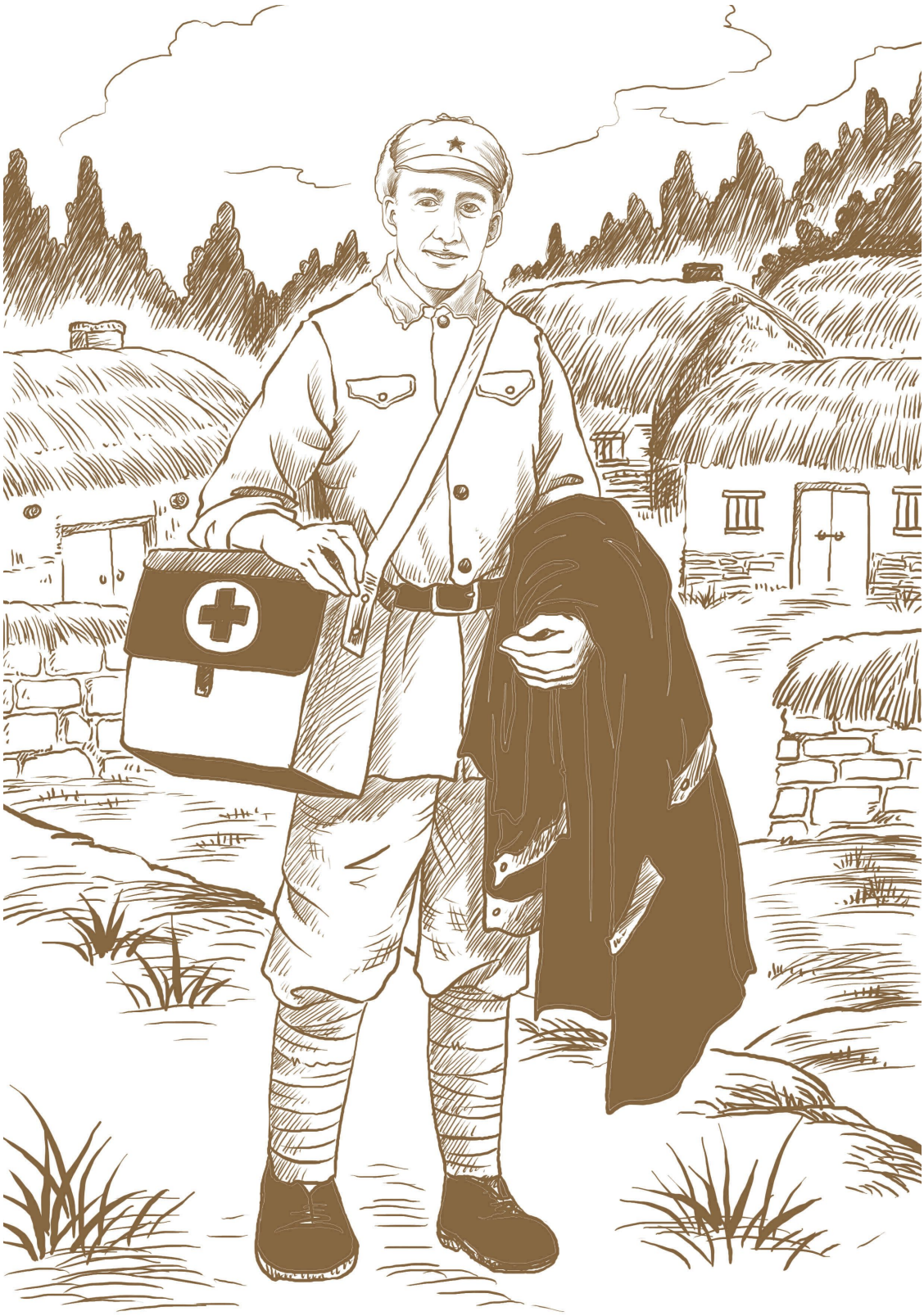
文刷写在墙壁上。于是“回汉人民是一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红军宣传标语以阿文的形式出现在偏僻的山村里。当地群众特别是回民群众感到既新奇又亲切，有人还请来了寺上的阿訇翻译给大家听。海德姆的这一做法，对于号召回民参加革命起到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

在与豫旺堡回民的频繁接触中，海德姆深为回族群众的勤劳善良、热情好客所感动，一个重大决定在他脑海里渐渐形成了。一天清晨，他和斯诺在豫旺堡城墙上散步，对斯诺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埃德加，我想把我的名字改成中国人的名字，这样和群众感情会更融洽些。”斯诺惊奇地问道：“想好了吗？”海德姆回答说：“想好了，这里的回民姓马的很多，‘海德姆’在阿拉伯文中就是‘马’的意思，改成‘马海德’如何？”斯诺连声叫绝：“好！好！非常好！这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名字，既保留了美国姓氏的‘海德’字样，又加了中国姓氏的‘马’字，实在妙极了！”海德姆高兴地说：“哈哈，从现在起我就叫马海德了！”

一天，彭德怀带领部队继续西进，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分手时，他望着海德姆问道：“海德姆大夫，听说你还有一个中文名字叫‘马海德’？”斯诺笑着插话说：“他为了献身中国革命事业，把自己的名字也改成了中国名字了。”海德姆说：“我还没有报告组织批准呢。”彭德怀笑着说道：“我代表西征红军党委现在就批准你改名。”

改名马海德，表明了海德姆同中国人民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决心。从此，红军队伍里又增添了一位外国人。

（执笔：叶长青）



毛泽民在盐池

1936年6月21日，西征红军解放盐池，建立了红色革命政权，从此盐池人民当家做了主人。

由于盐池刚刚解放，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加之反动分子暗中破坏，人民生活极端贫困。时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同志风尘仆仆赶到盐池，帮助恢复和发展生产，指导开展经济工作。

毛泽民同志是搞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进入盐池城后，在认真听取盐池县城市革命委员会汇报后，讲到“盐池刚解放，群众对共产党的政策还不大了解，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要多向群众宣传党的经济政策，使苏票（苏维埃货币）在人民群众中建立起信誉”。他指示城市革命委员会出安民告示，准许“法币”、苏票同时流通，允许群众用苏票兑换“法币”，不许囤货居奇、买空卖空等等。通过这些措施，市场活跃起来了，经济困难的局面一天天转好了。

为了便利广大劳动群众买卖货物，节省支出，增加收入，抵制商人的过分剥削，毛部长指示城市革命委员会帮助人民群众建立自己的商业机构。按照毛部长的指示，城市革命委员会把没收的“聚和兴”“万兴和”两家豪绅的财物集中起来，于1936年7月成立了消费合作社。有了

资金以后，又在消费合作社附设了一个食品合作社，专门供应熟食品。消费合作社内杂货供应齐全，价格低廉，买卖公平，既方便了群众，又活跃了市场。为了扩大资金，推动合作事业的发展，苏维埃政府在县城召开了一次有几百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毛泽民同志在会上宣传了办合作社的目的、意义和办法，号召群众积极入股，集资办好合作社。

与此同时，毛泽民同志还广泛宣传党的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指出：即使大商豪，只要爱国抗日，拥护党的政策，就受到政府保护。毛泽民还及时纠正了当时打土豪分浮财中打击面偏大的问题，释放了不该捕押的几个商人，这产生了很大影响，县城的20多家商铺都陆续开门营业了，不愿拿出卖的货物，在消费合作社的影响下，也摆出来销售。市场很快活跃起来，城乡交流日益增多。外逃的地主、富商闻讯后，也纷纷返回，还向红军捐款，支持抗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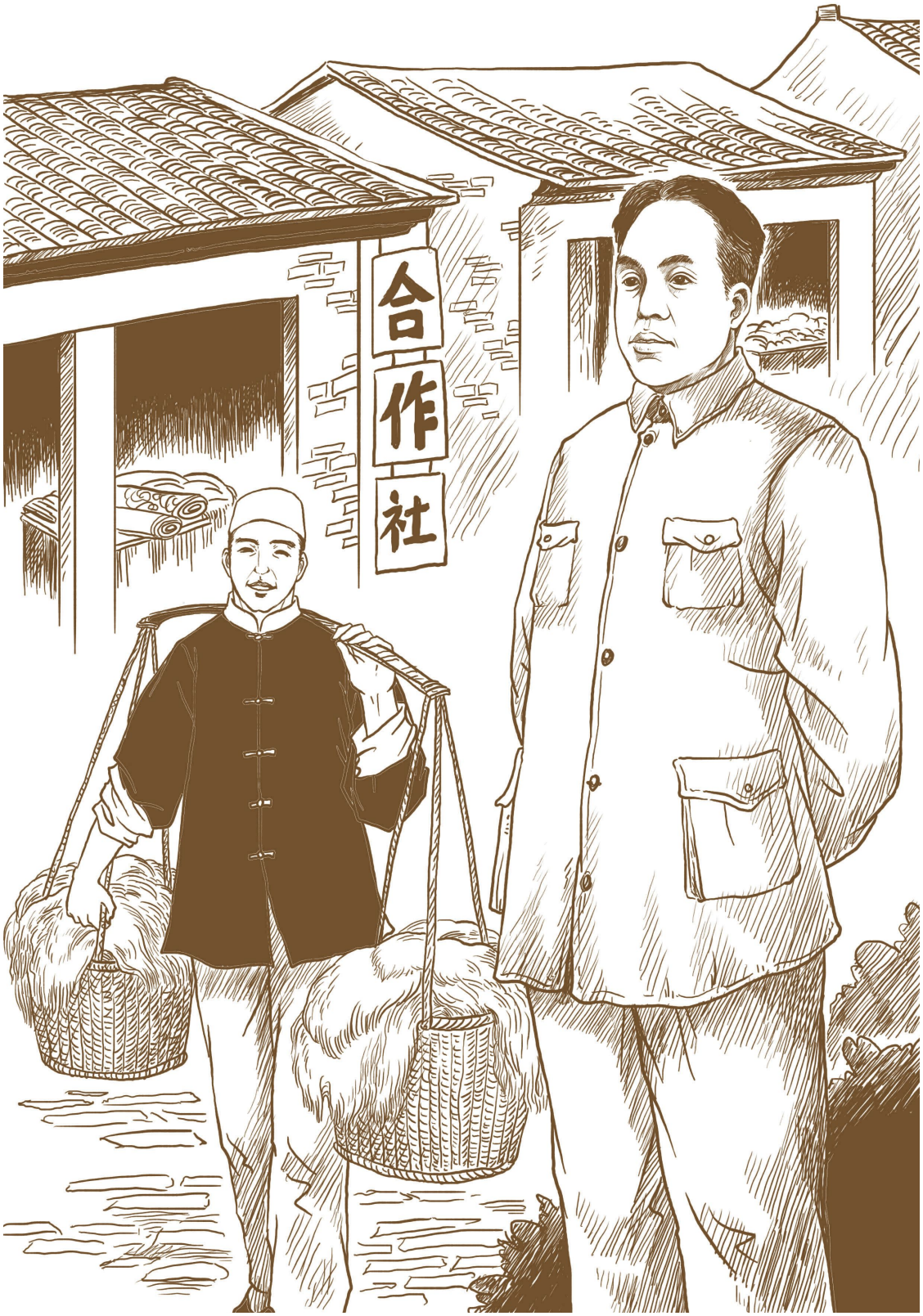
毛泽民同志还广泛和商人交朋友，发展贸易，组织物资内购外销，以保证边区的物资供应。当时边区的食盐、皮毛、牲畜、清油、药材、粮食的贸易收入占边区财政收入的90%以上，而盐池的三宝（食盐、皮毛和甘草）占了大半。这些产品收购以后经石嘴山运到包头，再运到天津、北平销售。

毛泽民同志在盐池期间，还亲自抓了整建税务工作。1936年10月，成立了盐池税务局，各区设立了税务所，并且确定了公平合理的应征税目和各项税率，这受到

盐池群众的支持与好评，进一步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繁荣。

毛泽民同志在盐池开展工作的时间虽短，但对打破敌人封锁、保卫红色政权、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等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执笔：马晓东）


合作社

彭德怀在吊堡子

吊堡子村位于同心县王团镇，这里曾是红军西征总指挥部。

1936年9月，彭德怀率领西征红军来到吊堡子村。在群众大会上，彭德怀指出："目前日本帝国主义已进入我东北、热河、华北地区，并把侵略魔爪伸向大西北。蒋介石、马鸿逵不但不抵抗，反而加紧扰乱我抗日后方。马鸿逵还允许日本在宁夏修机场、绘地图，这是地道的卖国投降行为。最近蒋介石又派胡宗南等部攻打红军。我们是抗日救国的队伍，我们愿意和一切爱国抗日力量结成统一战线，包括白军里的爱国官兵。我们希望广大回民地区尽快建立自己的政府，组织起一支回民抗日军，并且和红军一道走向抗日救国前线……"彭德怀的讲话句句深入人心，极大地鼓舞了回族群众抗日救国的热情。

彭德怀热爱人民，对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平易近人，生活简朴，穿着跟普通战士一样，军装都旧得褪了颜色。1936年8月，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到豫旺堡采访彭德怀，看到指挥千军万马的红军司令员住在一间简陋房屋里的时候，感动地对翻译黄华说："我见过美国、英国、苏联和国民党的很多高级指挥官，彭德怀司令员是

最简朴的了!”并在《西行漫记》中写道:彭德怀的宿舍“内设一张桌子和一条板凳,两只铁制的文件箱,红军自绘的地图,一台野战电话,一条毛巾,一只脸盆和铺了他的毯子的炕。他同部下一样,只有两套制服,他们都不戴军衔领章”。

彭德怀经常与群众接触,结交了不少朋友,其中还有宗教上层人士。他散步时经常不带警卫员,来来往往的老百姓都热情地和他打招呼。有时请回族老乡到他的住处谈话,有时深入回族老百姓家里了解他们的疾苦。他还经常邀请当地回族宗教人士马阿訇到司令部做客,了解回族的生活和风俗习惯,讲述回汉人民是一家的道理,使马阿訇受到很大的启发。马阿訇在回族群众中德高望重,每当“主麻日”时,他都要宣传红军是仁义之师,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他还动员回族子弟几百人参加了红军,受到彭德怀的表扬。一次,有个木匠给彭德怀做了一张漂亮的木床,心想首长是南方人,睡不惯北方的土炕,有张床睡得舒服一些。但彭德怀一再推辞,最后他自己也没有用,而把木床转送给了马阿訇。这个故事一直在吊堡子村流传。

有一天夜幕刚刚降临,彭德怀正在屋里工作,忽听外面有动静,一打听,原来是农民马占才家的大红马挣脱缰绳跑了。过了河就是敌占区,马占才全家人急得团团转。彭德怀听后,连饭都顾不得吃,立即拿上手电筒,叫上十几个战士,帮助去找马。他跑了五六十里路,到天快亮的时候,才和大家一起把马找回,送到马占才家。彭德

怀的爱民行动被当地群众传为佳话。

吊堡子村，一个红色文化激荡的地方，一代代吊堡子人沿着红军的足迹，走出了一条勤劳致富的康庄大道。

（执笔：叶长青）

清水河畔的枪声

1936年8月以后，西征红军与国民党军队以南北流向的清水河为界，两岸对峙，红军驻河东，东北军及马鸿宾的三十五师驻河西。为了做好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红军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向各部队详细介绍了东北军的历史和现状。同时，通过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学习战场喊话内容，散发传单，书写标语，在红军中掀起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热潮。

刚开始，东北军的军官对红军的力量估计不足，总想找机会和红军较量一下，以显示自己的实力。可红军为了抗日大局避而不战，东北军来进攻时，红军便主动回撤。于是，东北军中有些官兵因而产生了骄横心理，认为红军实在是软弱，缺乏实力，不敢与之决战。7月初，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策动骑六师白凤翔部和三十五师马鸿宾部进攻红军。红军一再喊话、退让，他们竟置若罔闻。看来不狠狠教训一下他们是不行了，红军当即从三面实施反击，很快将敌一个团全部俘歼。之后，遵照彭德怀司令员的命令，对被俘官兵以礼相待，进行宣传教育后，归还其所有武器弹药，并全部释放。在东北军领教了红军的威力后，清水河两岸的情况与之前就大不一样了。

红一军团二师对面的敌骑六师，驻在清水河西边的

五营沟。沟两岸，一边是红军一个连，一边是敌骑六师一个连。两军隔沟相望，身姿可见。一天，红军组织政治喊话，连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小组的战士对着沟那边的东北军高声喊道："东北军的兄弟们，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们都是东北人，你们的家乡被日本强盗侵占，你们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当了亡国奴，你们应该打回东北去！""我们共产党和红军反对内战，主张抗日，蒋介石逼迫东北军打红军是大阴谋！""红军愿意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赶走日本强盗！"

起初，东北军一听见红军喊话就打枪，企图用枪声压住红军的声音。到后来，他们也不打枪了，还有人喊起来："我们不打了，你们也别打！""咱们都不要打枪，谁打枪，背着什么枪就挨什么子弹！"红军见对方回话了，就又赶快喊道："红军不愿意打东北军，我们愿意和东北军联合起来抗日！不愿做亡国奴的人联合起来，打回东北去！打回老家去！"

有时河对岸的东北军突然会啪啪地打一阵子，但子弹都在头顶几丈高的空中飞走了。这是因为他们当官的来了，需要打几枪应付一下。当官的一走，就又开始和红军对话了。

后来，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红军与东北军达成了互不侵犯、共同抗日救国的秘密协议。双方商定，继续保持表面上的对峙状态；只要上面长官不来，就都不打枪；非打不可的时候，提前通报。此后，双方在两边的沟沿上各守营地，互不打枪。白天互相对话，晚

上红军唱《在松花江上》等歌曲，东北军士兵就坐在阵地上静静地听，听着听着，也不由自主地唱起来。而且，随着双方的接触越来越多，从一个连、一个团到全师各部队都有。

五营沟一带的战线成为中国军事史上极为罕见的特殊战线，形成了一道非常奇特的景观：这里没有密集的枪声，没有隆隆的大炮声，有的却是歌声、对话声和欢笑声。两军之间，你来我往，会面谈心，互通有无。你送我香烟，我给你食品，非常亲热。本来是刀戈相向的敌人，现在却成了礼尚往来、携手抗日的朋友。在数百里长的西北战线上，名义上是敌对的东北军和红军，实际上却变成了抗日救亡的好朋友。9月，两军还在固原杨郎镇召开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周年大会，取得了共同抗日救国的共识。

西征红军对东北军的成功统战工作，激发了东北军广大官兵的爱国热情和打回老家去的抗日决心，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分化，这对促进时局向好的方向转变和“西安事变”的爆发，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执笔：胡伟东）

红军一、二方面军将台堡会师

黄昏时分，太阳的余晖洒在散发着泥土香的黄土地上，山梁上成行的白杨在深秋的金黄里尽情地摇曳。1936年秋，正在北进途中到达将台堡的红二方面军指战员得知红一、四方面军即将赶来会师，战士们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早早地平整好部队驻地东侧的大场，然后一遍又一遍地打扫、洒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率总指挥部到达将台堡，同左权、聂荣臻、邓小平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主力一万多人召开了规模盛大的联欢大会，欢庆胜利会师，战士们的欢呼声响彻了整个山谷。

红一方面军送来的3万块大洋、20多头牛、2000多只羊、数万斤粮食、1000套棉衣、数万张羊皮、500多匹布、2万斤羊毛和3架缝纫机，就如雪中送炭使红二方面军在会师后如虎添翼。至此，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统一部署指挥下，历经两年艰难困苦、浴血奋斗，终于在预定地域全部会师。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地完成了1934年秋开始的战略大转移的历史任务，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围追堵截、聚歼红军阴谋的彻底破产，极大

地推动了正在蓬勃发展的抗日救亡运动，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1996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经中央批准，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将台堡修建并落成“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同志题写了碑名。同年10月22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其中讲道：“六十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这是对将台堡会师历史地位的充分肯定。

将台堡会师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在中共党史、军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将台堡会师是长征中最后一次会师，将台堡是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地。中共中央已将10月22日确定为“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之日”。

（执笔：何成江）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將台堡會師紀念碑
江澤民
一九九六年七月一日

三军会聚同心城

您看过电影《同心》吗?这部电影讲的就是红军在同心城战斗的故事。

1936年10月,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后,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回族人民革命氛围浓厚,支援红军、参加革命的势头强劲。11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贺龙、关向应率红二方面军,朱德、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斩关夺隘,浴血奋战,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到达了同心城。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总部热情迎接了红二、四两个方面军的到来。

12日,回族群众提着水壶,端着盘子,夹道欢迎红军。在同心清真大寺西南角的河滩上,红一、二、四方面军总部和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召开了万人军民联欢大会,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徐向前、邓小平、杨尚昆、李富春、徐海东、程子华、萧克等一大批红军将领会聚同心城。会场上红旗招展,到处是一派欢迎红军、支援红军的动人景象。“三军会聚同心城,三军同心尽开颜”,同心城因此成了三军同心同德的象征。

在热烈的掌声中,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主席马和福热情洋溢地说:“红军同志们、父老乡亲们,我们同心城原

来人们都叫它半个城，几百年来，回汉兄弟贫苦度日，过着暗无天日、牛马不如的生活。国民党和马鸿逵反动派把我们逼得人不人，鬼不鬼，连条命都保不住。今天，解放我们的大救星红军来了，我们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马和福主席满怀激情的讲话，赢得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

接着，朱德总司令讲话。他一手叉腰，一手打着手势说：“首先感谢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对红军的亲切慰问和隆重欢迎。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今后，我们要加强团结，利用目前的有利形势，创建大西北革命根据地，继续夺取新的胜利。”

彭德怀司令员也讲了话，他说：“红二、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你们不畏艰险，英勇善战，闯关夺隘，来到了同心城，我代表红一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热烈欢迎你们！”话音刚落，会场上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就在这时，不知是谁在人群中带头喊了起来：“拥护共产党，热烈欢迎红军！”顿时，全场沸腾了，人们高呼着，跳跃着，口号声、欢呼声在同心城上空久久回荡。

三军会聚同心城，是继会宁会师、将台堡会师之后三军主力和领导人会聚的一次大会，也是红军进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盛会。

（执笔：王辉仁）

萌城阻击战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先后在会宁、将台堡胜利会师，对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统治造成严重威胁。蒋介石很恐慌，他不甘失败，立即调集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红军，企图将红军在西北地区一举歼灭，为此还赶到西安亲自督战。依照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红军主力由同心一带逐次向东转移。为了迟滞敌人追击，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彭德怀总指挥命令部队在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一至两个师，以阻止敌人的进攻。

11月12日，红四军、三十一军奉命迅速向东转移。16日，行进至宁夏盐池萌城、甘肃环县甜水堡地区，占领阵地后准备迎击即将追击至此的国民党胡宗南部。

17日下午1时，胡宗南部第一师孤军深入，自豫旺堡经范家大坡、东家沟向萌城、甜水堡前进。其先头部队第二旅的一个团前进至石梁山下。红九十三师师长柴鸿儒指挥阻击部队突然发起攻击，枪声四起，就像放鞭炮一样，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倒下一片。敌人不甘心失败，轮番向山上发动进攻。我军居高临下，打退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进攻。同时，红九十一师主力向敌右侧包抄攻击，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这时，几架敌机俯冲下来，轰炸我军阵地，敌后续部队迅速跟进，乘机向我军发起猛攻。就在

这个关键时刻，红九十三师师长柴鸿儒身先士卒，冲上阵地，指挥部队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并击落一架敌机。战士们高兴地欢呼起来："把敌机打落啦！把敌机打落啦！"敌人见势不妙，慌忙抢占其左侧要点羊粪山，刚刚接近山顶，又遭遇到红四军预伏部队的猛烈射击。在红军的三面夹击中，敌人死伤累累，向草坪山狼狈溃逃。此战达到了阻敌前进的目的，共毙伤敌团长以下600余人，缴获步枪百余支及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在这次战斗中，红军优秀的指挥员——九十三师师长柴鸿儒、十师政治部主任彭瑞珍等壮烈牺牲。

萌城战斗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在宁夏境内进行的最后一次激烈战斗，给胡宗南部第一师以沉重打击，掩护了红军主力的安全转移，也给刚刚诞生的盐池、豫海、环县等苏维埃政权扫清了障碍。

（执笔：王辉仁）

中共宁夏工委的建立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10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杨一木、李仰南等4人组成的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以加强宁夏地区的工作。中共宁夏工委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逼迫马鸿逵抗日，一旦日寇进攻宁夏，立即开展游击战争。

中共宁夏工委建立之初，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加上宁夏又和陕甘宁边区相邻，宁夏的马鸿逵也不敢公开禁止群众的抗日救亡活动。卢沟桥事变后，在北平、天津等地求学的宁夏籍学生先后回宁夏，多在教育界工作，他们思想进步，富有爱国热情。中共宁夏工委团结组织这批进步人士，抓住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借助他们在教育界工作的便利，进行抗日宣传教育活动，很快在宁夏打开了局面，在发动群众、建立群众团体、宣传抗日、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中共宁夏工委的领导下，从1937年冬到1938年底，黄河两岸、朔南朔北燃起了抗日救亡的烽火，宁夏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后方抗战服务团、农村抗战服务团等抗日救亡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当时的宁夏

中学、宁夏实验小学等，都先后建立了抗日团体。通过组织抗日游行示威、教唱抗日歌、演抗日戏、演讲、写标语、办墙报、组织发行抗日报刊、组织抗日募捐，以及慰劳前方抗日将士等方式，揭露日寇侵华暴行，颂扬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活动，提高群众的爱国觉悟，激发青年的爱国热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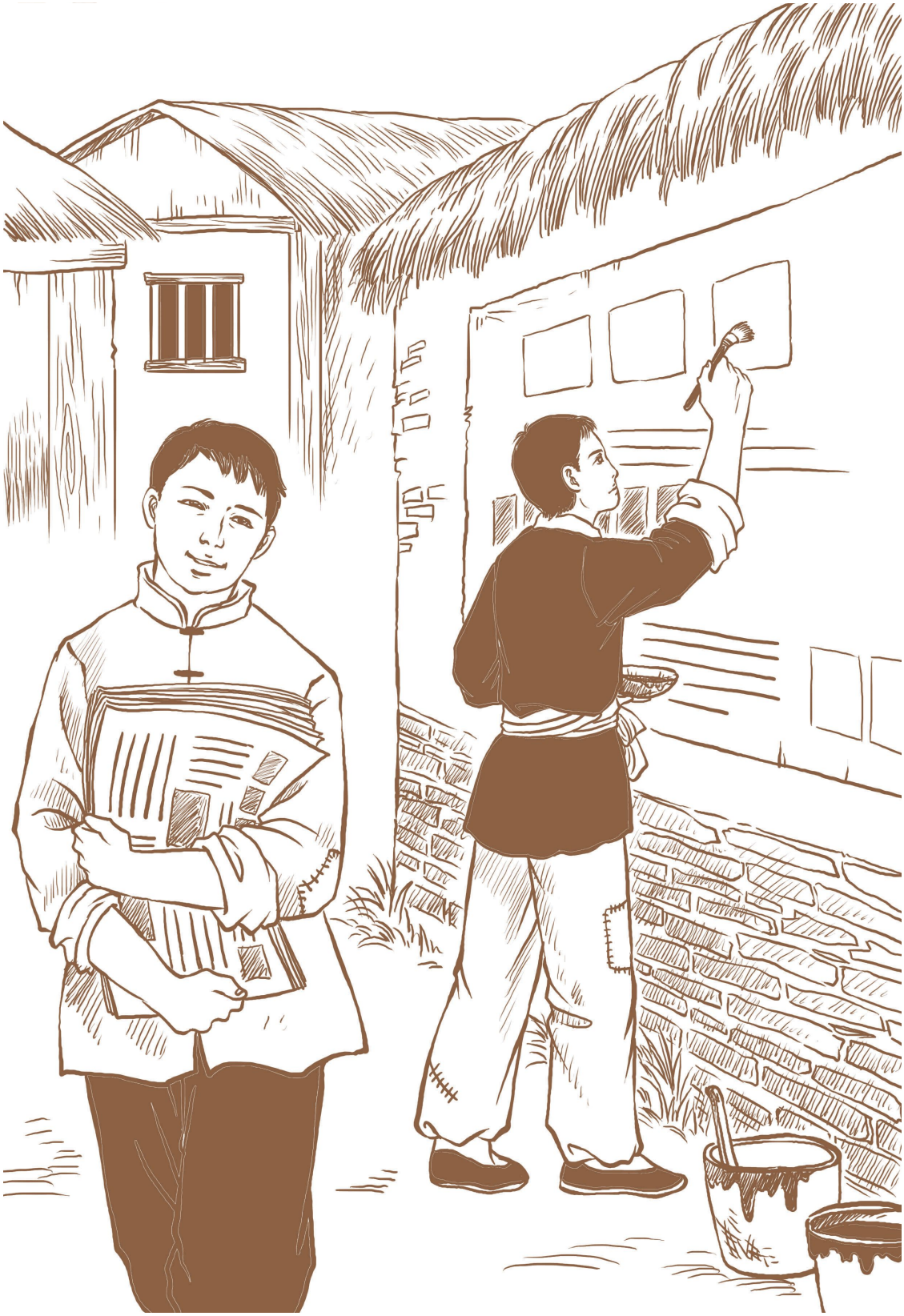
中共宁夏工委还针对宁夏地区建党时间早、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实际情况，由工委书记李仰南、杨一木带领党员干部分头做工作，积极争取、团结知识分子及其代表人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袁金章、雷启霖、李冲和等宁夏各地有名望的进步知识分子代表人物都成为统一战线的成员。同时，通过这些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进一步团结了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争取了其他方面的社会人士，发展、壮大了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了统战政策的影响，掩护了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支持了党的工作。许多共产党员来宁后很快得到安排和保护，得以顺利开展工作。在敌特搜捕共产党员时，不少党员都是在进步人士的掩护和帮助下，才得以安全返回边区。

培养宁夏当地干部也是中共宁夏工委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发动群众抗日，准备日寇侵占宁夏后组织群众进行游击战争，完成今后党在宁夏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培养和造就一批熟悉宁夏情况，并与宁夏人民有着密切联系的革命骨干力量。因此，中共宁夏工委建立后，特别重视选送优秀青年赴延安学习培训的问题。从1938年春天开始，中共宁夏工委先后物色和选送了30多名优秀青年到

延安学习培训。他们有的被党组织分配到边区和八路军中工作，有的被派回宁夏工作。

1938年至1939年，中共宁夏工委先后在宁夏各地设立了5个党支部，发展党员32名，壮大了党组织的力量，为日后党在宁夏开展工作打下了基础。

（执笔：吴树强）



国共密使张子华

1914年4月21日，中宁县城东十五里恩和堡双庙王成绩家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他就是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共中央统战部联络局副局长、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联络员张子华。

张子华原名王绪祥，又名王宿翔、王小髯。他自幼聪明活泼，勤学好问，刚满7岁就被送进了恩和小学读书。1926年秋，大革命的浪潮由南而北，席卷神州大地。驻中宁县国民军中的共产党员刘屏先等人来到恩和小学指导教务，发动师生反封建，与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做斗争。孙殿才、张子华等一批青少年走在了革命浪潮的前列。

1930年，张子华在北平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秘书，代理党团书记。为了便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同时也为表明自己立志做中华优秀儿女的决心，他将名字改为张子华。张子华入党后，和在北平弘达学院上学的共产党员孙殿才等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当时，雷启霖、袁金章、高立天等人组织的“宁夏旅居北平学生会”，是联系宁夏旅平学生的群众组织。1932年冬，宁夏反动当局指控宁夏旅平学生会是共产党组织。国民党特务缉捕宁夏留平学生，

这迫使同学们转移，有的离平回家。张子华仍然留在北平坚持斗争，想方设法与转移到郊外的宁夏同学保持联系。

1933年冬，中共北平地下组织遭到了破坏，国民党特务大肆搜捕、暗杀共产党员及进步青年，一些地下党员转移到天津。张子华以商人身份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组织开展开滦煤矿罢工等工人运动。1934年5月，张子华受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的指示，在天津筹备纪念“五卅”运动九周年的活动，不料就在这时，天津警察局将其逮捕。张子华巧妙地将手头的一份文件在警察没注意时吞进肚中，故而警察在他身上没有搜查到任何证据，就以“共产党嫌疑犯”关押在天津警察局看守所里。9月，张子华保释出狱后，受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陈铁铮的派遣，化名黄汉前往陕北游击区巡视工作。在到达清涧河口后，他听取了特委负责人郭洪涛和李铁轮的汇报，了解到敌人正准备对陕北和陕甘边区发动“围剿”。张子华当即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巡视员的名义给陕甘红军领导人刘志丹写信，详细地分析了全国的政治局势和陕北的革命形势，研究对敌策略。1935年2月5日，陕北和陕甘两个特委依照张子华的建议，在安定周家岭举行了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陕北和陕甘两地区的红军与游击队。

卢沟桥事变以后，宁夏面临日寇入侵的危境，党中央为了加强宁夏的抗日救亡工作，决定派张子华为代表赴宁夏，直接做省主席马鸿逵的统战工作。具体任务包括：在宁夏设立八路军办事处、释放红军被俘人员、商量陕甘

宁边区与宁夏省的交界线问题。马鸿逵对这次谈判不但毫无诚意，反而对张子华进行监视。张子华察觉了马鸿逵的险恶居心，为摆脱马鸿逵的监视，就借口回中宁老家省亲，趁机离开宁夏。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张子华雇了一辆马车从宁安堡出发，几经周折，才通过马鸿宾的防区，越过六盘山到达甘肃平凉八路军接待站。

张子华在宁夏虽只逗留了短短几天，却广泛接触了各界人士，还秘密会见了国民党宁夏省党部组织科长袁金章等留平老同学，鼓励他们为国家为人民做有益的事情，动员进步青年到延安参加革命，为扩大党在宁夏的活动创造了条件。

1942年，张子华因病逝世，年仅28岁。他把短暂的一生都无私地献给了党，献给了革命。

（执笔：马晓东）

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

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是抗日战争初期由进步教师杨文海、薛嵩山在宁夏省立实验小学建立的一个学生爱国进步团体。

1937年秋，新安旅行团来宁夏进行抗日宣传。进步师生杨文海等在新安旅行团的影响下，认识到只有建立起抗日组织，才能更好地团结教育宁夏各族各界群众进行抗日活动。他们组织学生，共同制定“团章”，编写“团歌”，起草《告西北同胞书》，组成了“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简称少战团）。少战团的宗旨是“爱我中华，赶走强盗”，战斗口号是“火线就是战场，战地就是课堂，唤起民众，一致抗日”。为了使团员严守纪律，保持高昂的斗志，他们在团员中进行了“三要”“三不做”和“三不怕”教育。“三要”：一要服从组织决定，二要保守组织秘密，三要忠心耿耿为抗战、为战地服务。“三不做”：一不做亡国奴，二不做汉奸，三不做顺民。“三不怕”：一不怕苦，二不怕难，三不怕牺牲。少战团还编了一套暗语，采取秘密的方式开展活动，防止敌人的破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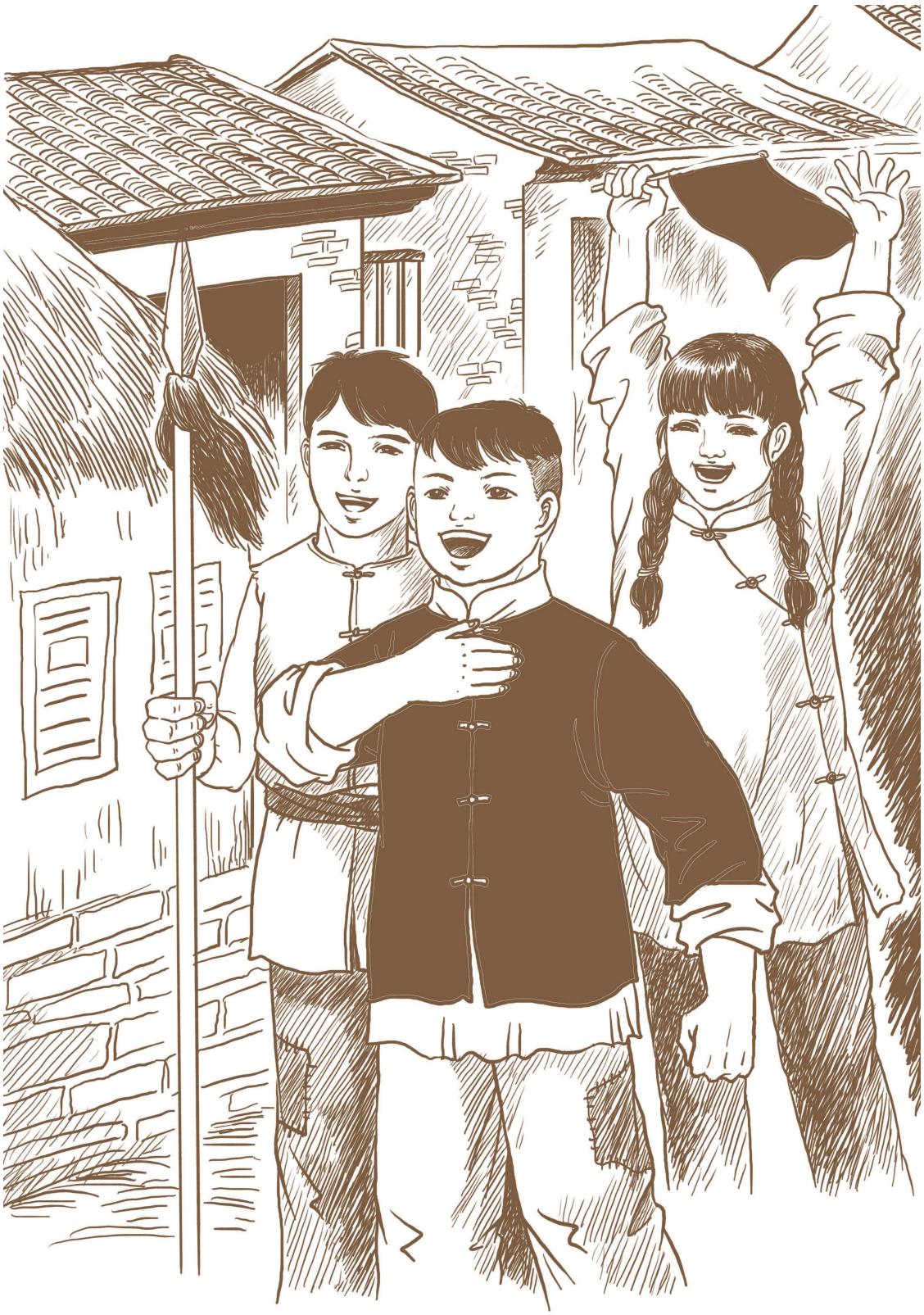
为了取得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少战团决定以请愿的斗争方式，迫使宁夏当局承认其组织。从1937年12月

开始，杨文海等人以“为宁夏政府和百姓争光”为由，多次向宁夏当局请愿，要求正式批准成立“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这一行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也引起了宁夏地下党组织的重视。起初，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坚决不答应。经过数次斗争，马鸿逵只好同意承认少战团，但将“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改名为“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并限在宁夏省所管辖的范围内活动。从此，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进入公开发展组织、广泛开展活动的阶段。

就在这时，杨文海的同乡、宁夏工委书记李仰南来到了实验小学。经过考察帮助，先后吸收杨文海、薛云亭、高立天加入中国共产党，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便完全置于宁夏工委的领导之下，按照党组织的方针政策开展各种活动。从1938年春至1938年秋，在党的领导下，少战团先后组织了宣传队、歌咏队、剧团等，从校内活动转入走上街头，从城市走向农村，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日宣传活动。

1938年9月以后，国民党已在酝酿反共阴谋。10月间，就在杨文海、薛云亭带领少战团团员准备继续开展工作之际，敌人大规模的搜捕行动开始了，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被迫解散，停止了活动。

（执笔：马晓东）



坚持地下斗争时间最长的红河党支部

红河党支部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宁夏坚持地下斗争时间最长的党支部，其旧址在今彭阳县红河乡红河村。

1935年，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彭阳境内时，对贫苦百姓秋毫无犯，严明的军纪、热情的态度使当地人民认定红军就是自己的子弟兵。半年多后，西征红军又来到了这里，人民群众欢天喜地地迎接红军。受红军长征、西征的影响，这里开展革命活动很早，群众基础较好。

红河党支部是1936年6月红军西征时在红河乡建立的抗敌后援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白色恐怖下，红河党支部始终坚持秘密工作，隐蔽斗争，不但没有被敌人破坏，反而不断发展壮大，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考验，历时11年。党员人数由成立时的3个党小组15名共产党员，发展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5个党小组52名共产党员，遍及红河乡的所有村庄，为革命保存了中坚力量，壮大了革命队伍。

红河党支部成立后，其主要任务是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教育，提高党支部的战斗力，了解敌情，掌握敌人动态，加强情报工作。党支部书记王兆璜每月到边区汇报一次工作，他每次带回很多传单，利用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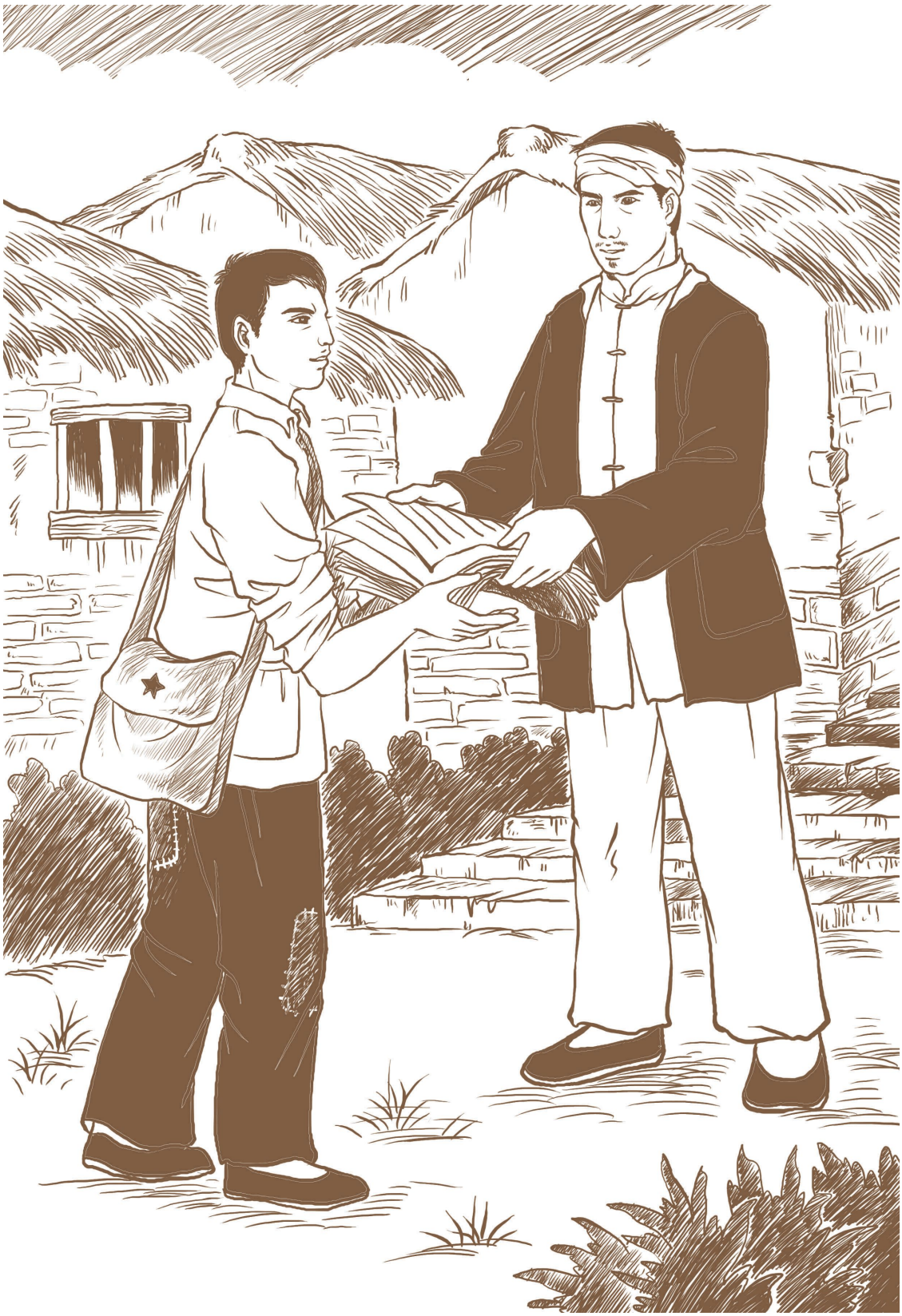
种机会和场合散发传单进行宣传，鼓舞群众，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

在最艰难的革命岁月里，党支部采取了更加积极、灵活、有效的斗争策略，发展思想进步、表现突出的国民党固原县乡保人员加入党组织，分化瓦解敌人，扩大革命阵营。党支部还派地下党员打入敌人的自卫队里。这些在敌人内部担负特殊使命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及时、准确掌握敌人动向，传递可靠情报，挫败了敌人多次有预谋的破坏活动。

1948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上级党组织指示红河党支部积极发动群众，迅速壮大自己的力量。红河党支部加强秘密串联，组织群众抵制敌人抓兵、逼款、抢粮。1949年春，红河党支部组建起60多人的游击队，并提出“不让一个人被抓走，不让一颗粮被抢走”的口号，以镰刀、铁锹、锄头为主要武器，日夜不间断地轮流放哨巡逻，保护乡亲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临近解放时，在红河党支部的领导下，反对国民党暴政、筹款筹粮迎接解放的群众运动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

8月2日，随着解放宁夏第一仗——任山河战斗的胜利，红河党支部走上了革命和建设的新征程。

（执笔：叶长青）



黄二完小的抗日救亡活动

20世纪30年代，黄渠桥是宁夏北部的主要集镇，包兰公路横穿镇街，街道两侧店铺林立。这里回汉杂居，和睦相处，每逢赶集的日子，四面八方的客商、农民都聚集到这里，街道上摩肩接踵，熙熙攘攘。

1938年的一天，黄渠桥镇格外热闹。前来赶集的群众聚集在大戏台前面看墙报，这些墙报形式新颖，图文并茂，生动形象的漫画吸引了许多人。不识字的群众纷纷打听墙报的内容，识字的人自发地向群众讲解。原来，这些墙报是宣传抗日救亡的。

在群众围观墙报时，黄渠桥第二完全小学（简称黄二完小）的100多名师生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救亡。“大众剧社”开始演出文艺节目，话剧《捉汉奸》《机智抓鬼子》《放下你的鞭子》最为生动感人。剧情演到学生在街上捉到了一个宣扬“日本皇军好”、偷卖日货的“汉奸”时，有的观众误以为真，摩拳擦掌扑向前来喊打。当看到剧中一个姑娘在家乡沦亡后，随父亲流浪四方以卖唱乞讨度日，精疲力竭唱不出声来，竟被父亲用鞭子抽打时，许多人流下了同情的泪水。

演出结束，宣传队开始演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及热河、察哈尔等地，数千万同胞沦为亡国

奴，被逼无奈流浪乞讨，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我们一定要奋起洗雪国耻！”师生带领群众振臂高呼：“誓死不当亡国奴”“团结起来，坚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保卫家乡保卫祖国”“收回领土，赶走日寇”。歌咏队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工农兵商学，一起来救亡》等革命歌曲。高亢嘹亮的歌声在街头回荡，强烈地感染着现场群众，他们连声称赞学生的爱国行动。这就是当年黄二完小的师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真实场景。

说起黄二完小的抗日救亡活动，就不能不提起一个人，他就是中共地下党员杨一木。1938年2月，杨一木来到黄二完小，以教师身份做掩护，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团结进步教师王振刚、李振声、童山斗等人，组织学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在杨一木的影响下，进步教师纷纷行动起来，组建了“抗日战地后方服务团”，组织师生学习进步书刊，传播革命思想。每逢赶集，他们就组织学生上街宣传抗日救亡。

黄二完小的抗日救亡活动轰动了宁北地区，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构的注意。1938年12月的一天下午，杨一木和李振声到“德润昌”商号买挂镜，掌柜冯有子是学生家长，他请杨老师到里间屋里喝茶。不料，里屋炕上躺着一个正在抽大烟的人，一见杨一木进来，立即从炕上跳下来，鞠躬问好。原来，这个人是马鸿逵的便衣队长马子成，曾在1937年混入陕甘宁根据地，认识杨一木。杨一木假装不认识他，借口天色已晚，拉着李振声离开了“德润昌”，迅速赶回学校，及时烧毁了重要文件，到教师郭英教

家里躲了起来。后在进步教师李冲和资助下，二人在12月下旬回到了陕甘宁根据地。

历史的烟云虽然已经过去了70多年，但是当年杨一木领导黄二完小师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故事至今仍广为流传。

（执笔：韩林森）

金三寿虎口脱险

1937年9月，党组织派金三寿到吴忠做民族地区工作。在这期间，他虎口逃生，经历了十分惊险的一幕。

1938年夏天，马鸿逵部特务机关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其中有人当了叛徒。为了安全起见，宁夏工委决定将大部分党员撤回边区。

金三寿接到撤退指示后，急忙回家烧毁机密文件。这时，特务们正在距他家只有几百米远的邻居家搜查，吆喝声和砸东西的声音清晰地传了过来。金三寿机警地爬上墙头观察，对面邻居家的房顶上站着几个持枪的特务，其他的特务在院子里乱翻。他坚持把文件烧完，才从后墙翻了出去，悄悄来到保长家后院的麦草垛里藏了起来。

就在这时，特务们来到了金三寿家，翻箱倒柜，四处搜查不到金三寿，就把他的妻子吊在房梁上，逼她说出金三寿的下落。

晚上，金三寿在邻居的帮助下，换了一身旧军装，外面套了件皮褂子，带着一些干粮和十块钱出了村子。等到天亮时，鞋子跑丢了，脚上也打满了血泡，只能一步一步慢慢地往前挪。

就这样，艰难地前进了十几里路，绕过了两三个村子。他想休息一下再往前赶。刚坐到路边，就走过来十

几个穿着军装，挎着马刀，带着枪的人。

“你是干啥的？”一个头目模样的人问。

“去看亲戚。”金三寿硬着头皮回答。

“看亲戚为啥啥都不拿？你的军装是哪儿来的？哼，我看你就是共产党，给我打！”那个领头的恶狠狠地喊道。

没等金三寿辩白，马刀背就劈头盖脸地落了下来。这伙人边打边问金三寿是不是共产党。金三寿咬着牙，忍着疼，一句话也不说。打了一阵，那个领头的命令道：“先把这小子押到惠安堡警察局再说。”

金三寿被他们连拉带推关进旁边的一个屋子里。这伙人在外面宰羊，准备吃饭。

金三寿一边观察着周围的环境，一边思考着脱身的办法。心想，如果被送到惠安堡警察局，脱身可就难了，得尽早逃离魔爪。如果那个领头的是“哥老会”的人，兴许有救，实在不行，就把身上十元钱给他。

吃完饭后，那个领头的到屋子里抽烟。金三寿上前双手一抱做了个动作，说了一句“哥老会”接头惯用的黑话。

“你是马怀蔺的人？”那人皱了皱眉头，悄声问。

“是！”金三寿急忙回答。

“那你就放心吧！我在惠安堡警察局做事，马怀蔺对我有恩，今天一定设法放了你，你先不要吱声。”那人拍了拍金三寿的肩膀，安慰金三寿道。

过了一会儿，这伙人开始行动了，几个人进屋要带金三寿走。

“哎哟，今天挨了打，身上疼得不行，脚也烂了，走不

动了，要死就死在这里！”金三寿躺在地上高一声低一声地叫唤起来。

“带上这个废物，一路上谁伺候他?早点让他滚蛋！”那个领头的趁机喊了起来。

当兵的一听，踹了金三寿几脚，就放了他。金三寿起先一瘸一拐，慢慢地走着，看着离这伙人远了，顾不上脚疼撒开腿朝东面跑去，一气跑出了十多里路。

金三寿在落入虎口后，沉着冷静，机智勇敢，与敌人斗智斗勇，顺利逃了出来，最终回到了定边。

（执笔：王俊昌）

海固回民三次武装起义

1937年，宁夏南部山区的西海固因遭受连年大旱，百姓饥寒交迫，而国民政府却以“抗日”为名，在当地抓兵派夫，横征暴敛，实行野蛮的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毗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海固回族群众，深受长征红军革命思想和共产党的平等民族政策影响，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双重压迫下，长期积聚的怒火终于引发出三次大规模反抗国民政府反动统治，寻求民族解放的武装起义。

1939年初，当地反动政府因百般虐待壮丁和残酷的“清乡”运动，激起民愤。海固回族群众千余人在马国瑞的带领下发动起义。起义军惩治恶霸，攻打反动民团，并提出“反蒋抗日，寻找民族出路”的口号。由于斗争初期缺乏经验，在国民政府的政治诱骗和残酷镇压下，第一次海固回民起义宣告失败。

同年5月初，马国瑞在西吉白崖等地再次组织回族群众发动起义。起义军提出了“打倒欺回灭教的国民党”“五族共和，打倒蒋贼！”的口号，起义军4000余人在艾蒿湾进行整编后命名为“崇义军”。后挥师南下，沿途回族群众纷纷加入，“崇义军”声威大震。国民党政府万分震惊，一面派重兵配备骑兵、山炮部队进行南北“围剿”，血腥镇压；一面组织代表团找马国瑞假谈判，引诱马国瑞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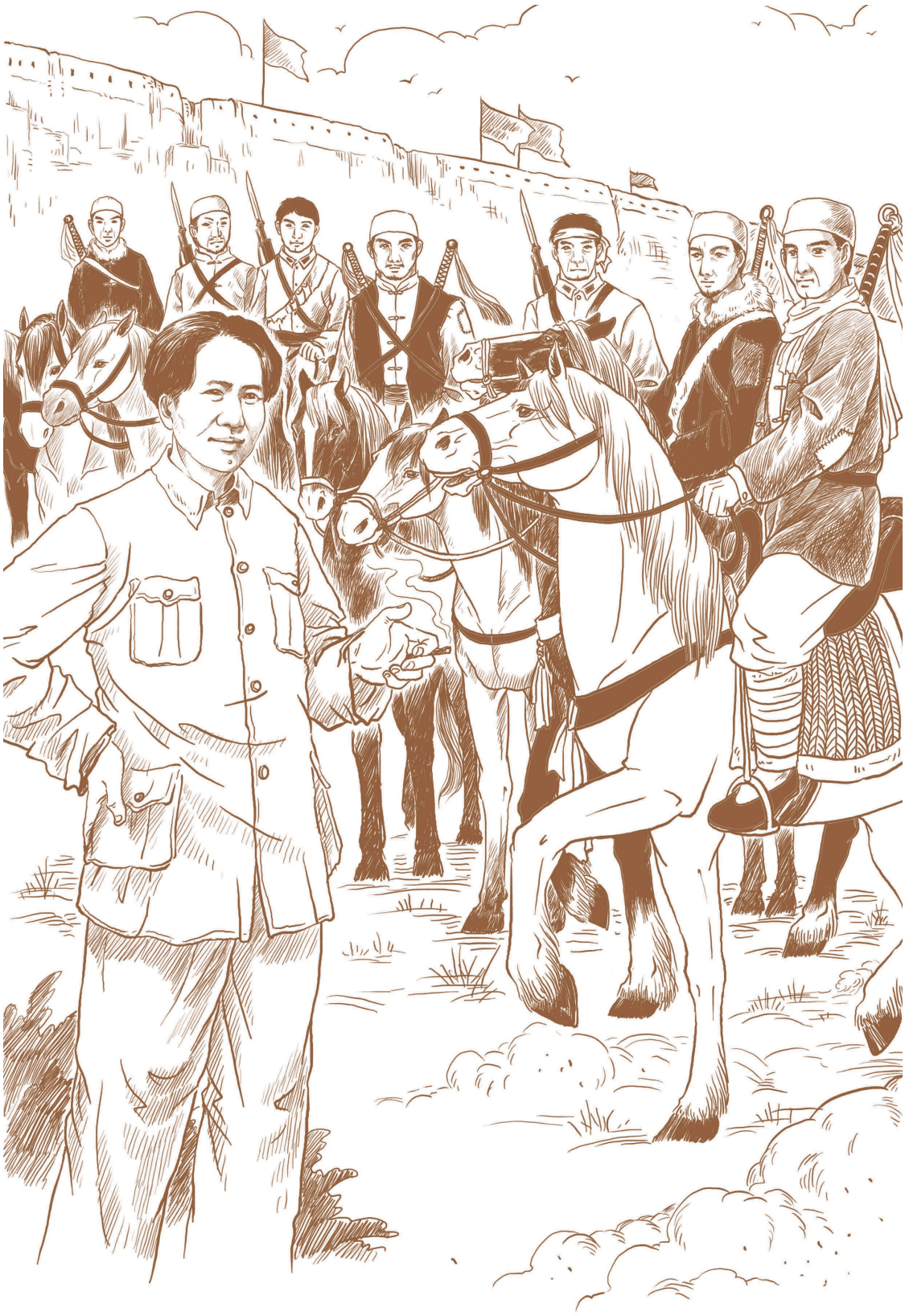
“崇义军”上当，在白面河峡谷地带将“崇义军”包围。由于双方实力悬殊，“崇义军”虽拼命厮杀，英勇战斗，但终因缺乏军事训练，武器低劣，寡不敌众，700多人牺牲，400多人被俘，马国瑞等领导人相继阵亡，第二次武装起义遂告失败。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残酷的清算，整个海固回民聚居的村庄“村村尽戴孝，处处闻哭声，山野累累骨，村庄处处腥”。

由于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参加过起义的农民忍无可忍，纷纷要求重新举事。在马思义等人的组织下，1941年5月3日，海固回民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起义军转战六县，队伍发展壮大到两万多人。国民党派六个团的兵力“围剿”起义军。在张棉驿、马鹿镇战斗中，义军7000多人设伏，待敌军主力进入，起义军遍山而出，刀光闪闪，枪声震耳。经过猛烈冲杀，敌伤亡过半，余众掉头鼠窜，又被两翼埋伏的起义军截击，起义军合兵一处，穷追猛打，毙敌900多人，俘敌100多人，并缴获大量武器。此役大挫了敌军的嚣张气焰，大长了起义军的威风。国民党故伎重演，派人诱降马思义，被严厉回绝。恼羞成怒的国民党政府随即调集重兵围攻起义军。起义军在北上途中，遭敌包围，两昼夜的反复冲锋，伤亡千余人，元气大伤。行至石砚子时已迅速减员，马思义流着泪对大家说：“现在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只有到边区投奔八路军，寻找新的出路。愿意去的跟我走，不愿意去的也不强迫，但要把马匹留下，让我们骑上马冲出去。”随率剩下的230余人穿过敌人封锁线，抵达陕甘宁边区。第三次武装起义宣告

失败。

失败后的回民起义军投奔边区，在边区政府的帮助下组建成“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抗日回民骑兵团”。1941年7月下旬的一天，毛主席、朱总司令在边区礼堂接见了马思义等人。毛主席说：“你们海固地区回民三次革命失败的原因，是由于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你们应该记住这个教训，今后要在共产党领导下，继续进行斗争。”当毛主席问到还有什么顾虑时，马思义说：“如果边区不收留，就准备把枪和马匹交给八路军，我们去下苦打短工。”毛主席说：“八路军怎能不收留?但我们不要你们一支枪、一匹马，原建制保留，人员不整编，由你们自己去领导，共产党积极帮助你们。”临走时，毛主席嘱托马思义，回去代他向200多名战士问好。获得新生的起义军，从此走上了争取民族解放的光明大道。解放战争开始后，这支光荣的回族革命武装力量，浴血奋战，扬威沙场，为保卫陕甘宁边区、解放大西北作出了重要贡献。

（执笔：何成江）



毛主席与回民抗日骑兵团

1939年1月至1941年6月，西吉、海原、固原的回汉各族群众，为反抗国民党政府的残暴统治，在马国瑞、马思义等人的领导下，接连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回民武装起义，给国民党顽固派以沉重打击。

由于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和政治诱骗，三次起义都失败了。马思义、马国璠带领余部230多人冲破敌人的重围，到达陕甘宁边区寻找八路军部队，受到了陇东特委的热情接待。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司令员萧劲光受毛主席的委托，专程赴环县看望马思义等人，并赠送了写有“浩气长存”的锦旗，以表达共产党对阵亡战士的悼念和对海固回民起义的高度评价。

1941年7月，党中央安排马思义等人到延安参观和学习。中央民族学院还邀请马思义做报告，马思义含着热泪介绍了三次回民武装起义的经过，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倾诉了对解放区的向往，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毛主席、朱总司令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在边区礼堂亲切接见了马思义他们。毛主席帮他们分析起义失败的原因，并鼓励说，今后要在共产党的领导

下继续斗争，让回族人民也翻身得解放。马思义在他的回忆文章《沐浴在阳光中》饱含深情地写道："1941年7月下旬的一天，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中午刚吃过饭，杨静仁同志兴冲冲地走进屋子里说：'思义，边区政府打来电话，毛主席在那里要见你！'边区政府在新市场上面一块不大的平地上。进了院子，静仁同志引我进入正面的上房。房子不大，里面坐着几个人，我一眼看出其中一个就是毛主席。毛主席看见了我，连忙站起来，老远便伸出双手，像慈母一样微笑着。我急忙过去握着他老人家的手，高兴得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毛主席！''你好！'毛主席亲切地说，并笑着让我坐下。他自己背着手，慢慢地在房子里来回踱着。后来，在我面前站住，用温和而又深沉的眼光瞧着我，对我说：'你们回族人民在中国历次革命运动当中都起过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太平天国时期。可是，你们的革命都失败了。现在海固回民的革命也失败了。你们这三次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也是如此。你们应当记住这一教训。'毛主席又说，'你们革命虽然失败了，今后应该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继续进行斗争，共产党也一定帮助你们回族人民得到解放，让你们过自由幸福的生活。'临走时，毛主席嘱托马思义：回去代问230多名战士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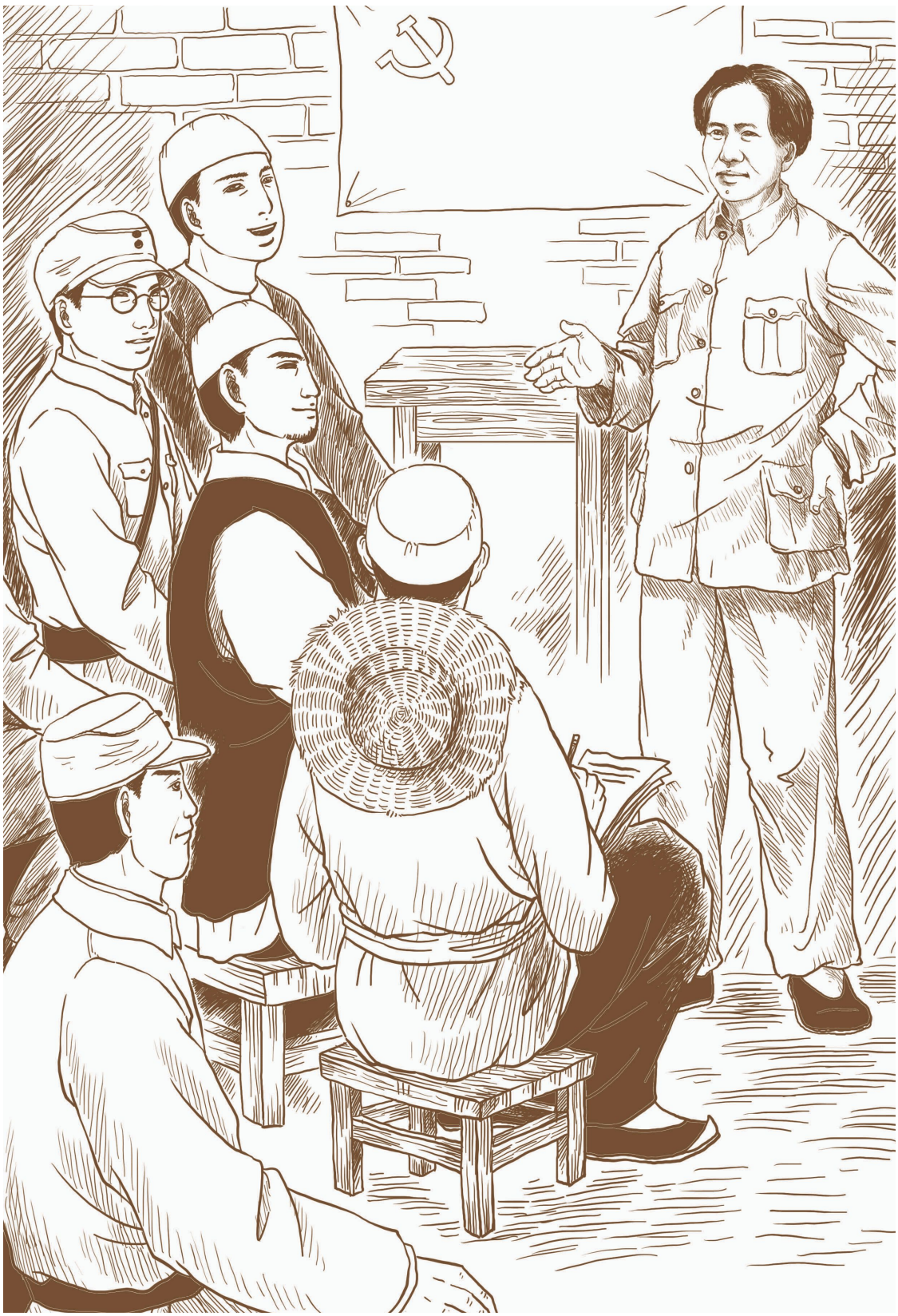
不久，在毛主席的关怀下，这支起义军被命名为"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回民抗日骑兵团"，任命马思义为团长，下设3个连。为帮助他们学习，边区联防司令部派杨

静仁为政治教员，马克为文化教员。党组织还从各地派11位回族干部、党员到回民抗日骑兵团言传身教。

在陕甘宁边区最困难的时期，回民抗日骑兵团的指战员热烈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积极投入大生产运动，克服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封锁造成的经济困难。1945年8月，回民抗日骑兵团与陇东分区独立营整编组合，奉命开往固原，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洪流。

这支回族武装力量，为捍卫人民政权、保卫民主改革和进行经济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为西北回族人民革命斗争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执笔：王辉仁）



顶天立地崔景岳

崔景岳，原名崔廷儒，1911年11月出生于陕西省旬邑县东涧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1岁入本村初小读书，14岁考入县宝塔高等小学。他读书用功，成绩优异，在进步教师、共产党员许才升等人的影响下，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立下了为革命奋斗终生的雄心壮志，16岁就走上了革命道路。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39年冬，为了加强宁夏地区的工作，中共中央决定，崔景岳任中共宁夏工委书记。12月下旬，崔景岳和王博打扮成商人模样，秘密来到了宁夏。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他们将中共宁夏工委机关分别设在宁朔县的宋澄堡小学和小坝小学。

1940年4月13日，由于叛徒的出卖崔景岳被捕，关押在宁夏特务机关军警联合稽查处。残暴的敌人给他戴上十几斤重的脚镣，用各种酷刑威逼他说出宁夏地下党组织的秘密。压杠子、老虎凳、揭背花、烙烙铁、灌辣椒水……每一次审讯他都昏迷好几次，然后又被敌人用冷水泼醒。崔景岳被折磨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狱中的同志流着眼泪给他擦拭伤口，他却安慰大家："牺牲我一个，保留组织和其他同志！"任凭那些豺狼用尽各种酷刑，崔

景岳的嘴好像钢打铁铸一般，始终没有泄露任何党组织机密。

5月22日，敌人把崔景岳转押到宁夏第一监狱，牢房的环境十分恶劣，臭虫、虱子随手一摸就是一把，屋子空气污浊，臭气熏人。本来已经少得可怜的口粮，加上层层克扣，所剩无几了。每天两顿饭，一次仅有一小碗黄米稀饭，霉味熏人，还有老鼠屎和沙粒。天冷时，稀饭冻成了冰碴子，吃一口还得含在嘴里焐化了才能下咽。即便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还在日夜思考着如何教育和组织同志们与敌人进行长期的狱中斗争。他们几经商量，成立了狱中党支部，崔景岳担任党支部书记。狱中不止一次地传出崔景岳将被判处死刑的消息，但他却漠然置之，同志们都赞誉他为“狱中的阳光”。

1941年4月17日，一个血雨腥风的夜晚，黑幕沉沉，风沙漫天。在城隍庙后面的一块空地上，十几名宪兵荷枪实弹，戒备森严。新挖的埋人坑张着黑黝黝的大口，仿佛要随时吞噬革命者和抗日志士的生命。双腿因酷刑致残的崔景岳在出监狱门时，将身上的棉袍留给了战友，他只穿着一件单褂，寒风袭击着他单薄的身体。然而，他昂着头，挺着胸，大义凛然地向刑场走去……当崔景岳走到离埋人坑四五米的时候，敌人杀气腾腾地问：“崔景岳，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崔景岳镇静自若，语气平缓地说：“人活百岁，总有一死，我今天的死，虽不得其时、其地、其所，但死得值。我是共产党员，这一辈子感到无上光荣。共产党人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我今天所遗憾的是，祖国

的半壁河山正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之下，你们不为民族着想，不为抗日着想，却要积极反共，屠杀共产党人。你们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扪心自问……”

“住口！”凶恶的敌人被崔景岳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激怒了。挥起铁镐，使劲朝崔景岳猛击过去，然后推他进了埋人坑……

崔景岳就这样牺牲了，年仅30岁。

1991年4月，自治区、银川市党委和政府将烈士殉难地——银川市十三小学命名为景岳小学，并修建革命烈士纪念碑，此处成为宁夏一处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执笔：张　莉）

回族英雄马文良

1937年夏，在日本开往中国的航船上，一位年轻人靠在船舷旁，圆圆的眼镜后面，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深情地眺望着远方。想到渐行渐近的祖国，他心潮澎湃……

这位年轻人叫马文良，原名尹九官，回族，1912年10月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海城镇一个职员家庭。因4岁丧母，他自幼沉默寡言，性格倔强。上中学时，马文良亲眼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掠夺、横行霸道，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老百姓让他们害苦了！不把鬼子赶出中国去，老百姓就没有安宁日子过！”他在家里经常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和愤恨。对此，家里人很担心，多次告诫他：“小孩子不敢胡言乱语！”他却说：“中国人受欺辱就在于胆小怕事，不敢反抗。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就能取得胜利。”他还经常对同学们说：“中国人只要抱成一团，就什么都不怕！”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马文良反日情绪逐渐高涨，经常和进步学生奔走于大街小巷，进行游行、演讲，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蛮罪行，并在群众中宣传和发动抵制日货运动。1930年，18岁的马文良考入东北大学法学系预科班，在校期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马文良和其他爱国学生一起，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

的领导下，参加了抗日民族先锋队和反对东北大学迁西安等斗争。

1936年，马文良东渡日本留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拓殖大学。在那里，他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群众组织“解放社”的工作，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心和决心。他在学校的活动引起了日本当局的注意，被列入“特嫌分子”黑名单而受到监视和追捕。这次回国，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和郭沫若等人的帮助下，经过化装逃出日本的。

回国后的马文良重返东北大学。卢沟桥事变以后，东北大学被迫迁往西安济公山。马文良和一部分爱国青年辗转来到延安。在延安，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马文良到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学习。

1940年1月，马文良和八路军政治部的金浪白、中央党校的马青年等人，共同组织发起了延安回民救国协会，这是陕甘宁边区少数民族的第一个抗日救亡团体。10月7日，在延安党中央大礼堂同时举行“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边区回民文化促进会”成立大会，马文良参加了两个协会的领导和组织工作，并担任了三边回民巡视团中央特支书记兼团长，主要负责对定边、盐池地区回汉各族人民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号召回汉各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941年2月，马文良在陕甘宁边区盐池县回六庄开展工作时，被马鸿逵的骑兵便衣队逮捕。党中央积极设法

营救，但未能成功。在狱中，马文良受尽敌人的百般折磨和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坚贞不屈，顽强斗争。在法庭上，他义正词严地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日、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宣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民族战线和抗战必胜的政治主张。敌人恼羞成怒，气势汹汹地问道："难道你就不怕死？"马文良斩钉截铁地回答："怕死就不抗日！怕死就不当共产党员！""我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你们要杀要砍，随便！"经过一个多月的审讯，敌人一无所获。

4月17日深夜，马文良被刽子手押到了银川城隍庙事先挖好的大坑边。年仅29岁的马文良临危不惧，大义凛然，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丧尽天良的刽子手们竟然用镐把猛砸马文良的头骨，并将他的右臂打折为四节，然后推入大坑活埋……

1977年1月10日，在银川市八里桥公墓隆重举行了马文良烈士遗体重新安葬仪式。烈士的家乡——辽宁省海城市建立了马文良烈士纪念馆，并为烈士塑了像。马文良烈士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他的光辉业绩将流芳千古，永昭后世。

（执笔：张　莉）

视死如归孟长有

孟长有，乳名对对，1916年出生于宁夏中卫县柔远堡乡孟家庄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兄妹8人中他排行老二。作为长子，5岁时父亲就开始教他识字，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1936年7月，孟长有在中卫中学读书。当时，学校有一位从北平来的语文教员尚健庵，是中共地下党员。通过观察，尚健庵发现孟长有理想远大，善良正直，学习勤奋，善于思考，便经常把自己带来的进步书籍给他看。在他的培养、教育下，孟长有视野开阔了，胸中点燃了革命的火花。

那个时候，国民党宁夏省党部为了防止师生“赤化”，专门派来了军训官。这些军训官提着军棍、皮鞭，在校园里横行霸道，经常体罚学生。师生们对此恨之入骨，背后称他们“黄鼠狼”。一天夜里，孟长有悄悄叫了几个同学，痛打了其中最坏的一个军官，为师生们出了气。

学校的校长和会计用次米充好米，用过期的油充香油，使学校的伙食一天不如一天。孟长有组织同学暗地里调查，把这件事印成小报、传单广为散发，揭发他们粮油以次充好、克扣学生津贴的恶劣行径。他还秘密联络同学在全校罢课三天，县城其他学校也积极响应，纷纷罢

课。宁夏省教育厅为了平息事态，罢免了校长，解雇了会计，孟长有领导的学潮斗争取得胜利。

1937年7月，经尚健庵介绍，孟长有带领几名同学，闯边卡、过哨所，历经千辛万苦，徒步来到延安。孟长有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洛川大队二支队学习。由于学习努力，思想进步，孟长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初，孟长有受党组织派遣，以教员身份作掩护，回到宁夏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同心海如小学校长李士林是当地的青年知识分子，为人诚实，思想开明。孟长有来到这个学校后，经常找李校长和进步师生谈心，介绍全国抗日运动的形势，力促学校革故鼎新，得到全校师生的拥护。他给学生讲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罪行，讲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事迹，教学生唱《东北流亡曲》《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带领学生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大力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回族进步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

4月中旬，由于叛徒出卖，中共宁夏工委遭敌破坏，孟长有被捕。敌人看孟长有年轻，想从他身上得到党组织的秘密，请来了孟长有的老师张凤池做工作，劝告孟长有在“悔过书”上签字，并许愿如果孟长有脱离共产党，就“高官任你做，骏马任你骑”。孟长有听了后说：“我孟长有跟定了共产党，我不自首，更不签字！”敌人气急败坏地喊道：“上刑！”

几个打手把碗口粗的木杠压在孟长有的身上，一分钟、三分钟过去了，十分钟、二十分钟又过去了，孟长有咬

紧牙关，只发出轻微的呻吟声……

敌人声嘶力竭地叫嚣："你自首不自首？"

"决不自首！"孟长有眼里迸发出仇恨的怒火。

"打！狠狠地打！"敌人拿着皮鞭，狠命地抽打起来。孟长有昏死过去了，敌人就用冷水泼醒再打。面对敌人一次次的残酷折磨，孟长有始终坚贞不屈，敌人一无所获。

1941年4月17日深夜临刑时，孟长有面对敌人的屠刀，视死如归，大声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共产党员孟长有在人生的道路上仅仅度过了25个春秋，但他的英雄形象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执笔：张　莉）

盐池县的大生产运动

抗日战争中期，由于日军的疯狂进攻和残酷“扫荡”，国民党的军事包围、经济封锁以及自然灾害的侵袭，中共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都遭遇极为严重的困难。为了响应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作为陕甘宁边区的一部分，从1942年开始，盐池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主要是开荒种地、办合作社、打盐运盐、发展纺织业和手工业生产。

盐池县地广人稀，有大量可耕地没有开垦。为了扩大粮食产量，解决军队、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中共盐池县委和县政府鼓励群众开荒种地，渡过难关。大生产运动开始后，中共盐池县委和当地驻军领导带领广大干部及其家属、战士、学校师生开荒种地。盐池驻军警备三旅七团打井种水浇地100多亩，群众也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生产，使全县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有了显著增加。1942年，盐池县有耕地194879亩，开荒64883亩，粮食总产23873石。1945年，则有耕地467593亩，开荒48495亩，粮食总产38290石。3年时间，耕地增加了272714亩，粮食总产增加了14417石。

盐池县的消费合作社是在1938年兴办的，当时只有9

个，社员1816名，股金4715.7元。1942年12月，毛主席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做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和《论合作社》的报告，提出了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强调发展经济的主要方法是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从那以后，边区各县的合作社，在原有基础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44年9月，社员发展到2085名，股金21160.7元，公积金2147.47元，销售总量为49920.92元，纯利润为3688.72元。其中，元华工厂成绩最为突出。从1942年到1945年，元华工厂用羊毛为边区干部和前方将士制作出衣胎、被胎、绒帽（毡帽）、毛毡、军用毛毯等共计12万件，还有大量毛袜、手套、军鞋。

早在1937年8月，中共中央国民经济部就曾发出“大家到盐池驮盐去”的号召，以便发展边区经济，改善群众生活。受1940年的严重灾荒影响，边区政府为了促进产盐运盐业的迅速恢复与发展，确定“以军队生产为主，盐民产盐为辅”的方针。1941年秋，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四支队2000余人来到长城脚下的花马池打盐。部队驻在盐池县城，为了不打扰当地群众，八路军战士们挖建了100多孔简陋土窑洞住了下来。1942年5月，一场热火朝天的军民打盐运动打响。当时打盐条件极差，战士们没有捞耙，就用手捞；没有车拉，就用脸盆端、子弹箱子扛。许多人的腿和脚板被锋利的盐茬刺破，再被盐水一蚀，伤口钻心地疼痛……这些盐被拉到边区，边区军民再将这些食盐运往西安等地，换回急需的粮食、棉花、布匹等，为

缓解边区的经济困难、支援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边区军民穿衣存在极大的困难，布匹奇缺，布价昂贵。盐池县纺织业以元华工厂为主，帮助各区开展纺织，但更多的则是家庭自纺自织。1943年12月，中共盐池县委、县政府做出开展纺织的决定后，党政军干部首先带头，区委各级干部也都行动起来，并动员干部家属参加纺织。为鼓励群众，解决具体困难，区、乡政府采取贷款、先支工钱后纺织等措施，调动了妇女纺织的积极性。仅1943年，盐池县学会纺织的有2236人，自制纺车1262架、织布机20多架。在开展纺织生产的同时，手工作坊也大为发展，主要有皮坊、毡坊、铁坊、木坊等。

大生产运动，使盐池县经济发展很快，成绩显著，基本上实现了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的，人民生活有了显著的提高。

（执笔：马晓东）

元华工厂办得好

1941年至194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进入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

陕甘宁边区处在日寇和国民党的双重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之下，国民党不仅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而且不准边区的农副产品向外输出，禁止国民党统治区的货物特别是棉花、布匹、粮食、药品、火柴、电信器材等运往边区，违者军法处置。他们在沿边区各县设立盘查哨所，切断了边区与外界的联系，使边区物资匮乏。边区的财政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

为了克服困难，盐池县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机关、部队、工厂、学校都积极行动起来，投入大生产运动。

1941年6月，民主进步人士、原盐池县商会会长靳体元先生从延安参观回来，决定依托盐池丰富的皮毛资源开办元华工厂。厂部位于盐池县城北大街，共产党员孙春山任厂长。1942年，元华工厂正式投产。

元华工厂以生产毛制品为主，兼营运输业、农牧业和合作社，分毛毯、毛布、毡房、口袋四个组。最初只有两名工人，资金12万元。到1944年，工人发展到56名，资金达4171.7万元。1942至1945年为前方将士共生产毛衣胎、

毛被胎、毛绒帽、毛毡、毛毯等20多种毛制品共计12万件，还有大量的毛袜、毛手套、军用鞋等部队急需用品。元华工厂生产的产品，不仅能够满足盐池县的需要，而且支援了边区其他地方和部队，部分产品还运往国民党统治区，为边区换回了布匹、粮食、药品、火柴等重要物资，为支援边区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

1944年7月4日，毛主席在延安杨家岭大礼堂接见边区合作社英雄模范人物时，详细询问了靳体元创办元华工厂的情况。听完汇报后，毛主席表扬“元华工厂办得好”，靳体元本人也受到边区政府的特别表彰。

（执笔：张志勇）

三五九旅在盐池打盐

盐池县以境内众多的盐池而得名，食盐既是人民和军队的生活必需品，又是多种工业的原料。1937年8月，中共中央国民经济部发出“大家到盐池驮盐去”的号召，组织打盐、运盐、销售，以发展陕甘宁边区经济及改善群众生活。l940年，严重的灾荒使边区内外食盐的供应出现问题。边区政府为了促进产盐运盐业的迅速恢复与发展，确定“以军队生产为主，盐民产盐为辅”的方针。

1941年秋，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四支队两千余人，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来到盐池县的花马池打盐自救，历时一年有余。

三五九旅四支队刚到时驻扎在盐池县城，为了不打扰当地群众，八路军战士们掏了100多孔简陋土窑洞。随后，战士们一边捞晒成盐，一边砍沙蒿，筑坝畦，整盐坑，为来年大规模打盐创造条件。战士们克服了种种困难，苦战不休，一堆堆食盐像小雪山一样堆在了盐湖畔，使盐池县的盐产量逐年增加。这些食盐不仅满足了革命圣地延安和军民的食盐需要，而且还通过各种渠道输入国民党统治区，换回粮食、布匹、钢铁、药品、器械等急需物资，

对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活跃边区经济贸易，支援抗战发挥了重大作用。

1942年，边区政府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又将“以军队生产为主，盐民产盐为辅”的方针改为“盐民产盐为主，部队产盐为辅”，积极动员农民以及机关、部队、学校组织人力下湖打盐，并利用毛驴、骆驼将盐运往陕北、绥远等地，换回布匹、粮食、药材、通信设备等，在解决边区军民的部分困难和满足前线需要的同时，也增加了当地人民的收入。

1942年冬，三五九旅四支队打盐告一段落，开赴盐池县城休整。1943年春，接到党中央命令，三五九旅四支队开赴延安南泥湾，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如今，留在盐池的100多孔窑洞，仍然见证着当年三五九旅指战员们的英雄业绩。

（执笔：胡伟东）

红区盐池掀起“识字热”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盐池县文化教育十分落后。民国初年，全县只有一所惠安堡高级小学，学生很少，且多为地主豪绅子弟。1918年又设立了一所高级小学，个别乡也相继创办了初级小学和私塾。到1936年盐池解放时，全县历年小学毕业生仅有50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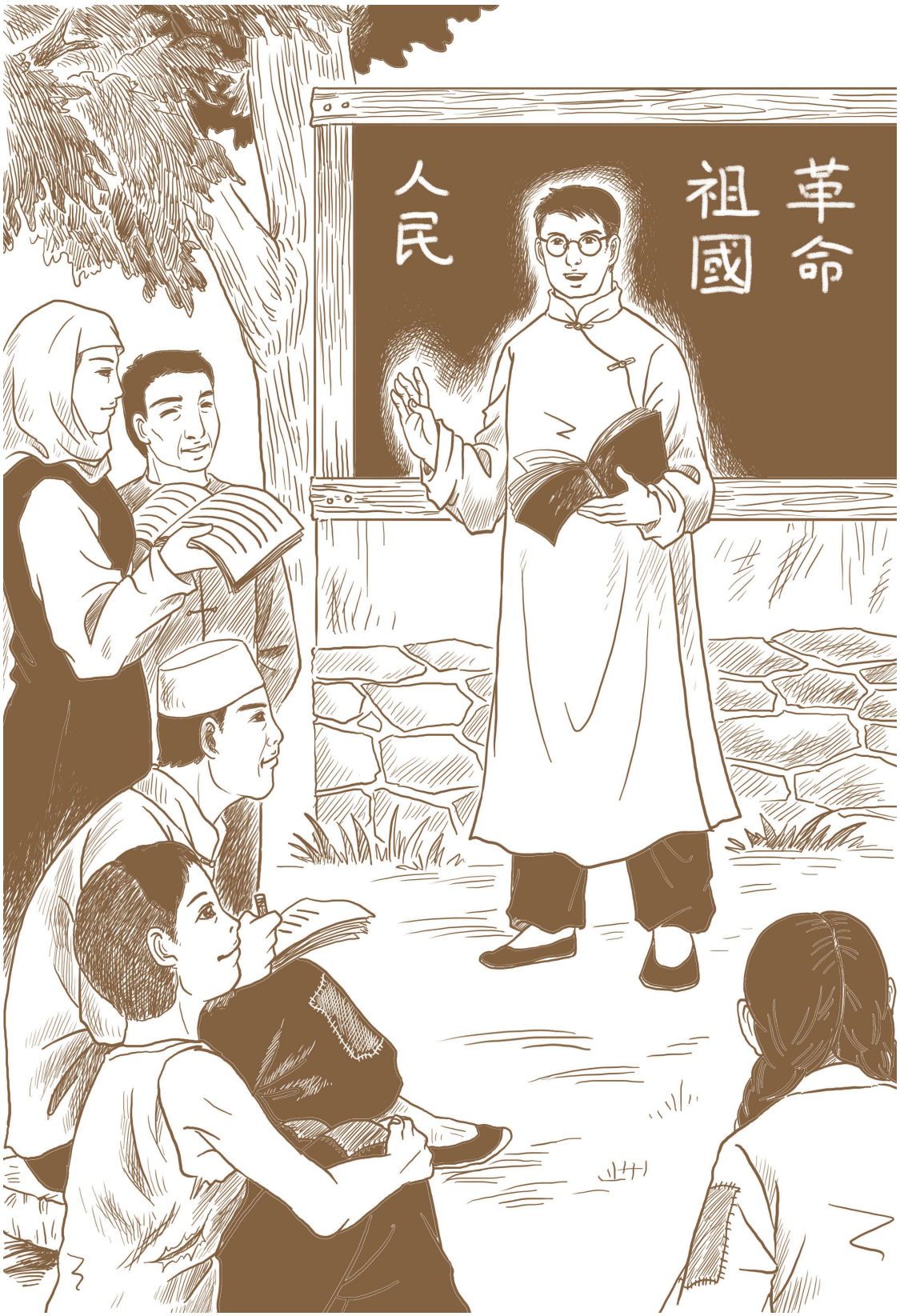
盐池解放后，党和政府特别重视教育事业，盐池的小学教育和社会文化教育有了较快发展。在办好公办小学的同时，号召和发动群众大办民办学校，边区政府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予支持。为提高教学质量，边区政府从延安鲁迅师范学校派了一批毕业生来盐池任教。盐池县又从当地选拔了部分文化程度高、思想素质好的青年送往外地培训，毕业后回盐池担任教师。为尊师重教，政府提高了教师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在县城北关还建立了伊斯兰小学，专收回族学生入学，以提高少数民族文化水平。

盐池县还大力发展社会文化教育。延安和三边地委派来一批文化干部到盐池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县委、县政府也派干部到各区、乡宣传动员，大办冬学、夜校、识字班、读书班、民教馆、半日轮等各类文化组织57个，参加学习的共有1765人。提倡开展家庭识字、夫妻子女互教互

学，这深受群众欢迎。特别是二区文化教育搞得最为红火，二区五乡妇女李兰英，不仅自己刻苦学文化，而且教丈夫、娃娃识字。1944年8月15日《解放日报》以《李兰英怎样教娃娃识字——介绍一种新的社会教育形式》为题做了长篇报道，县委对此也积极宣传推广。在李兰英的影响下，盐池二区有80多户搞起了家庭识字，许多农民脱掉了“文盲”的帽子，学到了文化知识。

《解放日报》多次刊登了反映盐池县文化教育工作的先进事迹与典型材料。11月中旬，在边区召开的文化教育表彰大会上，盐池县受到边区政府的嘉奖。

（执笔：张志勇）


革命
祖國
人民

王克和的故事

1906年，王克和出生于宁夏永宁县望洪镇西和村一户贫困人家。因家境贫寒不能上学，他很小就帮助家里拔猪草、挖野菜、下地干农活。但他天性聪敏，自学了珠算，是当时村子里有名的“好算盘”。

王克和与妻子勤俭持家，经常给有困难的乡亲四邻借钱送物，对无力偿还的也从不讨要。他乐善好施的行为深得群众敬佩，大家都称赞他是个扶贫济弱的大好人。

1933年，马鸿逵任国民党宁夏省政府主席后，苛重的赋税和兵役让人民苦不堪言。王克和被迫离乡，在盐池、定边、三段地走乡串户做起了生意。

1936年5月，红军西征，解放了陕甘宁三省交界的广大地区。王克和听到红军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看到群众打土豪、闹革命、纷纷参军的热烈场面，萌发了参加革命的思想。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宁夏形势危急。10月，中共绥蒙工委和宁夏工委在定边成立，中共绥蒙工委派田万生到三段地开辟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统战工作。在田万生的培养教育下，王克和成长为地下交通员。他以经商为掩护，多次往返于鄂托克、永宁、宁朔、灵武等地，搜集、传递国民党统治区军政情报，他的家也成为中共地下党的

交通站。

1944年夏，王克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长年在宁夏和鄂托克旗草原之间奔走，为党传递了一份又一份重要的情报。抗战胜利后，王克和多次深入阿拉庙了解当地统治集团内部情况，为三边地委正确解决阿拉庙事件提供了重要情报。

1947年，王克和接受了三段地工委布置的侦察任务，深入大庙、乌堤以给鄂旗边防司令奇恩诚母亲拜年为名，了解奇部的兵力部署，并装成醉汉连夜返回三段地。三边军分区根据他提供的情报，立即调兵消灭了奇部，为解放鄂旗扫除了一大障碍。3月，三段地工委转移。由于原工作据点遭到破坏，王克和更名王景文回到故乡永宁，继续从事地下活动。5月，正在灵武活动的王克和被敌人便衣发现并逮捕。因为王克和被捕后只字不吐，坚贞不屈，敌人只好把他移交宁夏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在此处，王克和见到了同时被捕的地委负责人王延，两人患难重逢，悲喜交加。他向王延表示："干革命，哪有不死人的?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死就死我一个，绝不会连累党，绝不会拖累别的战友！"

在狱中，敌人对他实施了揭背花、敲骨拐、上脑箍、上拔筋床、坐老虎凳……几乎用尽了监狱里的各种酷刑。但他依旧坚定信念，铁骨铮铮，对党的机密硬是只字未吐。

9月2日晚，王克和告诉同一牢房的战友周光耀："敌人给我的时间不多了，你要坚持斗争。假如送你到军法处，打死你也什么都不能说，不能暴露党的机密！"3日凌

晨，他和前来送别的妻子、孩子隔着铁窗相见，王克和对泪流满面的妻子说："坚强些，好好照顾孩子，不久就会解放，那时大家就都好过了！"

行刑的时候，天空阴沉沉的，萧瑟的秋风夹带着寒夜的清冷吹到了王克和的脸上。被一块毛巾塞住了嘴的王克和看着脚下熟悉的黄土地，看着前来为自己送行的乡亲们，只能用深情的目光表示对亲人和乡亲们的眷恋，与大家依依告别……

刽子手连开三枪王克和才倒下，时年41岁。

（执笔：张　莉）

回汉支队

“宁夏川，两头尖，东靠黄河西靠山。年种年收水浇田，到如今家家落得个没吃穿，不能怨老天。”这首歌谣是宁夏人民在马鸿逵反动统治下苦难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对马鸿逵统治的血泪控诉。因不堪压榨，许多回汉群众逃到解放区的定边、盐池。1947年1月，为解救宁夏劳苦人民，三边地委按照上级指示，决定成立一支宁夏人民的革命武装——回汉支队。回汉支队共有干部、战士234人，其中回族65人。

1948年春，解放战争已转入战略反攻阶段。三边地委决定，回汉支队“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全力开展宁夏工作，积极、主动向宁夏境内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和歼灭盐池伪政权、环县团匪”。根据这一要求，回汉支队奉命配合三边军分区转入外线作战，首战目标选择了盐池西部重镇惠安堡。惠安堡位于盐池、同心、灵武、金积四地的交界处，是马鸿逵盐池县政府所在地，也是马鸿逵防卫宁夏的东大门，驻有一个骑兵连和一个清乡团，共有300多人。5月1日，回汉支队冒雨夜行军120里，经过一天激战和政治攻势，守塞之敌投降，惠安堡宣告解放。惠安堡战斗结束不久，回汉支队协同盐池、定边游击队向盐池、环县、同心边境西进，发动群众，消灭当地号称“八大山

王”的十余股土匪武装，解除了陕甘宁边区的心腹之患，从此回汉支队声威大震。

1948年8月，回汉支队在吴旗一带山区以少胜多，击退了数倍于己的敌人，并在吴旗进行“新式整军”，战斗力大大提高。同年，西北野战军四纵队收复定边城，彭德怀司令员在祝捷大会上风趣地说：“马鸿逵是秃头上的虱子——跑不了。”盐池战斗打响后，敌骑向盐池城北土沟逃窜。此地正是回汉支队的阻击阵地，早已做好准备的指战员待敌临近，枪弹齐发，一时间敌骑互相冲撞，乱成一团，回汉支队乘势痛歼敌匪。这次战斗是回汉支队由弱变强、逐步走向正规化的重要转折。

1949年8月1日，任山河战斗结束后，回汉支队与西北野战部队十九兵团六十四军汇合，作为先头部队经中宁到达吴忠组成骑兵队，开往同心县下马关一带剿匪。数月后，回汉支队又进驻永宁县塔桥一带，取得节节胜利。1950年1月，回汉支队进驻银川，与定边县游击队合编为宁夏独立团。至此，回汉支队完成了“保卫边区、解放宁夏”的历史任务。

回汉支队的创建与发展，是回汉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寻求光明、争取解放的必然结果，是回汉民族团结的典范，也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和军民团结的硕果。

（执笔：何成江）

著名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

别人的仇恨像座山，王贵的仇恨比天高。
老牛死了换上牛不老，杀父深仇子要报。
我个死了不要紧，千万个勇汉后面跟。
马蹄落地嚓嚓响，长枪、短枪、红缨枪。

这些读来朗朗上口、情真意切的诗句，出自著名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它是谁创作的呢？

《王贵与李香香》是抗日战争时期李季创作的一首长篇叙事诗。这首诗歌以陕北农民革命运动为背景，叙述了一对农村男女青年的恋爱故事。王贵是一个深受地主压迫的农民，13岁那年，眼睁睁地看着地主崔二爷逼租，父亲被活活打死，自己成了地主家的放羊娃。王贵不畏强暴，坚定勇敢，暗中参加了农民赤卫军，后被地主抓捕。崔二爷对王贵软硬兼施，并用死来威胁他，也丝毫不能动摇他的革命意志。王贵从自身的苦难经历中认识到，只有闹革命，穷人才能翻身，他坚信“大风迟早要吹灭地主阶级这盏灯”。

王贵的爱人李香香是一位爱憎分明、相貌俊俏的农村姑娘。她同王贵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建立起了忠贞的爱情。香香“由小就爱庄稼汉”，当王贵遭到地主崔二爷

毒打时，她冒着危险，黑夜里给革命游击队送信，从而解放了家乡和亲人。李香香理解丈夫，支持丈夫，婚后的第三天，就支持王贵参加了游击队。李香香遭到地主崔二爷的迫害和侮辱时，不受威逼利诱，愤怒地痛斥崔二爷："有朝一日遂了我心愿，小刀子扎你没深浅。"

《王贵与李香香》这篇作品深刻地揭露了地主阶级压迫下农民的悲惨状况，生动地反映了陕甘宁边区农民在党的领导下闹革命的景象，表现了革命斗争与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紧密相连的主题，生动塑造了王贵与李香香这对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农民的形象。

那么，这篇优秀作品是怎样创作出来的呢？

作者李季是河南唐河县人，生于1922年8月，1938年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赴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在八路军中任连指导员。

1942年冬季，李季奉命从太行山区来到革命圣地延安，随后被分配到三边分区靖边县小学任教导主任。李季自幼爱好文学，尤其喜爱民歌。一踏上三边的土地，他就被这里丰富多彩、优美动人的陕北民歌深深地迷住了。特别是信天游，最能表现当地劳动人民的粗犷性格和真挚感情。李季反复品味信天游的意境，觉得每一首歌都是一扇打开心灵的窗户。

1944年秋，李季被分配到盐池县担任政府秘书。这期间，李季与当地颇有名气的民间诗人王有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王有的作品，为李季创作《王贵与李香香》提供

了灵感。经过长时间琢磨，一篇以三边人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反抗地主阶级、建立人民政权为素材的叙事长诗，终于酝酿成熟。

1945年隆冬，北风怒吼，天寒地冻。在盐池县政府一间小小的工作室里，李季就着昏暗的麻油灯，奋笔疾书。手冻僵了，脚冻麻了，就到炕边的炭火盆前去烤一烤，然后接着写。整整20个夜晚，一篇用信天游形式写出的长达740多行的叙事诗——《红旗插到死狼湾》诞生了。李季利用饭后茶余或下乡的机会，不厌其烦地念给盐池县委、县政府的干部和群众听，虚心征求大家的意见，又做了多次修改，然后才寄给报社。长诗采用经过提炼加工过的陕北农民口语，通俗易懂，如“马蹄落地嚓嚓响，长枪、短枪、红缨枪”“山丹丹开花红娇娇，香香人材长得好。一对大眼水汪汪，就像露水珠在草上淌”“王贵是个好后生，身高五尺浑身都是劲，庄稼地里顶两人”……语言生动，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意蕴，叙事节奏如行云流水，行文韵味通俗优美，即便是用现代人的眼光来审视这篇作品，也不禁为之赞叹。

1946年夏，《红旗插到死狼湾》在《三边报》上发表了。同年秋，延安《解放日报》将该诗题目改为《王贵与李香香》，在报上连载。延安广播电台广播了这篇作品，新华社也用电讯发往全国，解放区印了单行本发行。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高度评价《王贵与李香香》是“新诗歌的方向”。《王贵与李香香》从盐池走向全国，轰动

了诗坛。李季一举成名，成为著名的诗坛新秀。如今，在盐池县革命烈士纪念馆还雕刻着这样一句话：《王贵与李香香》，边区文化教育的里程碑。

（执笔：韩林森）

彭老总赠枪

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人民革命武装——回汉支队在定边成立。这支武装力量主要是由宁夏籍回汉青年组成，为保卫解放区和解放宁夏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7年，西北野战军在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大捷后，挥师陇东，直逼环县。回汉支队经过吴旗整训，士气高涨，纷纷请战，要求收复失地。但是，武器装备成了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天，回汉支队的几位领导坐在一起，一边喝小米汤，一边拉话。这个说："这次蟠龙大捷，大部队缴了不少武器，听人说，他们用不完，何不乘机去要些枪回来，大家商量一下吧！"那个说："这有什么好商量的，战士们早就坐不住了，要去就抓紧时间快点走，要来枪我们就把部队拉出去干它一场。"经过商量，决定由支队长金三寿和政委何广宽去要枪。

当晚，金三寿和何广宽就带着4名战士骑马出发，很快到了西北野战军驻地。

在哨兵的指引下，金三寿、何广宽来到彭老总办公的地方。他们走上前，刚要向站岗的战士问话，里面出来了一个人，是定边警三旅的张参谋长，他与金三寿是老熟人了。张参谋长问金三寿："金队长，怎么到这儿来了？"金三

寿回答:“我们来找彭老总要枪。”张参谋长一听就笑了,带着他们走进院子。

进了院门,他们看到院里铺着几张席子,席子上平铺着一张大地图,一位身着军装、身材魁梧的汉子坐在席子上,聚精会神地看着地图,金三寿一行走进院子他都没有发觉。张参谋长悄悄对金三寿说:“这就是我们的彭老总。”金三寿的心怦怦直跳,整整衣领,走上前向彭老总敬礼:“报告总司令,我是金三寿,有事找您。”彭老总哈哈笑着,站了起来,同金三寿他们一一握手。张参谋长把金三寿和何广宽向彭老总做了介绍,并说明了金三寿他们的来意。

彭老总拉着金三寿和何广宽的手,让他们在席子上坐下来,详细询问起回汉支队训练和生活的情况。

“你们支队现在有多少人?”彭老总问金三寿。

“300多人,就是缺少枪支。”金三寿回答说。

“你们回汉支队的战士是好样的,为保卫解放区和配合大部队作战做了许多工作。我们是一家人嘛,你们的困难,我们本来就应该帮助解决。至于武器嘛,哈哈,这不用愁,有运输大队长给送呢!”

说到这里,彭老总略略一顿,手指着地图让金三寿他们看,说道:“明天我们就要攻打环县了,你在这儿待几天,打了胜仗要啥武器都有,到时你尽管拿。”

这时,警卫员牵来了马。金三寿一看彭老总要出发了,知道攻打环县的战斗马上就要打响,急切地对彭老总说:“我们也要跟您去打仗。”彭老总边上马,边慈祥地对

金三寿说:“你不能去,你是回民同志,前方也不能很好地招待你,等我们收拾了马鸿宾的部队,你们就来拿枪。”说完一拉缰绳,放开马,一溜烟出了院门。

金三寿他们在野战军总部住了三四天,前方来人通知,战斗已经结束,消灭了马鸿宾的几个团,让金三寿他们去前线拿武器。张参谋长给金三寿开了张证明,告诉金三寿:“你拿着这张条子,见到部队的各级指挥部就要枪,营部、团部、旅部都可以要,要够为止。”

于是,金三寿等人拿着张参谋长开的证明到各部队去要枪、要子弹。每到一处,部队的干部、战士都热情地拿出缴获的武器让他们挑。就这样,回汉支队的武器装备问题完全得到了解决。支队每个战士都领到了枪,每个连队还配备了4挺轻机枪和3个掷弹筒,部队士气空前高涨。

彭老总的平易近人给金三寿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回汉支队的关心,更是让整个回汉支队的战士们深受感动。

(执笔:王俊昌)

智取惠安堡

解放战争进行到第二年，西北野战军迅速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外线作战。回汉支队积极配合西北野战军战略反攻，在解放宁夏的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1948年春，回汉支队与三边军分区的1个团3个大队在定边一带集结，首要目标是解放惠安堡。

惠安堡地处盐池、同心、灵武、金积四县交界地带，是马鸿逵在陕甘宁地区西大门设置的一个坚固堡垒，也是防守宁夏的东大门。马鸿逵在这里构筑城墙，设立军警特务机构，组织反动武装，经常对解放区进行骚扰破坏。当时在惠安堡驻守着马鸿逵的一个连和一个清乡大队，共300余人。

不久，三边军分区获悉，守卫惠安堡的马鸿逵部骑兵连奉命调走，只剩清乡大队100多人驻守惠安堡，这是解放惠安堡的绝佳时机。三边军分区及时制订解放惠安堡的作战方案，决定由解放军部队承担主攻任务，回汉支队配合作战。于是，各路部队向惠安堡疾进，拂晓前包围了惠安堡。

天刚放亮，战斗打响了，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一浪高过一浪，整个惠安堡硝烟四起。主攻部队一步步缩小包围

圈，把敌人挤压到城中一个三丈高的炮楼里。敌人凭借有利地形负隅顽抗，战斗进入了僵持状态。两个小时过去了，碉堡还没有攻下。惠安堡周围有马鸿逵的一个骑兵团在活动，万一他们闻讯赶来，后果不堪设想。

形势十分危机，怎么办?军区司令员郭秉坤召集会议研究攻打碉堡的办法。

“现在只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尽快设法拿下碉堡，一个是迅速撤出战斗。老金同志，你什么意见，有没有办法?”郭司令的目光注视着金三寿，急切地对他说。

“交给回汉支队解决!”金三寿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坚定地回答。

“不行！不管交给谁，硬攻是不行的，要是没有办法就撤出战斗吧。”郭司令摆摆手。

“惠安堡是宁夏东部重镇，这一仗的胜负对解放宁夏意义重大，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打胜。这里的清乡大队长是灵武人，姓杜，知道我金三寿的名字，他手下的人大部分是抓来的穷苦农民，真正死心塌地给马鸿逵当炮灰的人不多，有争取的可能。可以以我的名义写张条子递进去，争取他们投降。”金三寿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

郭司令觉得可以试试看，让人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劝清乡大队认清形势，缴械投降，然后找来当地一个绅士送了进去。

过了不到20分钟，绅士带着清乡大队的回信回到了指挥部。郭司令打开回信看了起来。

“乱弹琴！他们要你金司令不带武器，上炮楼和他们

见面，他们才能投降。搞的什么鬼，这不是要拿你当人质吗?”郭司令一边撕碎回信，一边气愤地嚷道。

“去就去，怕什么!”金三寿斩钉截铁地说。

“你不能冒这个险。”郭司令就是不同意。

“让我去吧，我们这么多人围着碉堡，料他们也不敢对我怎么样。”金三寿态度坚决。

郭司令在地上来回踱着步，大家都焦急地望着他，金三寿也不断地嚷嚷着。最后，郭司令终于下了决心。他走到金三寿面前，用力握住金三寿的手，严肃地说：“老金同志，我代表三边地委、军区司令部，命令你去敌人碉堡执行这一艰巨任务。要沉着冷静，注意安全，一定活着回来!”

“是！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金三寿放下枪，转身出门就向敌人的炮楼走去。

炮楼上，敌人的几十条枪瞄准金三寿。金三寿毫不畏惧，挺起胸膛，迎着敌人的枪口，大步流星地走了上去。

接近炮楼，金三寿对着里面大声喊道：“清乡大队的弟兄们，我是金三寿，请你们杜大队长来说话。”杜大队长闻声从炮楼里探出了脑袋。

“杜大队长，我认识你，你也知道我。宁夏人当兵都是马鸿逵用绳子捆来的，你们难道真愿意为仇人卖命?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你是知道的，只有放下武器投降，才能有活路。”金三寿努力在心理上瓦解敌人的意志。

杜大队长挠着头皮想了一会儿，又与他周围的人商量着什么。然后，以试探的口气对金三寿说：“你们能保

证不杀我，还给路费让我的弟兄们回家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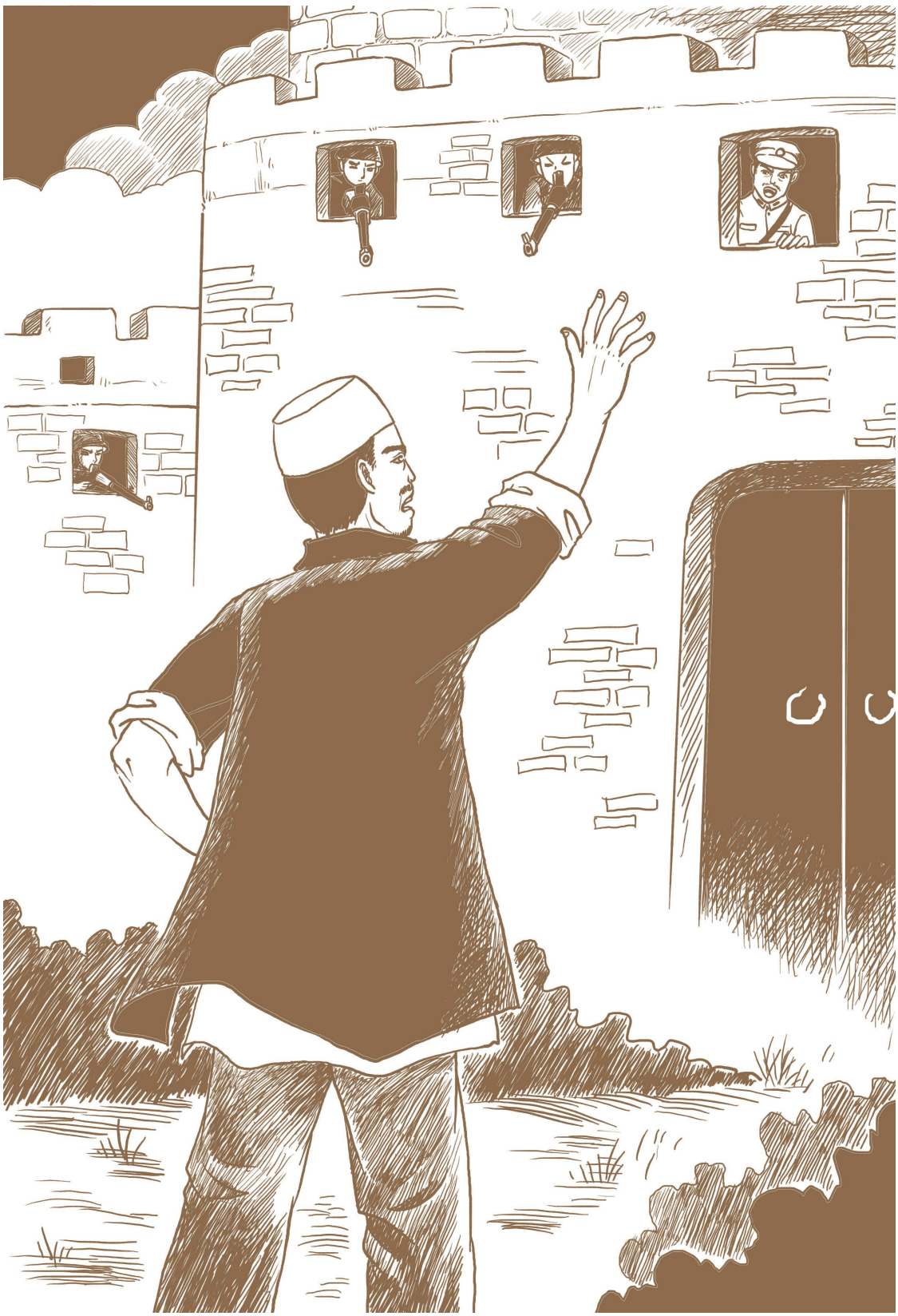
“没问题，你提出的条件我们都答应。”金三寿同意了。

不一会儿，炮楼里伸出一面白褂子充做的白旗，枪也从射击孔里扔了下来，清乡团剩下的几十号人举着手从炮楼里走了出来。

攻打惠安堡的战斗就这样胜利结束了。

金三寿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沉着勇敢，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保证了战斗的胜利，在回汉支队和当地群众中传为佳话。

（执笔：王俊昌）



激战任山河

在宁夏南部的彭阳县境内，有一个闻名遐迩的小山村，它就是当年曾被炮火烧焦、被烈士鲜血染红的任山河。静静矗立在任山河烈士陵园里的纪念碑，记述了一段人民解放战争血与火的历史篇章。任山河战斗是波澜壮阔的西北解放战争中一场激烈的战斗，它拉开了解放宁夏的序幕……

任山河是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村边那条道路是通往固原县城的必经之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任山河一左一右各有一个山头，左边的叫鹦哥嘴，右边的叫罗家山，两山相距不足千米，像一把铁钳扼守着中间的道路和村庄。

1949年8月1日，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六十四军向驻守任山河的国民党宁夏兵团第十一军马光宗部发起总攻击。解放军用野炮、山炮、迫击炮集中轰炸敌人的阵地，掩护突击部队展开冲锋。敌阵硝烟弥漫，尘土飞扬。我一九二师五七四团发动数次猛攻，都遭到了敌人的疯狂阻击。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我军指战员不怕牺牲，英勇顽强地与反扑之敌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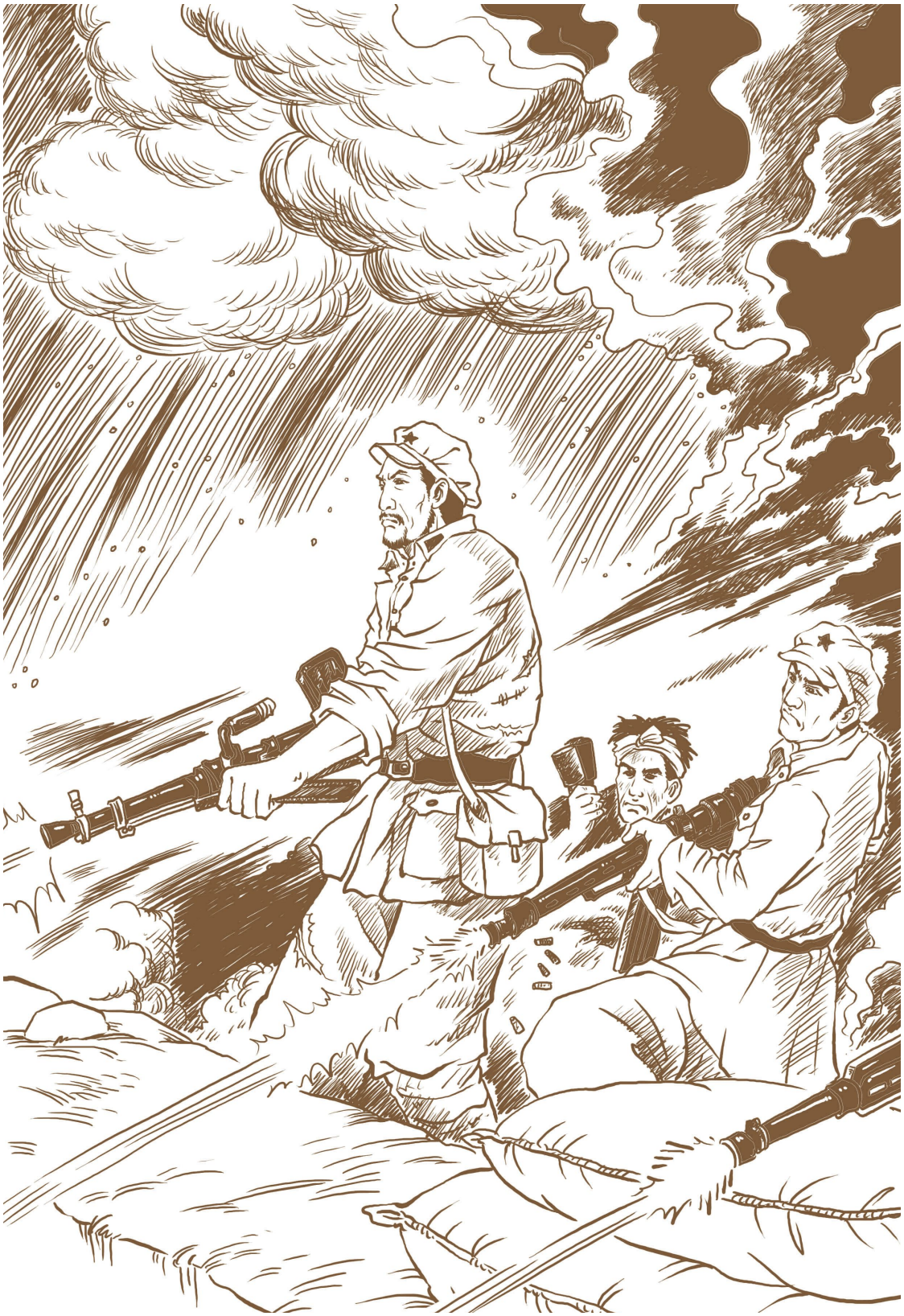
在这紧要关头，风云突变，晴朗的天空瞬时乌云密布，暴雨夹着鸡蛋大的冰雹倾盆而下，集中倾泻在了山上

敌军阵地。敌人有的被砸蒙砸伤，有的被洪水卷走，有的枪打不响，给我军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敌人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惊呆了，一看大势已去，纷纷举手投降，解放军大获全胜。由此，在当地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共产党得天下，不但是民心，也是天意呀！”

经过两昼夜的激战，我军以牺牲364名指战员的代价，先后攻占了鹦哥嘴、罗家山、任山河、石家湾等阵地，毙伤和俘虏敌军2795人，缴获各种武器1400余件，任山河战斗取得了全面胜利。

任山河战斗是整个宁夏解放战争中最激烈的一仗，打响了解放宁夏第一枪，为解放全宁夏奠定了基础。

（执笔：叶长青）



激战三关口

三关口位于六盘山东侧，瓦亭峡开口处，是西安至兰州、平凉至宁夏的两条公路的连接要冲。两面石峰突兀，壁立千仞，如刀削斧砍，东西仅有一条狭道可通，地形异常险要，确实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关。

1949年8月1日凌晨5时，三关口战斗总攻开始。解放军五七九团指战员如猛虎蛟龙，跃出战壕，向守敌发起猛烈冲击，冲杀声震天撼地。濒临灭亡的敌人，躲在坚固的工事里，居高临下，负隅顽抗，密不透风的交叉火力，拦住了发起攻击的解放军部队。

解放军战士勇猛地朝山坡上的敌人冲去。突击排的指战员迎着呼啸的炮弹，跳进敌人的战壕，与敌人扭在一起，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有个战士与敌人拼杀在一起的时候，受伤被围时就拉响了挂在腰间的手榴弹，与十几个敌人同归于尽。

这时，解放军主力从侧面发起猛烈攻击，战士们奋力向主峰攀登。陡峭的山壁上，长满了蝎子草，螫得战士们的手臂上起了成串的水泡；尖利的岩石，刺破了小腿和膝盖，留下了斑斑血迹。爬到了半山腰，忽听得从山背后传来一阵阵吆喝声夹杂着枪托撞击声。原来，就在解放军三连向主峰攀登的同时，敌人也以两个连的精兵，从主峰

的另一侧拼命往上爬。战士们不顾一切，奋力攀登。离峰顶还有20多米处，突然出现了一道数丈高的绝壁，挡住了攀山的路。战士们迅速搭起人梯，咬紧牙关，手抓野草或抠住石缝，拼尽浑身力气攀登绝壁。连长忙叫战士们把裹腿带接起来，拧成几条井绳一般粗的布绳，丢给攀上绝壁的两个战士。很快，几条布绳从绝壁上的树上垂下来，战士们手抓布绳，脚蹬石壁，一个接一个地攀爬上去。几个最先登上绝壁的战士，抢先爬上了峰顶。从峰顶往下看，只见敌人蚂蚁般布满小坡，刺刀和马刀寒光闪闪。战士们一见敌人只差几步就要爬上来了，赶紧甩出一排手榴弹，将敌人炸得乱成一片。接着，登上峰顶的机枪手，架起机关枪朝敌人猛烈扫射。在解放军的打击下，敌军乱作一团。敌人在解放军两面夹击下，有的举手投降，有的磕头告饶，“与阵地共存亡”的誓言早已被弃阵北逃的现实取代。漫山遍野，敌人溃不成军，军需物资俯拾皆是，枪支弹药塞路，人马竞相抢道，狼狈不堪。鏖战了4个小时，解放军终于突破了三关口一线敌军的防御。

三关口之战和同一天进行的任山河之战，解放了整个固原地区，打开了宁夏的南大门，为进一步各个歼灭敌人、解放全宁夏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执笔：叶长青）

战斗英雄燕飞

在解放宁夏第一仗任山河战斗中，有位“裹肠大战”的英雄，他的名字叫燕飞。

1949年8月1日中午，天气闷热，人民解放军对盘踞在任山河的顽敌发起总攻。当主攻部队六连突破敌人的前沿阵地后，遭到两侧高地敌人的阻拦扫射。六班班长燕飞根据上级命令，带领战士坚守已经取得的突破口，保障我后续主力部队顺利投入战斗。

这个突破口地处罗家山、鹦哥嘴两山山口，坡缓开阔，易攻不易守。燕飞向全班战士响亮地喊出了“人在阵地在，即使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巩固住突破口”的口号。在观察地形后，燕飞按照3个战斗小组部署了兵力。狡猾的敌人妄图趁我立足未稳，不惜一切代价夺回阵地，出动了大约两个排的兵力，向六班疯狂反扑。燕飞立即命令全班做好战斗准备，再三叮嘱战友，一定要把敌人放近了再打。当敌人距离我方阵地不到30米时，全班战士先以一排手榴弹投入敌群，继以冲锋枪、步枪一齐开火，在阵地最前面的燕飞端起冲锋枪就是一阵横扫，打得敌人抱头鼠窜，龟缩回原来的壕沟里。

在打退敌人的两次进攻后，下午4时许，阵地上显得格外平静。突然，敌人约一个连的兵力，在密集火力的掩

护下，对六班发起第三次反扑。燕飞和战士们在阵地上整整坚守了两个小时，已是精疲力竭。由于敌众我寡，六班的阵地被突破，有十来个敌人突入了二组阵地。

在此危急关头，燕飞立即命令一组火力阻击后续之敌，自己率二、三组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燕飞和战友们早已杀红了眼，左冲右突，仅燕飞一人就接连刺死了3个敌人。谁知，就在他和一个敌人厮杀时，另一个敌人刺中了他的腹腔，肠子从腹部流了出来，鲜血顿时浸红了军装。他咬紧牙关，忍受着剧烈的疼痛，以惊人的毅力把肠子塞了回去，并用腰带扎紧伤口继续端起了枪……直到英勇牺牲。

“为燕飞班长报仇！”战士们怒吼着，越战越勇，将突入之敌全部拼死。在掩埋烈士遗体时，大家发现燕飞身负6处重伤。战士们哭泣着，心像刀扎般的疼痛。

战后，为了表彰他们的英雄事迹，六班被授予“燕飞班”的光荣称号，班长燕飞追记大功。

如今，英雄虽然离我们远去，但他用鲜血染红的精神丰碑光照千秋，其英雄事迹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执笔：叶长青）

“和平老人”郭南浦

郭南浦（1873~1958），原名郭福金，祖籍宁夏吴忠，西北回族知名人士。

在1949年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北、解放宁夏的年月里，76岁的民主人士郭南浦先生不畏艰险，为宁夏的和平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9年秋，西北野战军解放西安、兰州等大城市后，开始挺进宁夏。为了争取和平解放宁夏，郭南浦受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的委派，承担起了赴宁夏说服马鸿逵、马鸿宾进行和谈的重要使命。

就这样，郭南浦和兰州的回族开明人士组成了和平代表团，乘坐一辆卡车，从兰州出发，沿西兰公路驶向固原方向，历经艰险，于9月14日抵达宁夏银川。

有宁夏“土皇帝”之称的马鸿逵在解放军即将进入宁夏的情况下，既要求自己的部队要节节顽抗，又做好逃往台湾的准备，如抵抗不了就在银川放火。9月中旬，他见大事不妙，离开银川逃往重庆。

马鸿逵的儿子马敦静在马鸿逵离宁后代理宁夏省主席。郭南浦等人到银川后，马敦静拒绝和谈，并将他们软禁在其住所内。第二天，马敦静责令郭南浦等人在3小时内离开银川。至此，马鸿逵父子彻底关闭了和谈大门。

虽然没有促成马鸿逵父子接受和平谈判，但主政宁夏的另一位国民党政要马鸿宾，在郭南浦等人的积极努力和帮助下，走上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马鸿宾曾与中国共产党有过一些交往，在人民解放军向宁夏挺进时，他已经有了率部起义的意向，只是还存有许多顾虑。针对马鸿宾的顾虑，解放军十九兵团一方面加大政治攻势，一方面向其施加必要的军事压力。中宁县城解放后，解放军又包围了马鸿宾八十一军所在地——中卫，在军事上为逼迫马鸿宾和平起义创造了条件。

在此形势下，郭南浦等人冲破重重阻力，设法与马鸿宾会了面。郭南浦与马鸿宾进行了一次长谈，向他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和平意愿。

“为了使宁夏免于战火，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希望宁夏尽早结束战争，实现和平。彭德怀司令员亲自委托我来做你的工作。现在国民党大势已去，宁夏的局面你也看到了。眼前你有一条光明的路，希望你迷途知返，率部起义。”郭老先生的话掷地有声。

“我是拥护共产党的，也希望宁夏的老百姓少受战乱之苦。”马鸿宾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那就应该早做抉择，为什么还要给蒋介石当炮灰呢？”郭老先生反问道。

马鸿宾顿了顿，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过了两三分钟，他说出了自己的顾虑：“我以前做过一些对不起人民的事，共产党能原谅吗？我的家属和部下该怎么处置，他们的安全能得到保障吗？”

郭老先生把带来的有关和平起义的《约法八章》递了过去，说："共产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只要你接受和平起义，你就对党和人民立了大功，就是有功之臣。至于你的家属和部下的安全问题你更应该放心，都会得到妥当安置的。"

"实际上我早就有了起义的想法，只是觉得前途未卜，所以拖到了现在。既然这样，我现在就开始筹划起义的事。"这时，马鸿宾彻底打消了顾虑。

"你在最后关头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共产党和老百姓会记住你的。"郭老先生对马鸿宾的抉择表示了肯定。

"马敦静虽是我的侄儿，但我们多年已不来往。他的态度郭老您也知道，我是管不了的。只有八十一军军长马惇靖是我儿子，我能负责。"马鸿宾有些歉意。

"让八十一军和平起义同样是大功一件哪！但时间紧迫，起义时间越早越好。"郭老先生最后说。

马鸿宾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紧接着，他电告八十一军军长马惇靖"研究起义"。同时，派车护送和平代表团成员赶赴中宁，与解放军协商有关和谈的具体事宜。

1949年9月19日，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代表和国民党八十一军代表在中宁县城签订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与国民党八十一军和平解决协定》。至此，国民党八十一军光荣起义，接受和平改编。

国民党八十一军的和平起义，对宁夏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进一步孤立、分化和打击了马鸿逵的势力，加快

了宁夏解放的进程。

年逾古稀的回族老人郭南浦，在宁夏解放之际，不顾年事已高，往来奔波于宁夏各地，最后促成和谈，为宁夏和平解放立下了功勋。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因此赠送他一面锦旗，上书“和平老人”四个大字。

宁夏解放后，郭南浦来到了北京，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亲切接见。

（执笔：王俊昌）

国民党八十一军起义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后，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10万大军在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指挥下，分左、中、右三路，挥师东指，挺进宁夏，宁夏解放指日可待。但时任国民党宁夏省主席的马鸿逵仍然执迷不悟，命令其子宁夏兵团司令马敦静，重新调整了各军建制，设置了三道防线，妄图负隅顽抗。针对敌人的防御部署，解放军决定首先突破第一道防线，截击中宁之贺兰军，争取驻扎中卫的国民党第八十一军起义，然后再集中力量歼灭金积、灵武、银川之敌。

9月1日，十九兵团以摧枯拉朽之势进军宁夏，全军将士奋勇杀敌，至17日，占领了沙坡头、迎水桥一带，兵临中卫城下，敌八十一军处于解放军大军包围夹击之下。在解放军大军压境及强大的政治攻势下，马鸿宾、马惇靖父子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的《约法八章》，决心率部起义。

18日，马惇靖派马培清为代表，到中宁与解放军六十四军军长曾思玉、副政委傅崇碧、联络部长牛连璧和谈，并拟订了协议条款，定于19日中午12时签字。19日上午，马惇靖乘羊皮筏子来到康滩渡口对面黄河中心的一个沙滩上，解放军六十四军派副政委傅崇碧到沙滩上去见马惇靖，邀请马惇靖到岸上来谈判。马惇靖与傅崇碧

一同乘羊皮筏子到黄河南岸，又共同乘汽车赴县城富宁公司中宁办事处（军部所在地）。

在军部，解放军六十三军军长郑维山和六十四军军长曾思玉同马惇靖正式谈判。郑维山和曾思玉两位军长以北平和平解放为例，具体地说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约法八章》的详细内容，告诉马惇靖应当走和平解放的光明大道。马惇靖表示接受《约法八章》的各项条件，通电和平起义。下午7时，曾思玉代表解放军十九兵团，马惇靖代表国民党八十一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与国民党八十一军和平解决协定》上签字，八十一军宣布起义。中宁、中卫两地结束了战争状态，实现了和平解放。21日，解放军浩浩荡荡乘船渡过黄河。

至此，宁夏解放曙光重现，前景一片光明。

（执笔：胡伟东）

激战涝河桥

国民党八十一军起义后，在四面楚歌的困境中，马鸿逵、马敦静父子二人却始终拒绝十九兵团和谈的提议，下令死守宁夏，仍摆出一副困兽犹斗的架势。甚至计划在宁夏失守后，隐蔽“精良”于贺兰山中，幻想在逃亡台湾的国民党部队反攻大陆时，进行“游击战”。马敦静将其所属3个军11个师的兵力进行重新部署。除贺兰军一部和第十一军退向银川、灵武、宁朔地区外，一二八军军部和二五六师部署在灵武县，保安三师在吴忠堡，三五六师及骑兵二十旅在金积以南、以东地区，保安一师在金积以西地区。敌人企图凭借牛首山制高点与青铜峡天险以及该地区水网密布等条件，与解放军在金积、灵武一带决战。

为彻底打破国民党宁夏兵团顽固势力的幻想，针对敌情变化，十九兵团决定首先歼灭敌一二八军于金（积）、灵（武）地区。我一九一师、一九二师迅速挥戈北上，实施歼灭吴忠堡之敌，并切断金积守军逃路的作战计划。解放军一九一师五七一团和陕北独立一师、独立二师迂回吴忠堡东北，形成合围吴忠堡守军之势。

一九二师主力于20日傍晚从金积南经廖桥、杨马湖逼近吴忠堡南大门——涝河桥。马鸿逵部三师主力凭借清水沟屏障，在沟北一线布防，并在吴忠堡以南各村纵深

分散固守堡寨。解放军一九二师五七五团扫清清水沟南岸诸据点后，吴忠堡守敌马部保安三师第七团慑于被歼，将公路桥炸毁，并以假谈判拖延时间，加修工事，负隅顽抗。解放军五七五团团长及时识破敌人的阴谋，将计就计，一面与敌谈判，一面令一营进行战斗准备。一营三连接受攻敌桥头任务后，利用夜间进至沟岸观察敌情、地形，研究战斗方案，决定采取火力、爆破、突击相结合的战法，攻歼桥头碉堡群守敌。各排明确了具体任务，并进行了战前政治动员。全连指战员对敌人顽抗是真、谈判是假的举动义愤填膺，纷纷表示坚决消灭敌人的决心。在当地群众的支援下，利用门板、梯子等制作了架桥器材，完成了战斗准备。

21日凌晨，在敌人拒绝放下武器的情况下，我五七五团一营三连发起对敌攻击。驻守在桥头的守敌凭借坚固的碉堡群工事，用轻、重机枪疯狂扫射。加上敌人事先阻塞清水沟下游，致使涝河桥附近河水暴涨，我军三次架桥强攻都未成功，三连伤亡较大。据此，五七五团重新组织火力，将敌对我威胁最大的机枪火力点摧毁。在炮火掩护下架桥排再次操起架桥器材，迅速跳入水中架桥。突击队过桥后分路猛追，经数小时激战，在吴忠堡外围俘敌千余人，将敌保安三师防线全部摧毁。与此同时，解放军一九一师集中优势兵力、火器，勇猛突破吴忠堡东南门，与迂回吴忠堡东北之独立一师、独立二师等部队相互配合，歼敌于吴忠堡外围，于11时解放吴忠堡。

战斗中，我军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有许许多多战士负伤不下火线。一名班长在冲锋中倒下，子弹打伤了他的胳膊和腰部，下身不能动，脸色苍白，他断断续续地对战友说："我不行了，任务还没有完成，对不起……"由于解放军广大指战员的机智勇敢，勇猛穿插，大胆包抄，致使吴忠堡守敌阵脚大乱，彼此无法顾及，军心涣散，全线迅速溃败。在这次战斗中，有135人英勇牺牲，

1951年，为了纪念解放吴忠堡及在涝河桥战斗中牺牲的革命烈士，吴忠县人民政府在涝河桥附近修建了革命烈士陵园。2005年4月，涝河桥烈士陵园被命名为"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9年3月，国务院批准该陵园为第五批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

（执笔：何伟东）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金灵之战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在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指挥下，分左、中、右三路挥师东指，挺进宁夏。

针对敌情变化，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决定首先歼灭敌一二八军于金（积）、灵（武）地区。9月16日，兵团下达作战命令，解放军一九一师首先攻取牛首山，尔后由西、南向金积进攻，力求迅速分割围歼敌军；解放军一九二师在右翼协同，夹攻金积之敌，继而攻取吴忠堡；解放军独立一师和独立二师沿豫（旺）灵（武）公路攻击前进，迂回吴忠侧后，协助主力歼灭金积之敌。解放军一九〇师、一九五师为第二梯队，随主攻部队跟进。与此同时，解放军六十三军、六十五军从中宁等地北渡黄河攻击国民党贺兰军，配合金灵地区作战。17日，解放军一九一师派一营兵力沿崎岖小路向牛首山实施突袭，轻装直扑主峰小西天，守敌措手不及，弃阵逃窜，我军迅速控制了牛首山及其附近的制高点。19日，解放军一九一师攻占青铜峡口，打垮了金积以南西滩村顽抗之敌；解放军一九二师在前进途中击退敌一个骑兵团的阻击，逼近金积县，将敌三五六师困于城内。19日11时，解放军六十四军兵分两路直扑金积，金灵之战正式开始。

20日晨，解放军一九一师经2小时激战，歼敌一个团，占领了余家桥。当日下午，又逐个扫清了黄桥、沙寨、刘家营、李家堡、谭家桥等敌据点，解放军一九一师和一九二师从东、西、南三面逼近金积城。城内守敌退路已绝，援兵无望。由于国民党宁夏兵团总指挥马敦静临阵脱逃，大大动摇了敌军军心，是战是和，是进是退，争论不休，乱作一团。在这种情况下，贺兰军军长马全良、国民党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等秘密集会于仁存渡口，一致商定由马全良领衔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通电求和。

敌军虽然通电求和，但金灵地区的敌一二八军军部个别高级将领并未完全放弃顽抗，仍从灵武派兵增援吴忠。为切断金积守敌逃路和歼灭吴忠堡之敌，解放军一九一师和一九二师于当夜冒雨攻打吴忠堡守敌，将包围金积的任务留给随后跟进的一九〇师。就在解放军交接之际，国民党一二八军副军长何晓霆趁机逃往灵武，城内大部敌军也趁乱偷逃出城，金积县城解放。

21日下午5时，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复电，欢迎马金良等人求和，同意对方派代表到中宁与杨得志司令员接洽。

为歼吴忠堡守敌，解放军一九二师从金积南经廖桥、杨马湖直逼吴忠南大门——涝河桥。这时桥梁已被敌人破坏，敌人在对岸筑有碉堡群，由两个连坚守。解放军五七五团连续三次强攻均未成功。后来，在炮火掩护下，突击队分路迂回敌后，用炸药包炸毁碉堡，占领了桥头。该团通过清水沟后猛烈穿插、分割，于吴忠堡外围俘敌千余

人。21日6时，解放军一九一师集中优势兵力、火器，突破吴忠堡东南门，与迂回吴忠堡东北之独一师、独二师及五七一团相互配合，大量歼敌于吴忠堡外围，于11时解放吴忠。

涝河桥失守后，敌一二八军军部及由灵武增援吴忠的二五六师和保安三师残部，纷纷向灵武溃逃。解放军一九二师主力乘胜追击，于21日下午在郝家桥遇到以何晓霆为首的灵武守敌残部投诚代表。根据其请求，我军决定次日晨进城接收，以给城内守敌军官收拢散兵的时间。但由于残敌大批偷逃出城，解放军遂突入城内，截获800多名企图逃跑之敌，并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其余千余名败逃官兵在解放军宽大政策感召下，自动缴械投降。部分企图从仁存渡口逃脱的敌军残部，当狂奔至渡口时，因无船过河，遂冒险泅渡，大部分葬身于滔滔黄河之中。

至此，金灵之战胜利结束。

（执笔：马晓东）

和平解放宁夏协议的签订

宁夏是中原与西北边疆交往的重要通道。银川平原土地肥沃，得黄河水利之灌溉，物产丰厚，是闻名天下的塞上粮仓，六盘山、贺兰山形成南北天然屏障，历来为兵家重地。近代自义和团运动以后，马福祥、马鸿逵父子先后在此盘踞数十年之久。

1949年5月，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部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率领下，开始解放大西北。1949年7月，解放军十九兵团六十四军进军宁夏，歼灭了盘踞宁夏的国民党马鸿逵部第十一军5000多人，打开了宁夏的南大门。

9月1日，解放军十九兵团10万大军分三路北上，直扑宁夏川。马鸿逵的宁夏兵团7万多人，被孤立分割，成了惊弓之鸟。9月22日，解放军六十四军在金积、灵武一线经过激烈战斗，全歼宁夏兵团主力卢忠良部一二八军。至此，宁夏河东地区全部解放，只有河西银川平原还处在马家军统治下。

和平解放宁夏本是解放军的一贯主张，也是宁夏人民的共同愿望。兰州解放后，解放军就请郭南浦等民主进步人士出面，做宁夏当局马鸿逵、马鸿宾等军政要员的

思想工作，促成了马鸿宾部在中宁起义。河东地区全部解放后，在马鸿逵、马敦静父子先后逃离银川的情况下，马家军的3位军长马全良、卢忠良、马光宗和宁夏保安司令部参谋长马光天等，向解放军发电报求和。彭德怀总司令复电："诸将军既愿宁夏问题和平解决，殊甚欣慰，望督率贵部即速见诸实行。此间即告杨得志司令员。告各方望即派代表至中宁与杨司令接洽。"

接到复电后，马全良等深感共产党和解放军心胸宽广，政策宽大，立即决定派卢忠良、马光天、马廷秀为和谈代表，赴中宁与解放军第十九兵团杨得志司令进行和谈。9月23日，十九兵团司令杨得志、政委李志民同国民党宁夏军政代表签订了《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至此，宁夏全境解放。9月26日，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司令部进驻银川。银川这颗塞上明珠，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执笔：韩林森）

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进驻银川

1949年9月21日，金灵之战结束后，马鸿逵父子相继逃往重庆。22日上午，国民党八十一军军长马鸿宾根据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21日复电，在银川召集宁夏兵团将官及党政界人士紧急会议，决定派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政界代表马廷秀和马光天率领军政代表团赴中宁谈判。23日上午，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潘自力等在中宁接见了国民党宁夏军政代表团。经过谈判，双方代表于当天下午2时签订了《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

和平协议的签订，得到了宁夏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国民党宁夏兵团的大多数官兵均表示支持和拥护，但个别顽固分子不甘心灭亡，采取各种手段阻挠和破坏宁夏和平解放，并扬言要杀害通电求和的宁夏军政界代表，银川城乡社会局面极为混乱。

在此情况下，解放军十九兵团命令六十四军派一九一师先头部队连夜进驻银川，维持社会秩序。23日深夜11时，解放军先头部队抵达银川。在兵力有限的情况下，战士们迅速控制四个城门、钟鼓楼、玉皇阁等制高点。同

时，占领了马鸿逵的公馆——将军第，控制了敌人的武器弹药库、机场、粮仓，收缴了敌人的电台，在炮兵阵地、交通路口等重点地区布岗设哨。

24日上午10时，解放军六十四军一九一师等主力部队在各族各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中，浩浩荡荡开进银川城。25日，雨过天晴，银川街道两旁贴出了“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银川！”等标语，工人、学生、市民自发组织起来，上街游行庆祝，就连马鸿逵部的军乐队也自发加入了游行队伍，口号声、欢呼声伴随着锣鼓军号声此起彼伏，全城人民沉浸在幸福与欢乐之中。

26日，解放军十九兵团在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耿飚、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潘自力等人的带领下，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同日，为了迅速安定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恢复生产，建立政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成立了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军管会），主任为杨得志，副主任为马鸿宾、朱敏、曹又参。军管会下设军事、政务、财经、文教、公安、联络6个处，分管各项事宜，迅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接管工作。

军管会成立后，为稳定社会局面，迅速实施了一系列有力措施：连续两次发布文告，阐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对新解放区的方针政策，明确了当时许多实际问题的处理原则；责令国民党宁夏兵团残部的散兵游勇，包括将校军官，都必须向军管会联络处投诚登记，并给他们发

放和平解放证;加强治安管理,稳定社会秩序。银川军管会还及时公布户口管理暂行办法,清查户口,监控不法分子和特务分子的破坏活动,并举办公安人员训练班,培训公安人员,建立健全各种群众性的治安组织。对已接管的工厂、学校、医院等单位,帮助督促其迅速开工、复课、开业,使战争的创伤逐步得到恢复。所有这些工作,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执笔:张　莉)

后　记

本书是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为深入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传统和理想信念教育，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系列讲话精神，切实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作为对全区中小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的辅助读本而组织编写的。

本书在筹划、编写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了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傅兴国同志的关心和支持。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蔡国英审阅了本书稿并作出重要批示，同意在《宁夏日报》开设专栏连续刊载本书相关内容。在此特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本书由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宋建钢主持编写，副主任余剑雄修改、审定了全部书稿。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处胡伟东、纳建萍、马晓东、张莉参加了集体审稿、改稿工作。职业插画师张曦芝为本书专门配作了插图。从2013年2月正式启动编写本书工作以来，根据研究确定的每个入选故事的编写主题，编写人员积极收集资料、考察史实、反复修改，于7月初完成了初稿。经过集中审改、编

委会审定、中央党史研究室审定，最终定稿。

本书的编写还得到了自治区教育厅教科文所和各市县党史部门的通力配合及大力协助。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布青沪对本书的编写也给予了关心、支持和有力指导。在此，我们谨向他们并向所有关心、帮助和支持本书编写工作的同志，表示诚挚的感谢！

最后，在本书出版之际，我们谨向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宁夏人民出版社的同志表示深深的谢意，他们为本书的出版发行付出了辛勤劳动。

编写本书是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开门办史的一次尝试，由于我们的水平、资料有限，加之时间紧迫，书中难免有不足和疏漏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编　者

2014年3月